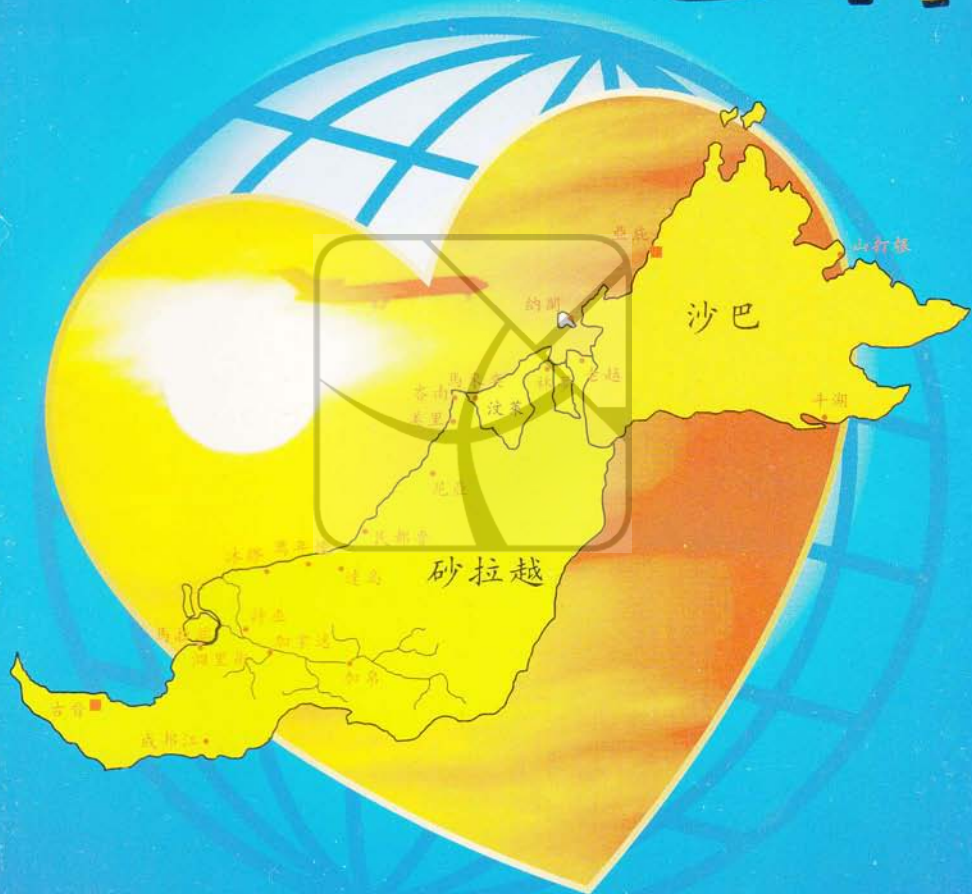


心中有個 宏大的世界



友誼叢書之七

2005年11月15日

内容简介

在那追求人类崇高理想为时尚的年代里，在这热土地上的热血青年们，他们心中都有个宏大的世界，他们追求并为人类最美好社会的实现而奋不顾身。

本书的作者们都是当年的亲身参与者，他们诉说着在那激情的岁月里从城市到农村再到边区又回到国内；诉说着在陷入图圈后在绝境中的奋斗；也诉说着—群被逼进集中营的乡亲们的悲情。他们诉说的经历，是当年另一面历史创造者们的悲歌。是的，是悲怆的歌，但也是悲壮的歌，是一批批心中有个宏大世界者们的悲壮的歌。他们认为已尽力而为，今天他们都是已息影家园，并祝愿后来者们，能从他们的经历史之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从而使这世界逐步走向大同。



目录

难忘的回忆

- 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战斗历程
我的风雨战斗经历
在那逝空难忘的日子
第四省“4.30”事件
在东北的日日夜夜
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之真相
建立新村—变相的集中营
伊班新村
“新村”的难忘日子
砸碎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
— 回顾当年大力反对反动色情殖民文化运动
朋友啊，朋友！我们思念你
孺子牛

- 冰水
— 曾玉兰口述
— 刘月兰口述
— 志阳
— 雁飞
— 老友
— 江宏
— 江宏
— 徐玉金口述

— 泓泉
— 李明
— 寻儿

马罗河的怒涛

- 1968年第三省首批青年越界参军
一个女兵的经历
空降和撤退
麻雀战斗组逞英豪
怒涛的马罗河

- 方明
— 丹心
— 方明
— 郑存喜
— 学武

血染的土地

- 追溯“九·三〇”运动
西婆罗洲华侨血史一页

- 苏珊
— 许行

西加的访感

- 访罗芳伯第二家乡

- 丹心·罗丁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一）本會同人等，因前次大會決議，將本會
改組為「中國青年救國團」，業經呈准
行政院核准在案。茲為適應時局，並
為便利會員起見，特將本會組織章程
修正如下，自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此致各會員。



本會同人等

（二）本會同人等，因前次大會決議，將本會
改組為「中國青年救國團」，業經呈准
行政院核准在案。茲為適應時局，並
為便利會員起見，特將本會組織章程
修正如下，自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此致各會員。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三）本會同人等，因前次大會決議，將本會
改組為「中國青年救國團」，業經呈准
行政院核准在案。茲為適應時局，並
為便利會員起見，特將本會組織章程
修正如下，自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此致各會員。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四）本會同人等，因前次大會決議，將本會
改組為「中國青年救國團」，業經呈准
行政院核准在案。茲為適應時局，並
為便利會員起見，特將本會組織章程
修正如下，自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
施行。此致各會員。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友谊丛书第七辑

心中有一个大世界



THE GREAT WALL

难忘的回忆





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战斗历程

—冰 水

1964年4月初，在三口洋的我们领导同志，与印尼外交部官员谈商后，决定留在三口洋各公会住的我们同志，撤去砂印边区西部境内，接受军事训练，经过几天安排后，在各公会的50位同志（40位男同志，10位女同志）在赖春（林广明）和林刚林（温长流）同志负责下，由印尼外交部官员带领，坐船到达西加里曼丹西端的巴罗河口。上岸后，我们走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达一座叫阿桑山的山下。我们在山下一块较平的山坡，建造营房和军事训练场。在同志们的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下，经过大约20天的努力，11间的亚答营房建造起来了，2间给印尼外交部人员住，其他9间是我们同志自己用。9间有营房、厨房、食堂……等，与此同时超过百人的军事训练场也做好了。

1964年5月初，在印尼爪哇岛接受军事军官训练的10位同志，经过3个月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在印尼外交部官员带领下，在东爪哇的泗水海军基地启航，巡洋舰在大海航行几天后，到达阿桑山，和先到的同志们会合。

在阿桑山军事训练场（后来叫老基地）一共有60位同志，加上赖春和林刚林同志，共有62人，不过赖春和林刚林同志只参加一个多月的军训，因为他们俩另有任务在身，先离开阿桑山到坤甸去。在阿桑山当时负责同志叫行政人员，接下来就正式分班。

行政人员： 1，文铭权 3，杨新春（杨柱中）
 2，黄纪作 4，黄 汉（黄纪晓）

指导员班： 正班长 1, 王麦柯 (赖 水)
副班长 2, 庄其全 (张其昌)
3, 严立坚 (庄美兴)
4, 林约汉 (温长江)
5, 贝 旺 (黄)
6, 吴大伟 (吴朝成)

第一班： 指导员： 黄纪作、林约汉
正班长： 1, 何士曼 (官木荣)
2, 陶玉清
3, 刘亚勇 (刘永红)
4, 黄乐山 (黄华安)
5, 杨大全 (杨立宪)
6, 杨永福 (杨永福)
7, 曾永胜
8, 魏才新
9, 立方
10, 赖民和

第二班： 指导员： 杨新春, 吴大卫
1, 胡立克 (黄国英)
2, 朱达邦 (张兴邻)
3, 丘马正 (李思勇)
4, 许无影 (蔡高禁)
5, 黄礼贵 (黄礼贵)
6, 丘亚运 (丘石秀)
7, 何德生 (丘南镇)
8, 黄海明 (黄)
9, 鲁依顺 (刘华祥)
10, 赖文利 (赖)

第三班： 指导员： 黄汉, 贝旺
正班长： 1, 苏娜 (黄金碧)

- 2, 余亚花 (黄顺娇)
- 3, 吴玉金 (吴玉金)
- 4, 刘小明 (刘月珍)
- 5, 刘月珍 (刘月花)
- 6, 唐秀妹 (唐翠霞)
- 7, 吴美莲 (吴新友)
- 8, 苏依娜 (苏亮月)
- 9, 邓月梅
- 10, 李惠娟

- 第四班：
- 指导员： 文铭权，庄其全
- 正班长： 1, 李世荣
- 副班长： 2, 王子吉 (刘汉文)
- 3, 苏哈里 (张展川)
- 4, 方达 (张光华)
- 5, 鲁巴卡 (曾明强)
- 6, 钟比宁 (曾文平)
- 7, 李南洋 (田永祥)
- 8, 蔡建平 (蔡南光)
- 9, 黄忠平 (罗鸿添)
- 10, 钟亨利

- 第五班：
- 指导员： 王麦柯，严立坚
- 正班长： 1, 邓砂平
- 副班长： 2, 陈维平 (洪明友)
- 3, 魏廉斯 (曾康胜)
- 4, 陈伟清 (田新泉)
- 5, 李建强 (彭天锡)
- 6, 邓亚利
- 7, 苏慷慨 (蔡细作)
- 8, 乔治 (蔡商伦)

- 9, 哥尼
- 10, 杨思梅

1964年5月中，在阿桑山营地，文铭权和黄纪作等领导同志成立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是革命组织的首支武装部队。由于没有经验，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建设，在战斗中不断吸取与总结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

行政人员和指导班开会，决定了军旗、军歌，也办壁报。军旗是这样的，中间部分四份之二是红色，上下两边各四份之一一是白色，红色中间部分有三粒黄色的五角星，三粒黄星是三角形的位置，贯穿在一条黑色带里。军旗上下两边白色的，革命胜利后去掉成为红色底。军歌暂时选用中国大陆的一首进行曲（后来在1966年初由黄纪晓同志改词，房月友同志谱曲而编成的军歌）。壁报名叫《不灭的火种》用黑板吊在食堂墙壁，同志们写文章贴上去。除了以上，有关军旗、军歌、壁报，同时安排军事训练课程表、各种课程的负责指导员，以及岗哨等各项工作。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当时和印尼外交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得到他们直接的协助，如枪支弹药，军队配备、粮食，以及少许的药品和日常用品等。

在军事训练期间，分发枪支给队员，有来福枪、轻机关枪、冲锋枪（Sten）、子弹、手榴弹等。同时，还颁发制服、兵鞋、帽子、背包、水壶、军用刀……等等。同志们得到了枪枝和配备，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千辛万苦从远地而来就是要拿枪杆子搞武装，为争取祖国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

这次军事训练和学习理论，为期6个月，以军事训练为主。在理论学习方面是由文铭权同志和黄纪作同志负责；杨新春同志负责学习掌握枪支知识；黄汉同志负责学习爆破；王麦

柯同志负责学习单人作战（包括各种爬行、翻、滚、伏越障碍等基本战术）；庄其全同志负责训练小队作战，伏击…等；贝旺同志负责训练拼刺；林约汉同志、严立坚同志、吴大伟同志负责找射击、爆炸、伏击和小队进攻的场地等。除了在课室内负责的指导员讲课外，他们也协助在课室外面的训练。

六个月军事训练的情况是这样的：早上 6 点起床先举行升旗礼，过后集体做操（星期一至星期五是做军操，由麦柯同志负责，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做体操，由庄其全同志负责）操练到 7 点。7 点 40 分早点，有时吃粥，有时吃绿豆汤。8 点上课，到 10 点小休息，10 点 15 分又上课到 12 点，12:30pm 午餐，午餐后各自休息。下午 2 点到 5 点上课都是在训练场上训练。6 点 15 分晚餐，过后各班学习或者开班务会。9:30pm 由行政人员或是指导员查营房后才休息就寝。晚上有时训练夜行军，或者演习，直到半夜才休息。

每两个星期六，吃过晚餐后，全体同志和印尼外交部人员（5 人到 8 人）集合在营房附近大树下的空地召开一次文娱晚会。会场两侧起篝火，中间设个舞台，同志们坐在周围树干的长凳上。要表演的同志，几天前已经准备好了，当主持节目的同志（主要是王麦柯和庄其全）叫到名字就上台表演，有唱歌、跳舞、山歌、武术……等。玩得大家兴高采烈、不亦乐乎。

星期天是自由活动，有时领导同志派同志去打猎，也有安排同志去种菜、种杂粮……，等等。

我们有个规矩，吃饭前大家各坐各位，值日指导员喊坐正，然后才可以动筷动匙。

同时，每天有一位指导员轮流值日，处理基地的一些事务。

岗哨方面是王麦柯同志安排，每回守岗两小时才换班。白天只安排一个岗哨，晚上就安排 3 个岗哨，和一个总岗，同时还有一位同志巡岗，三个岗站是在营房以外约有三分钟的路程。总岗是在食堂，巡岗者必须要巡三个岗站后，才可回到总站，如果换班时间到，巡岗者就要叫人换班。三个岗哨是用小藤拉到总站，如某个岗站有情况，就拉藤发出讯号，三个岗哨是由男同志守岗，总岗是由女同志守岗，巡岗是由指导员班负责。白天只有一个岗站，通常是安排参加连队军训过的同志来守岗，如陈维平、邓砂平、魏才新同志等，其他的同志参加军训。

炊事是由女同志余亚花和邓月梅同志负责，若有事则由其他同志代替。

粮食方面，除了由印尼外交部供给的，米、油、盐、糖、咖啡粉、鱼干及少许的日用品等之外，为了增加营养和让同志们吃得好些，由林约汉同志负责，轮流派人去种菜、番薯、豆类，等农作物，星期天派人去打猎。

在基地里我们部队有跟外面搞群众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当时在阿桑山东面，及西南面工作者是石明（陈瑞廷）、刘亚娜（田锦华）、刘和海（印尼华裔）等同志。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由杨新春、黄汉和林约汉同志跟他们联络。

在军事训练期间，除了行政人员有开会外，也常和指导员班一起讨论问题。所讨论的问题有：

- 1， 军事训练问题：6 个月严格的军政训练后，要求同志们要能负起训练新兵的责任。
- 2， 粮食问题：目前有人协助我们，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还必须作好粮食自力更生的准备工作。

3. 挑战问题：要和协助我们的任何人搞好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摆脱他们的控制，要学会独立自主。
4. 群众工作：我们必须搞好基地周围的土著群众工作。
5. 联络工作：除了要联络在印尼后方的同志之外，我们必须联络国内的同志，才能够解决人力、物力、经济、情报的来源和克服许多困难。
6. 地理问题：从地图上看，从阿桑山到丹绒拿督这片森林地带狭小，因此我们认为只能留下 30 人—40 人坚持原来阵地，其他的队员要转移到其他第一、二、三省更加广阔的森林地带去，扩大迂回的天地。

1964 年 11 月中，军事训练结束了，同志们各有任务，有的同志派去向印尼外交部人员学习医务；有的去学太极；有的加强军事训练跑山熟悉地形等。

当时部队里出现了首位逃兵，领导同志认为不必派人去追。当时文铭权同志说：“逃兵心已不在部队，如果追回来，迟早也是逃的。目前情况分析从地理和周围的环境来看，一定的安全还会有的，还不会马上受到敌人的折压”。

为了自立不被外人的控制，因此派同志向外发展，搞民族工作。1964 年 11 月尾，首次派一批同志向北面出发，他们是：王麦柯、严立坚、贝旺、刘亚勇、杨大全、李建强、钟比宁和苏哈里 8 人。从阿桑山营地出发，经过毕示山再向北面跑，大约两个多小时到一座甘榜叫巴西班样（长沙）。当晚同志们就在该甘榜过夜，在那里遇上了第一连的三位同志。此连已经解散了，但是他们三人还留在此甘榜，此三人是：高多马斯（高长寿）、钟比得、亚宋（宋佛贤）同志。会面后隔天王麦柯等 8 人回到阿桑山报告情况。

1964 年 12 月初，杨新春、黄汉、王麦柯…等 10 位同志到甘榜巴西班样与高多马斯等同志接触，了解边区几个甘榜

的情况，隔天下午回阿桑山，过后二天又派 5 位同志到甘榜班样他们是：王麦柯、立坚、贝旺、大全、亚勇 5 人。他们到此甘榜后又再向北面跑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到甘榜巴西不地（白沙）。他们了解情况后，当天下午倒回甘榜时，被当时驻防的印尼兵调去问话，并要他们去尼姑见营长。回到住处，发现枪支被印兵扣留了。他们通过高多马斯设法通知杨新春他们，因为他们翌日也会来此，恐怕枪支也被扣留。杨等得通知回基地，商讨应付之策。

与此同时，隔天清早 4 点，印尼兵就带着王麦柯他们 5 人从甘榜巴西班样到尼姑小镇，大约走了 5 个小时的路程，尼姑是印尼边防军的营部。在此边防军营长询问他们：“你们是什么部队？领导人是谁？”居留了 5 天。后来经文铭权、黄纪作等领导同志与印尼某部门的交涉才获得释放。

后来阿桑山基地周围一带土著甘榜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除了原本甘榜巴亚班样有高多马斯 3 位同志留下工作外，还有由何士曼同志带 6 位负责在甘榜巴西不地工作。贝旺同志和亚勇同志负责 6 人在甘榜巴都依丹留下工作。在边区各个甘榜我们同志有较多的自由活动，同志印军的关系也有所改善。

1965 年 1 月间文铭权、黄纪作等领导同志决定首次派王麦柯、严立坚、陈维平、钟比宁、李建强等 6 同志，任务是联络和说明我们革命组织自己领导有武装部队…等。他们从阿桑山基地出发，经过甘榜巴都依丹，进入原始森林，越过边区进入国内，经过几个英兵驻扎过的旧营地，两天后到达伦乐的加丁山。在此逗留 2 天，跟当地负责同志联络，回时还带有收音机、日常用品等。一星期后回到基地，文铭权同志已去坤甸了，离开前给联络同志留存一封信。

1965 年 1 月尾何士曼同志所负责的单位 6 位同志，因

要做营房，分工进入山林砍树…等。蔡建平同志却意外踏到土著射野猪的毒剑，射中大腿。同志们立即把他背回甘榜巴西布地，并派同志到甘榜巴西班样叫印尼医务人员前来治疗。医务人员抵达时，伤者脸色苍白、毒已攻心，几分钟后，呼出最后的一口气，与世长辞，真是“壮志未酬，身先亡”。蔡建平同志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首位牺牲者。

我们部队为了不被印尼外交部控制，决定撤出阿桑山基地，转移到比苏山。比苏山是阿桑山和甘榜巴西班样之间的一座小山，再从比苏山转移甘榜巴都依丹附近的老稻芭建造营房。后来比苏山做一个站，有 6 位同志驻守。

1965 年 2 月初，领导同志，第二次派 8 位同志进入国内，4 位留在国内，4 位倒回边区。他们是：王麦柯、钟比宁、陈水和、李建强、胡立克、朱达邦、黄礼德和兵亚运 8 人。

在营地周围的几座长屋都有我们的同志活动，当地的土著支持我们。1965 年 2 月中，部队转移到甘榜巴都依丹时，部队的粮食是向土著买的，我们用物品跟土著的米、木薯、玉米等交换。我们也开辟了几块的地来种稻和各种杂粮。

1965 年 3 月初，巴都依丹营地留下黄纪作同志负责，杨新春同志和黄汉同志去坤甸。1965 年 3 月间，在印尼西爪哇茂物附近召开北加革命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砂拉越革命组织派出文铭权叶存厚、杨新春、黄汉、赖春（林广民）和张子海（钟桂文）参加会议。

1965 年 3 月初，英军一小队入侵印尼境内，比苏山下距离我们同志的站一间营房，只有 15 分钟的路程。英兵在红水河遇到印尼的边防军，双方对打约有一个小时。英兵才撤回伦乐边界。这次驳火，英军伤亡不详，印尼兵死两人。不

久后英军又入侵印尼境内甘榜巴西班祥和甘榜巴都依丹之间的一条山垄遇到印尼边防军，两军对打了约半个小时后英军转回伦乐边界。

1965年3-4月间，印尼边防军要我们负责同志派部队进伦乐，在伦乐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破坏桥梁、飞机场、兵营等目标。后派两位同志背炸药进入伦乐加丁山跟先到伦乐的同志会合。隔天派人员去侦察飞机场、兵营和测量桥梁。与此同时在加丁山某个石洞有关的几位同志，召开会议，讨论有关采取军事行动的事宜。讨论的结果：按照现时的情况，若是破坏桥梁、飞机场等，对我们不利：敌人派大兵来伦乐镇压；估计华裔群众会被集中在某处控制区；群众对我们的支援与联络将被隔绝；…。因此，决定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派去侦察的他们都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所有侦察的资料留着必要的才用。

1965年3月尾，杨新春和黄汉同志，参加北加革命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后，不久回来巴都依丹营地。同年4-5月间，黄纪作同志离开巴都依丹营地去坤甸，巴都依丹营地由杨新春和黄汉同志负责。

1965年5-6月间，营地增加了从国内来的10多位新同志。同年6月尾，第二次派进国内的八位同志，回来还带来几位新同志。这批新同志安排到丹绒里八去军训。这是在甘榜巴都依丹南面，三发河的一条支流，坐小舟从河的上游顺水直下二个小时的小河边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同志新开辟的一个暂时训练场地。在此军训由王麦柯同志负责，文军同志（叶碧珠）和林约汉同志协助。王麦柯同志负责军事训练和保安，文军同志负责政治理论课，林约汉同志负责事务包括粮食、联络等工作。军训新同志约有20人老同志20人老同志约有八人，老同志负责保安和寻找射击场地等工作。

1965年7月下旬开始军事训练，为期一个月的基本军

训、课程有：枪支装折、射击、手榴弹、战地敏捷、小队进攻等。参加这次军事训练的新同志有：陈家汉（许日武）、陈水和（江纪松）、董存华（赖水俊）、陈新顺、亚德、黄虎（黄娘清）、蔡新光、廖明松（廖永福）、少创波、赖秋明（赖秋花）、杨荷花（杨月花）、董存珍……，等等。

1965年8月中，在丹绒里八军训期间，有一位老同志在站岗时做逃兵，被同志发现后，由林约汉同志划小舟直追到三发镇，被追到，后来林约汉同志带逃兵到我们同志在三发镇的住处处理。

在丹绒里八军训期间，领导上为了要在双空地区发展，因此从巴都依丹营地先派邓亚利、刘亚勇、黄乐山、钟比宁、许无影、鲁依顺、陈卫清、魏才新等10多位同志到双空地区去，他们从巴都依丹小河坐小舟到丹绒里八，再坐小船到西里圭。当时我们同志住西里圭的是：田志锋同志（田方财）林巴都同志（温秀连）、李约汉同志（李琪祥）、郑春海同志、蔡志强同志（蔡回乡）等人。隔天从西里圭跑陆路到文汪小镇。文汪只有三间小店。从文汪出发再走路经过甘榜打梦甘榜打汪才到双空甘榜亚杏，甘榜亚世是双空六个甘榜之一。当时在双空地区搞民族工作的林亚林同志（朱增仁）、梁亚明同志（彭梦合）等十多位同志会合。这样一来双空一带有三十多位同志。

1965年8月尾，在巴都依丹营地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领导上在印尼三口洋，调来张亚华同志（曾佩雄）委任为第一支队政委，副政委是何士曼同志（官木荣），司令是庄其全同志（张其昌），副司令是严立坚同志（庄美兴）。

1965年8月尾，在丹绒里八一个月的军事训练期间，参加军训的同志都很吃苦，很积极的学习。军训完后这批新同志后来由林约汉同志负责全部带上巴都依丹营地，这样新老同

志合起来营地有 50 多人。大家分工合作，有些同志去种稻，种杂粮、种菜等农作物；也派人员跟印尼边防军搞统战；同时，也秘密的派同志们进入国内联络，带国内同志来边区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后又倒回国内去。

1965 年尾，巴都依丹营地的同志其中庄其金老同志大部分都被调到双空第三支队去。1966 年中第一支队大约只有 30 多人，因此老同志留下营地的大约只有 10 人，其他的都是国内来的新同志，当时留下的老同志有的情绪不好，自认为自己没有被调去双空地区，是“自己没有用”，“没人要”，……等。后来负责同志对他们进行了说理教育，说明留下少数的老同志，是领导上看中，能够协助搞好边区的武装部队和协助第一支队的繁重工作、搞土著工作和印尼边防军的统战工作、带领新同志等等。疏通了思想，老同志不但情绪好转，而且干劲冲天。

第一支队和印尼边防统战工作，一直来都是杨大全和苏慷慨同志，那时和印尼边防军的关系相当好，大家有时一起巡逻，侦察敌情。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搞得不错，有几位土著青年要求参军，负责同志觉得不合时机，鼓励留在原地做情报员，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1966 年尾，张亚华同志来双空第三支队出席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会议。直到 1967 年 2 月初反回山口洋，和他有关的领导同志，另分配给他任务，而没有倒回第一支队去。因此第一支就由副政委何士曼同志、副司令严立坚同志负责，同时配合国内的负责同志一起领导第一支队。

1966 年尾 1967 年初印尼边防军换防，就此开始与我

方决裂，而成双方对峙的局面。因此统战工作就停止了，印尼兵开始追剿我们部队，我们所种的农作物都被敌兵毁掉，没有收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粮食就成问题，只好用物和金钱通过好的土著换取粮食。另一方面由国内运一些粮食药品及日用品来边区。由于人数不多粮食方面基本上能够解决。

1967年中，边区的甘榜人民群众，都被印尼兵镇压，因此大部分都转变靠向印方方面，只有极少数的才敢和我们联络，找粮食给我们，印尼兵时时追剿我们。因此住处也成问题了，同志们只好分小队寻找石洞住。

1967年尾，有一次敌兵冒大雨进攻其中一个石洞，在枪战中，杨大全和苏慷慨同志，不幸被敌兵打中，而英勇的牺牲了。其他的同志安全撤走。不久后敌兵又进攻另一个石洞，此次牺牲的有亚马正……等同志。

风风雨雨东奔西走，后来决定把边区的同志一批一批的调回国内，其中有的同志如苏哈里、李建强同志等还未到伦乐加丁山在半路就被敌兵伏击而身亡。

直到1970年初在边区的同志，大家觉得在边区立足没有什么作用，敌兵的围剿，土著倒向敌人，我军陷于孤立，随时被敌兵消灭的可能。当时边区只剩下何士曼同志等12人。他们决定撤回国内，伦乐加丁山和先回国的同志会合。

1969年初，国内已成立北加人民游击队，因此何士曼同志等12人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就编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我的风雨战斗经历

曾玉兰（杨思珍）口述
扬帆整理



杨思珍留影

在廖岛的日子

在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期间，我们有 30 位在山口洋的同志（20 位男，10 位女）在印尼右派势力的要求下，被派往廖岛进行“军事训练”。

1964 年初，我们接受了一项忍辱负重的任务，出发之前我们都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我们在山口洋下船，这艘印尼的战舰在南中国海航行了两天多。於农历正月 13 日下午 8 点抛锚在廖岛的附近。印尼军官先用小船上了该岛，他们返回战舰之后，我们晚上九点才靠岸，然后乘军车到营地。

廖岛是个孤岛，环顾四周，阒无人烟。它靠近新加坡，舷外快艇只要行驶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新加坡。印尼在这里建一个地下军火库，有哨兵一天 24 小时的戒备巡逻，每天几乎都有兵船来去往返。

在住进营房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其实，军训的项目只有一个内容——训练爆破。后来，我们获悉，印尼右派势力要利用我们这些华籍青年训练了之后，准备不久潜入新加坡进行爆破。我们每一位同志都反对这样做，没有一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才来到廖岛 10 多天。一天，印尼教官给我两支手枪去训练，走在后面的两位男同志向我要手枪，我就给他们一人一支。好奇好玩的男同志，捧着手枪，左看看，右瞧瞧，拨来翻去，其中一位还把食指伸进板机一扣，意料不到有子弹射出，正好打中只有相距二、三步前的与我并肩行走的张玉凤同志，子弹从背后进，穿过肠在肚前出。虽然经过抢救，但仍然不治，牺牲了。

大家都感到很悲痛，我们跟印尼军官进行了摊牌。我们拒绝去新加坡爆破，要求回到印尼后方去，并把尸体葬在那里。我们坚持不下葬，每天轮流派 7、8 位同志去守棺。印尼当局怕尸体发臭，请教华人后，用白钢密封框住，在尸体下垫放着茶叶、炭之类。他们见我们执著坚决，就伪装叶存厚的名义，写信给我们，也寄来挽联，并劝我们，人死了就要下葬，入土为安。已经坚持了 6 天，考虑到再坚持下去意义不大，我们才做出了妥协，张玉凤烈士获得了厚葬，她的身体用北加里曼丹旗帜复盖着，葬在军人烈士墓。

这个事件之后，印方不再好好地跟我们训练，却限制着守得更紧。我们同志闲无事做，常在附近捉鱼虾，观赏日出日落。大家都引颈盼望早日回到印尼后方，回到革命的大家庭中去。

后来，经过叶存厚他们跟印尼外交部的交涉，以蔡向荣为首的 29 人总算回到了坤甸，结束了那三个月的廖岛生活。

注：参加廖岛“军训”的 30 名（其中马当有 7 男 3 女）：蔡向荣、杨谦、吴春华、李观球、黄宝珍、江德娘、杨小明、张玉凤、曾玉兰、子明、素兰、力士、拉玛、苏清义、苏鑫月、苏秋月（以上是三兄妹）等。



右一张玉凤（玉英之妹）摄于1959年于晋连路24哩龙岗中学。由谢水旺摄影。

上孟加影

回到坤甸一段时间后，我们又派往孟加影接受一个月的三视训练。

我们从坤甸出发，几十个人挤在两辆军车上。我们女同志还好，靠在车边站着，手还能抓住车斗；男同志则要一个跟着一个抓住对方后面的腰带。车辆行驶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不停地颠簸震跳着，时而突然遇到 90 度，大伙倾斜一边倒。一路上不是东歪西倒，就是前倾后仰。大家还背着行李地站着、硬硬地撑住。特别是过河时，看到河上纵向铺着 6 条椰干，在两轮距离两边各铺上 3 条椰干，只要稍为不慎，车辆稍为偏离了椰干，连人带车就会掉进河里。从坤甸到山口洋，再从山口洋到孟加影，我们在车上苦熬了近 15 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严格的正式训练。从单兵作战到集体作战的各个项目都进行了训练。有一次训练双方交战还用了训练的子弹。这里的训练官有的是印共或印共的同情支持者，他们待我们很好，都很认真的对待军事训练。

孟加影的群众积极热情，每天都挑着担子送来糕饼、咖啡、绿豆汤等好吃的东西。有时他们在我们跑步必经的路上等着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北加的女兵，他们既好奇又钦佩，对我们却特别殷勤热情。

训练课程结束之后，大部分男同志加入连队，我们女同志则留下，又回到坤甸。

搞统战

在坤甸—山口洋来去往返期间，我住在群众的家，一边

休养种菜，一边跟小芳（张云香）一起去搞统战工作。

通过我们女兵跟军方搞统战有它有利方面，我们尤其重视跟西加军区司令 Diakuda 搞统战。有时他们去边界等地巡视，我们陪他们去，有时宴会我们陪他的太太一起出席。我们自由进出他们的军营，陪他们去飞机场，也有几次跟他们一起去打猎，打到猴子，我们煮了跟他们一起享用，大家皆大欢喜。温国宏有时带我们一起去搞统战，搞到很多布匹、衣服、粮食、武器、弹药等，全数呈交上去，自己却没有拿，或拿得很少。我们为革命搞统战，为之而努力，并搞出成绩，却被有的同志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作风，和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据说，在国际上文铭权跟中国、北朝鲜等国搞统战，曾运来了一船的武器装备，却被印方扣留，AK 等现代武器装备却用来武装他们的军队，换下的落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武器，还不是很乐意地供应一部分给我们。

通过搞统战，Diakuda 也给我们一部电台，在 Balai Kerangan 我们设立北加里曼丹革命之声，是由印尼战友主持的，也播放了几个月。我跟小芳离开印尼后方上了边界，参与王美鑫与杨丽娥所主持的电台工作。我们当时是属二支领导下的。

在逊空的时期

1965 年，我上了逊空，在那里，我主要是在甘榜地区搞民族工作。

在马印未围剿之前，我们享有一段安定的日子，生活也过得比较好。我们可以通过华莪站搞到油、盐、糖、布、粮食等必需品。我们还把搞来的布缝纫制（有三架缝纫机）成围裙、衣、裤跟达雅族换米、玉米、鸡等。我们也有种一些稻

米，收成了晒干，炒了捶掉外壳，我们做成干粮。那时我们还有吃到一天约半个牛奶罐的米。有一次，我们带了 20 磅的炸药去河里炸鱼，捞取的鱼可供基地近 200 人吃二天。这是沙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所曾经经过的一段最美好的日子，只能成为美好的回首，往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在反围剿初期，我还在基地外围战斗。我们不敢接触达雅族，因为他们看到印尼军队比我军强大，印军又用金钱与物质利益进行收买，这样达雅族就倾向敌军那边，并配合印军杀害我们同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较大的周旋的空间。由于我们民运组不是他们主攻的对象，还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人少还比较容易找到粮食。我们的处境还没有那么艰难困苦。

华莪设有联络站和供应站，是逊空对外联络和物质等供应的主要站和主要来源。我们三支也给钱要求黄汉他们帮忙搞盐等重要物质，但华莪空军基地打了之后，我们不但断了这个站与线，印尼当局也开始派大军向我们进攻。在“7.15”夺武战的前后，三支领导曾三次派同志去第二支队联络（其中我有去 2 次），第一次到时他们刚刚离开，第二与第三次去找不到人。在印尼围剿后，叶、杨还派小组 2 次直接进国内联络，但都没有联络上。其中一次是烈日与另一同志去，却不幸被捕。从而前后都断了联络，处境就特别困难，我们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步。

在逊空基地的反击敌人坚持打了三天三夜之后，我们转入森林坚持斗争。群众已不能联络，自己种的粮食不能拿，没有粮食，没有盐，敌人还不断的追击，我们陷入了忍饥挨饿、生病虚弱的艰难困苦处境。

一次，我们有幸遇上有整百棵的榴连山，派 2 小队专门守榴连山，负责捡和剥榴连，背回大队，每人分 5 至 10 粒不等，核也煮了，统统吃掉。

另一次遇上竹林，约 4 个月都是吃竹笋，吃多了，开始肿胀，感到乏力，不能走，整百人约有一半人失去了战斗力。

实在没有东西好充饥时树叶也照吃。有一次有位马当的同志叫鲁林声的，他想砍 Kalambai 树上嫩叶吃，他喘着大气、流着大汗才爬上一棵 Kalambai 树的第一枝桠上，正用力砍着树枝，不知咋的却整个人跌下来。还好肩膀碰上山边的泥土，才不致于头部直撞地上。过后救醒了，颈项却不太能动。这是因为没有什么吃，体质太弱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饥饿使得我们个个瘦骨如柴。我们女同志隆起的乳房渐渐平坦，而且月经也没来了（整 2 年半没有来）。有一次，我只吃了两粒红毛丹核，却昏厥了四个小时。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杨、叶领导人和许多同志都是可敬可贵的同志。他们知道，要坚持下去，只有九死一生。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偷生苟活。其实，要出去，偷生苟活很容易，因为敌军都在周围游动，只要不反抗，只要喊一声，就会送你出去。但他们能战则战，能走则走，实在走不动了，宁可自己留下，也不要拖大队的后腿。有一些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有的病倒了，有的失去了知觉——在这种情况下被捕。

1968 年下半年，我离开大队跟如安（海口区人）、亚林，在外小组战斗三个月，主要是了解敌情。十一月间，我们来到“九户甘榜”的稻芭一个小“朗高”住下，它是座落在一个半山坡。第一个晚上无事，第二个晚上睡到将近天亮时，我们被“举手投降”的喊声惊醒。我们意识到已被敌兵包围了。亚林说，争取突围冲出去！说完他首先从“郎高”的窄门冲出，一边冲一边开枪。顿时枪声大作，子弹从山顶、下面以及四周铺天盖地而来。紧接着，如安也冲了出去，枪声响得更激烈。待我正要想冲出时，整个“朗高”却坍塌了下来，我被压

在下面，卡在篱笆那里动弹不得。一大群敌人还冲过来对准倒塌的“朗高”扫射不停。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我伏着一动不动，以为我中弹牺牲了。一个敌兵一手从后领连头发用力向上一拉，我的下巴被上领钮扣顶住，旁边的一位敌兵手握刀柄，正想砍下我的首级，前面的一位敌兵看到我的眼珠不由自主转动一下，又见我抱住 Sten 枪在右胸前，就大喊“还活的！”“小心！有枪！”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印兵冲过来把我紧紧地压住，压得我右胸被枪顶住发痛，一这样我被捉住了。

敌兵检查我的身体时，却奇迹般的发现，在被一连（百多人）敌人包围中，被几十支枪扫射中，我只有背上破一点皮，流一点血。敌兵把我当作刀枪不入，另眼看待。我的双手被反绑拖走，我看到两位敌兵手提的青衣包裹还滴着血，我难过地意识到这是亚林与如安的首级。二天后，我被押到逊空机场，敌兵要我站好，在我的右脚边扔下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两位战友的首级。原来他们要拍下我与战友首级的相片。我愤懑的骂道：“你们缺德，无人道，杀死了人，还要砍下头！”。

在印尼扣留期间

1968年11月初，我从逊空被押到孟加影（有经过“三巴东”）在这里我住了将近三个月。

孟加影是一个军事要站，来去往返逊空与坤甸之间的必经之地。从爪哇和坤甸等地派遣来的各种兵种，都先集中在孟加影，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去华莪“围剿”火焰山部队，和去逊空“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我拘留在孟加影期间还是有士兵5、6千人。

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拘留营，只有临时的兵营。在这里把捉到的人审问了，初步定罪了，才押到根据案情轻重的监狱去。只是在1967年“7.15”事件后，印尼极右军人集团为了

虐待与迫害从华莪捉来的几百名华人，临时建一间又矮又小，闷热得要死的监牢。案情重的、就地枪毙。不死的，有的受到严刑拷打，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闷热至死。至于女难友不少被印尼士兵强奸，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后来驻军头目换了，实行怀柔政策，情况有些改善。

在此，手下有一万名边防部队的右派军官们，他们非常敌视我们这些政治拘留者。这些右派军官说一不二，不管有理无理，你都得立正，毕恭毕敬的说“是 Pak（尊称）”不能有异议与反对；否则就要遭到拳打脚踢。当时，刘月兰病重垂危，他们见死不救，不予以抢救，还好有位好医生挺身而出，抢救了她。

一次，我冲凉慢一点回，在回途中被右派一个排长拦住，他用手枪指着我的头，粗声恶气地说我替共产党送信，要我坦白交代，否则枪下不留情。我不为其恐吓所吓倒，我说冲凉就是冲凉，那儿都没有去！有胆你就开枪！

在这同时，管辖孟加影区军队也有一位三星级的军官名叫 Pak Indin，他待我们很好，实际上他救了很多被迫害的人。在刘月兰的病较痊愈之后，这位军官叫我带月兰去冲凉（整个月未冲过）。正当我们离开冲凉房出到房门时，被右派军官用小刀指着大声骂道，说为什么闯到 Pak 的房里冲凉，恐吓说要杀掉我！我理直气壮地回他说，是 Pak Indin 叫我们来的，你管不着！

我看到很多难友衣裤破烂，于是我向这位军官提出要求，让我帮这些难友补衣裤，得到他的准许。我被安排在一个女老板店里，收集了一些布块，用缝纫机取替手缝替许多难友补衣裤，帮他们解决了一些穿著的难题。这位女老板也很关心我们难友的情况，也提供了一些方便与必须的帮助。

在这里，一天只吃两顿，尽管吃不饱，但还像人吃的，我自己也种些菜。令人难忘的是，印共的人和孟加影的华人待我和难友们都很好，有时我收到不知名的好心人送来的药、吃的、做衣服的布等。有位自称是从山口羊来的梅姐，隔几天都会来到我们冲凉的对面河边“种菜”，很关心的了解难友情况和兵营内的各方面情况。

在一次偶而的机会，我在兵营内痛心难过地看到我们同志的人头相。我共看到一叠 22 张，最多的一张是 12 个首级，其他多数是几个首级拍一张。啊！这些是我熟悉的、出生入死、共患难、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与同志，竟被残暴的印兵与坏蛋砍掉首级拿去邀功行赏，把无首尸体乱丢在森林荒野！

大概於 1969 年 1 月底，我被押去山口洋座落在市中心内的“大暗监”的监狱。这里扣留的政治拘留者的案情比巴西兰的较为重些，因而管制也较严些。这里没有书报看，家属送进的东西可以拿，但不许会晤亲人。我进去时的编号是 974 号，这里至少关有 1 千多名难友。混凝土的两层监狱关有 4 座的男性政治拘留者。另外一边也有关几十名普通的刑事犯。

我们的女座只有一间的大概 5' x 7' x 8' 的小牢房，这个小牢房地面没有木板，只打一层洋灰，上层中的下面有一条灰柱支撑着。本来只能容纳 3 几个人的牢房，却挤进了 19 人到 22 人，就像挤沙丁鱼那样睡在上下两层，再加上各自的行李，更加拥挤不堪。更使人受不了的是，小牢房内只有在进出口的大门上方开有一个不到 1 ½ ” 正方的“窗口”，而大门又是紧锁着。因而即使睡在洋灰上，洋灰也是烫热的。还好监禁在我们女牢的隔房有一位商人，他有钱给狱长好处，因而他活动较自由，在他的疏通下，后来女牢的大门才没有关上。

在这里吃的条件差，大家吃不饱。一天只吃两餐，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开饭。菜通常是吃一条咸鱼，这种鱼骨头大肉薄，他们一股脑儿放在大锅里煮，下面焦了上面还不熟。通常喝的汤是温菜汤，水放一大锅（像煮猪吃的），温菜也没有洗，汤有些蓝色的，我们不敢喝汤，捞菜吃，有时菜还不熟。如果是豆菜汤还好些。只有等到有上头来监狱巡视时，我们每人才会吃到一节的罐头鱼。可以说，只有拘留者的家属在山口洋附近的，能经常带来食物等的，才会吃、用得比较好，否则就比较辛苦。梅姐的弟弟也关在这里，每次梅姐来看他，给他一份食品，也会转一份给我。因此，我的条件不会太差。有些男难友把收集到的饼珍之类做成小土油炉，卖了换取一些土油。有时把自己种的一点菜，煮了吃，改善物质生活。

在此监狱没有自来水，厨房旁边有一口井，仅够炊食用。所有拘留者用、喝之水要到10多分钟之外去挑。监狱用来扛水的水桶是用破半的电油桶做的。每天都有1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去扛水供大家用，大家得排队等待来领水。如果难友自备有盛器的，好心的扛水员也会帮你提上来。

被捕的政治嫌疑者如果案情重的又不交代的，就打得厉害。有一个马当人，男地下工作者，在印尼被捉到，他不承认、不屈服，被拷打得满身是血。有一对孪生子长得一模一样，当局不懂，但审查时前后两次名字都讲得不同，供词也前后不一样，因此双双都被打得内伤，甚至还要扛回牢房。盘问拷打了整10天，后来印尼当局才会懂得审的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女座的只有我一个是第三支队的成员，除了一个叫小兰的北加人在印尼后方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外，其他都是印共的成员，或印共普通同情支持者，有些是无关联的，不懂事的也被胡乱捉来的。

“大暗监”也关有几十个刑事犯，他们负责扛水、煮

饭，可以比较自由的活动。他们一直欺负我们四座的政治拘留者。有时我们战友领水领饭时，他们故意把一部分的水与饭倒在地上。A座的房头好打抱不平，他敢于出面伸张正义，为难友讲话，却被刑事犯怀恨在心，找机会进行打击报复。有一次，刑事犯把其他四座房门锁住，把A座房头放出来，6个刑事犯围住他猛敲狠打。房内战友们发现房头被敲打，大声呼唤求援，但看守人员充耳不闻，不理不睬。A、B座战友破门鱼贯蜂涌而出，抢救被打得重伤倒地的房头，其他几十个刑事犯也放出来，双方激烈的对打起来。由于他们寡不敌众，被我们硬硬压下来。看守人这时才出面调解，但无济于事。直至动用兵部镇暴队来才制止了这场殴斗。我们三座战友100多人被拷上了锁扣，在炎日下晒5个小时，有个别战友被晒得晕倒。经过这次斗争后，刑事犯再也不敢蛮横跋扈，之后扛水，煮饭则由我们政治拘留者自己处理。

也就是在这“大暗监”监狱期间，我听到叶存厚与杨柱中英勇牺牲了，他们的头也被砍掉。听说，逊空的最后3位同志（美鑫、秋兰和永光）在无能力反抗情况下，也被捉了直接押去坤甸。

山口洋的巴斯兰监狱是用三角铁和刺铁丝网围住的。男的政治拘留者有分A、B、C 3座，普通座容纳60人左右。A座是大座可以容纳多一倍人。女座也有2座，监禁的有130人。此监狱扣留了300—400的政治拘留者，没有关刑事犯。所谓“政治拘留者”许多是与革命斗争没有关联的，有些是华莪事件后胡乱捉来的。在此，没有管制那么严，家属可以来探访，我们可以自己种菜，有的还可以出去狱外打工。

这个监狱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狱长把我们这些扣留者当作他私人生财的工具。他跟外面的商人、资本家讨价还价、谈交换条件，然后把我们送出狱外，给商人、资本家当作奴隶用。有一次，有30多个扣留者被派出海边去煮盐。由于长期

不自由的关在狭窄的黑牢里，有机会到更广阔的天地，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也可以吃得较好些，因而付出劳动力虽然没有报酬，许多人还是愿意去的。也有一批女难友被外边雇主雇去当女佣，多数没做多久就讨着回牢房。狱长问因探究，整 10 个女佣脸都被掴得红肿都不要说。狱长后来问我，我说她们都受到欺负、虐待，不被当作人来看待，而且还要帮女主人洗月经布，这是衰事，她们那里要干！经过斗争后，后来情况有些改善。

男女难友有机会出外在一起干活，一些欲火难耐出了轨，东窗事发时，有的难友被盘问、拷打。有的女的宁可自己被脱光衣服，被打被凌辱，也不说出男的是谁。有的男被供出就打得半死。有一位女难友怀了孕，在牢内产了一个女婴，母女都瘦得可怜，没有得好吃，婴儿没有奶吃，又拉肚子，哭个不停。许多人都指责她，连她的姐姐也不能体谅她，使她十分痛苦。后来，我劝她，与其让婴儿饿坏饿死，不如送给人家。出于无奈，她才把自己的亲身骨肉送给了一个印尼军官，换取 4000 盾的回馈。

被扣留的女难友，有好一些被印尼军人强奸了。可悲的是，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同情与声援，反而被有些女难友自己奚落、嘲笑，或者互相奚落、嘲笑。其中有三姐妹关在一起，最小的 16 岁小妹也被兵强暴了，也受到有些难友的指指点点。我看不过意，跟姐妹们讲，我们应明辨是非，应站在受害者与真理一边，伸张正义，坚决同一切邪恶势力与压迫者作斗争。

我被囚禁在山口洋有 2 年多的时间，两次进出“大暗监”与巴斯兰监狱。后期我从巴斯兰调出，转到坤甸的监狱。

1971 年至 1974 年我是扣留在坤甸的扣留营里。这里也是用三角铁和刺铁丝网围着的，关有 800 多人。男座有 4 座，

女座有 5 座。男座有一座是专门用来关印共的，共有 40 多人。女座 E 座，只有关 10 多个（包括美銮、小明在内），其他一般只关 50 个左右。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 7 位女同志是关在 D 座，1974 年跟我们一起回国的 21 位男同志，大多数也是第三支的。

这里的监狱长，起初也是两头捞。他向资本家、商家捞一把，更多地榨取我们劳力赚来的血汗钱。一次我们难友 30 多人被派去木山干重活，一天工资约有 6、7 千盾，大部分工资进了他们的口袋，留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仅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生存与体力。

在此，我们可以种菜，也可以去砍柴，锯成一段段的，劈了拿去晒干，可以卖了来换取要用要吃的东西。我们女座 30 多人，一天可吃到三餐。

在此拘留营，我们听到印尼共西加省委书记苏菲安不幸牺牲的消息。

1974 年“斯里阿曼”事件之后，我们 30 位战友也离开了坤甸监狱，被遣送回砂拉越。

在那避空难忘的日子

刘月兰（苏明）口述
扬帆 整理

我是第一省晋连路 24 哩人，1965 年跟妹妹月英（后牺牲）一起越界到印尼去参加武装斗争。

在第二支队接受军事训练后，我就上了避空基地，我负责民运兼搞经济工作。我们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甘榜史鲁林与甘榜阿吉附近有设个公开贸易站。贸易站有时驻有 4 位同志，我们主要是跟甘榜达雅居民物物交换。我们设法搞到他们需要的盐、布匹制成的衣服等，换取我们所需要的米、玉米等农作物。一段时间我用缝纫机缝制衣服，一件 Yambu（围裙）可换取一筒米（约 $3\frac{1}{2}$ kg）。在与印尼的统战未真正破裂一年多时间，我们第三支队过着安定和不太差的物质生活。

1967 年 7 月 15 日，火焰山部队打了华莪空军基地后，印尼当局派大军向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围剿。原本华莪作为第三支队的主要补给线、联络处和供应站也被切断了，使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另外，印尼右派集团也在华莪实行“四光”（烧光、杀光、抢光、砍光）政策，把华族群众赶尽杀绝。我的舅舅一家除了一男一女走掉外，其余的全部在“7.15”事件后被杀害。

在敌人向避空基地围剿之际，我们一小队在外围独立战斗，照顾与护理王 xx 的生产。她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女婴，由于实在不能带在身边，只好交托一个达雅族收养。由于这里的达雅族经济生活条件和医药知识水平太差了，养不活这个女婴。听说，王 xx 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在敌人向华莪围剿时被带上山，不幸误吃了树籽中毒而死。

在第三支队战斗期间，我面对几次恶战，两次负伤，死里复生，这里我讲这一段风雨沧桑、毕生难忘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 5 位民运组同志在自己种的稻芭里遭到敌军的突击。事前不知道已经暴露，同时我们有听到猴子惊叫（看到人等之类才会如此惊叫），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当晚睡到将近半夜，在四周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立即伏下，拿枪还击。与此同时，两颗手榴弹抛到我的身边，我心想这次完了，但或许命运使然，命不该绝，手榴弹并没有爆炸。由于我们所处之地形不利，不宜久战，於是我们就退下山。当撤下山时，亚然、斯荣中队长与我撤在一起，其他两位却折散了。在转移中斯荣不幸脚部中到被人装的山猪箭，敷了药，勉强还可以走。沿山走了一段，我就向天空开三枪向两位失散的同志发出联络讯号（自己同志会辨别这种联络枪声），但没有回应。岂料，敌兵就在我们的前面，敌人朝向我们开枪。我们不想恋战，乘暗向联络站方向转移。天亮时我们还未撤出敌兵活动的范围。

我们时而潜伏，时而转移。亚然是个知识分子，由于还缺乏学习与锻炼，有指南针也不懂得跑山，只会在后面跟着。斯荣受了伤，需要照顾，有时还要扶着他走。一切担子几乎全落在我这个女同志身上。我们三个同生共死、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一起。我们履步艰辛地走了 6 天，大家仅靠一点的干粮充饥着。

转移了 7 天，我想探个究竟方向与位置，於是我爬上一棵小树眺望，啊！逊空山就在前面。我们高兴地探明了方向和所在的位置，便快速地向粮仓方向割去，幸运地找到粮食，但发现相隔一条河的两座营房被烧毁。我们带了粮食，转到另一个山头，在那里煮食了，再去联络站找联络。经过艰难和曲折，总算联络上同志们，并胜利归队。

另外一次上午，我跟高雄（蔡 x 联，晋连路 23 哩人）和一青 3 位在 4 里芭对面的一条垅上巡逻。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 20 尺前面有树动叶摇，又听到有声响。我们立即停止步伐，定神一看，发现一群敌兵在休息，站岗的敌兵迎向我们望来，我们立刻伏下开枪。火力一阵过后，高雄足踝受伤，我们边打边退，看到高雄移动缓慢，我就去扶他下垅。退到水沟处跟敌兵又是短兵相见，我拿的史登枪 28 粒子弹打完毕，就换一条新的子弹匣。我听到前面的敌兵被我们打得发出嗷嗷叫和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发现到自己的右膝流血，意识到自己中弹了。我环顾四周看不到一青同志，却看到高雄毫无反应躺在地上。我爬过去，看到他胸部中弹，呼吸也停止了。我把他的手表、枪取下，就退下战场。我听到敌人的枪声还不断响着。

在转移过程，我遇到敌兵的休息处，我怕暴露，就停下不敢转移。我蹲下等待时机转移。膝盖流血，我就用擦枪布绑住。夜幕降临，初时我还听到敌兵发出的响声。深夜里，朦胧的睡意中，我突然听到附近有声音，而且在不断的移近，以为是敌兵摸过来，我屏住呼吸，准备厮杀一场。再听清楚，感觉不像人的移动，后来听到猪声才断定是山猪，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我一直等到天亮，发觉没什么动静时，才慢慢越路，向总部方向割去。

背着两把枪，膝部又痛，走起来感觉很吃力。在下山时，右脚不太能用劲，就坐着屁股一步步挪动下去。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喊“是谁”“苏明”，才知晓遇到了自己巡逻的同志。他背着我走了一段，放下我说要回去叫同志们前来背我。经过艰辛劳顿总算回到同志们的身边。

回到总部，才知悉一青在未下到沟前就跑掉了，他回到总部说我们俩牺牲了。第二天营地的同志们到了地点去打扫战

场时，发现几个敌兵尸体和高雄的尸体，缴获几把AK枪。根据判断，敌兵是在慌乱中撤走，有些是自己打到自己，伤兵被带走。找来找去，却找不到我的踪影，估计可能我已撤离，后来派同志们出来巡逻才遇上我。

后来，又据群众反映，这次敌兵在达雅人带路下出动了整连（100多个）的兵力，竟被我们两个打得狼狈逃遁。我们的行为与表现，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与表扬。

还有一次，我们3男2女巡逻到达雅群众稻芭并在他的“朗高”睡。在这之前，我们也有听到猴子惊叫，但没有引起必要的警惕。在夜深人静时，我蓦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的同时，左肩感到一阵痹痛。我感到不妙，就连爬带滚让自己跌下“朗高”。我向下爬去，却跟钟梅遇上，我都讲不出话来。我拉钟梅的手放在我的伤口上表示受了伤。於是，我们俩一起撤下沟，又爬上对面山上停下来休息。

天亮了，敌兵沿着血迹跟来，还好没有跟上，他们沿着沟搜索去了。

我肩部还不断的流血。原来子弹是从左肩膀打进去，子弹留在体内。钟梅把我放在一棵树头下，就独自割回营地找救援。

钟梅回去报告，途中会出问题吗？会找得到营地吗？即使回都顺利，来时找得到吗？……我只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

第二天傍晚天已暗，我看到了不远处有打火机的联络讯号，知道同志们来了，我兴奋地觉得自己有救了。在检查我的伤口时，发现已经有虫在蠕动了。我被同志们背了几个小时，

才回到营地。

回到营地，才知道三位男同志被打散，完好无损，也回来了。我的伤得到护理，同志们是用纱布蘸了白色鱼肝油塞进我的伤洞进行洗涤与消毒时，拉到神经痛得我发抖。经过同志们细心的照顾，我的伤也渐渐地痊愈了，我又迎接新的挑战与考验。

我跟着大队在山里迂回转移坚持跟敌人回旋。我们几乎已到山穷水尽的极端困难的地步。能够找到吃到东西都拿来吃，还是有些同志饿死，有些病死，有些实在走不动停下来歇歇，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由于我受了两次伤，流血过多，又得不到很好的护理与补充，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我经常是跟在大队的后面。大概是1969年初，我跟黄祥明他们在一次转移中，又跟敌兵接上火，能打能撤都打了转移，剩下我、李雪娇和曾云锦跟不上大队，我们几个枪拿不起，人也走不动了，只能躺在半山边，李玉兰则留在沟下。要打要捉任由他们处置，我们已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了。敌兵走到半上坡，听到李雪娇叫一声“Pak”，知道我们未死，就把我们捉走。这些印尼兵，有些是左派或中间偏左的还不坏，他们叫我们抓住其背包后面跟着走，我才走几步，脚就软下去实在不能走。我叫这些士兵干脆把我打死。那些士兵说，要打刚才早就打掉了，为何等到半途。看到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给我水喝并安排一个士兵背我，一直背到“三巴东”。在此，我被扣留6天。在这里便有机会吃点盐，身体肿胀更厉害。云锦带我去冲凉，下到沟里爬不起来。云锦拉不起我，跟着一起跌入水里，差点双双溺死。蹲下小便也站不起来，还好亚青有时帮我拉起。此处有个兵营，并有直升机场。刚好那时是换防，直升机要载“三巴东”的士兵去孟加影。直升机只能载21人，机内中间行走的地上都放着背包装备

等。我躺在担架里，很占位置，看来右派士兵头目不打算把我扛上直升机。还好这里有位左派医生特别照顾我，他跟右派士兵头目据理力争。他带卫兵把直升机走路的中间位置的东西搬走，把担架扛上，把我带去孟加影治疗护理。

在里面时我已全身肿胀，出来时肿胀得更严重，已肿到心脏，医生跟曾玉兰讲，我只能活三天。但医生全力以赴抢救我，他用最好的药，细心照顾。打针时，曾玉兰看到体内水从我的打针孔处流出，她得到启示，认为可以用针灸方法消除我的肿胀。她向医生建议，也得到孟加影边区防队军官英丹的批准，叫赖秀连帮助针灸。经过 20 多天的针灸治疗，最多时一天换了 8 个米布袋（垫床铺用的），我的肿胀才消除。玉兰带我去冲凉，她说简直不敢看。整个身体只有皮无肉，像人体解剖体骨骼一副。平地还可以拄着拐杖一步步挪动走，稍为高出几寸就抬不起脚走。

1969 年初，我们三个登上直升机，从孟加影飞到三巴东，再从三巴东飞到砂拉越古晋。回到古晋，曾云锦坐在轮椅被人推着，李雪娇还可以走，我却被扛着走。敌方拍摄我们衣著邋遢、瘦骨如柴一副怪可怜的相，藉此散布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完蛋的言论。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直到身体较好时才被监禁在 6 哩拘留营。在牢内，有的扣留营内的同志对我们抱着同情的态度，有的投以鄙视的眼光，有的……。悲愤、冤枉痛苦等各种复杂的心情长期交集在一起。直到 1975 年，才结束了约 6 年的黑牢生活。



1975年出狱后隔天拍的，前左三刘月兰留影。

第四省的“四.三〇”事件

志阳



志阳留影

1965 年前后，第四省领导核心瓦解及林万品事件后，领导的重任便由古春辉（注一）自觉的负起。

第四省的革命组织，在经过 12.6 的大逮捕，67 年的万品事件及随后的几次大逮捕，革命力量明显走向衰弱。1969 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存革命力量。

在 69 年大约 8、9 月间，第四省革命组织第一次与中央取得联系，中央派 HT 与第四省剩余的力量结合后，便展开这里的“学习班”和初步的基本军事训练，以及组织农民的工作。

在记忆中我是在 1969 年 11 月左右转移到实务去的。而且当时还派了二男二女的青年到第一省海口区去参加学习班，并接受医药和军事训练。

1970 年，春辉、明华等在实务的鲁木村尾的灌木芭地建立一个小营地，营地建在两山之间凹处的小溪上，相信这是为了取水生活之便。

这次学习班约有 20 多人参加，由春辉主持，学习的内容是：《革命的目标》、《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老三

篇》、《革命组织的婚姻与原则问题》，等等。并安排一天进行军事基本动作的训练，这个学习班结束前还开一个联欢会。

4月29日下午3时45分左右，我走上营地右边的坡上，无意中发现有好几枝小树丫被折断的痕迹，心中有不祥的感觉，我很快向春辉作了报告。

当晚学习班的联欢会约在9时结束，9时30分学员们在H.T带领下被疏送回去。

经过整个星期的劳累，学员都离开了，大家似乎要好好睡一顿。

翌日凌晨5时35分，我起身煮水炊食，却惊愕地发现几个政府军在营寨门口举着枪大喊“举手投降！”。大家被喊声惊醒，睡在靠近门口的立信和传康睡得沉，动作反应较慢，还未跑就被逮住了。明华反应快和我及素华快速撤向后芭的溪边。敌兵见我们跑，就开始朝天开枪，听起来四周都有枪声，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我们三人很快伏下，溪边一棵刺藤蔓延地下的刺插在我们足手。海雄个子小，动作敏捷，他跑得离我们最远，春辉则跟在他后面。才冲出约50尺远（离我们约30尺），一位政治部官员命令其部属停止来福枪的扫射，自己用手枪瞄准春辉开两枪，只听到春辉站在溪水中喊着：“北加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慢慢的倒在溪边，双脚还在溪水里。在我们近距离的政府军枪口对着我们嚷着：“举手投降”！我们不从，但也伏着没动。政治部官员很快转身过来我们三人这边，示意部属给我们上手铐，我们坚持着说：“你们不要动，我们自己走”。当我们走上营寨后，就被扣上了手铐，枪声停了，但政府军还在周围进行搜索。

在营寨的一角排列着五支简陋粗制的枪支（实际上不能打）及所有被敌方缴获的文件。

春辉被枪击后，敌军一直让他留在原处，我们在 8 时半第一次听到他的痛苦呻吟，我们要求敌方做人道的药物处理，但他们不予理会……。约 10 时，我们第二次听到春辉的呻吟，我们再要求他们施药救治。并道明营里有药，但敌方官员说：“药不可乱用”。

我们 6 个将近中午时才被押步行而出。古春辉还死活不明弃置在里面。

我们 6 位被扣留在美里监狱 17 个月，在期间，我们开展了 48 小时有限期绝食斗争，反对虐待和争取政治拘留者应有的权益和合理要求。随后，又押禁在古晋 6 哩拘留营，直到 1975 年左右，我们先后才摆脱了监狱之灾。



公开斗争时期拍的古春辉

在东北的日日夜夜

一雁飞

开展第四省工作，把武装斗争推向全砂拉越以至沙巴，这是北共中央第二分局政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在当时OMT武工队直接领导下，武装队伍就曾多次从第三省深入第四省部份地区活动。一九七三年，一支十四人的队伍在吴队长带领下，深入到“格闽纳”河的实巴荷一带，可惜在欲渡过格闽纳河时，由于坏群众的出卖，与当局巡逻艇驳火，造成刘殿锐（胜意），吴培华（吴虎），吴春娇（学勇），刘连元（勇进），刘世广（小平），张自卿（坚强）等六位同志牺牲。这次事件加上接踵而来的“斯里亚曼”行动，导致武装开展第四省工作受到严重挫折，陷入停顿状态。

至到一九八〇年，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前身为OMT武工队），才又派出以吴松美（三民），梁娇芳（青松），郑珠英（海燕），姚忠源（坚思），李金焕（风雷）及俞诗东（怀武）组成的六人小组，对第四省地区作又一次更深入活动。这次为时八个月之久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一，对格闽纳河以西地区的地形，民情，敌情作进一步调查。二，对当地群众作宣传教育，扩大我军的影响。三，搞一批物质和经济。尤其是侦察“森林粮仓”的分布情况。（当时我们已学会制造“邦督粉”当粮食的本领。因此，侦察那里有“邦督”树，那里就是天然的“储粮点”）

这次的活动，超额完成预定目标，并且第一次见到普南、峇基丹、实加邦、肯雅及达岛等五个少数民族。为后来开展第四省工作，累积了宝贵经验。

筹建东北突击队

一九八二年，北共中央二局作出向东北挺进的决议。

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三支队的俞诗东、梁娇芳上边区总部，会见洪楚庭书记，探讨有关成立东北突击队事宜，

并探讨向东北挺进任务，出发时间及主要负责人选。一个月后，返回第三支队，著手筹建东北突击队。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在第三支队政委王连贵主持下，「东北突击队」正式成立。队员八位。委任正队长俞诗东（怀武）主管军事与主持工作计划、副队长李瑞金（武波）主管民族工作与协助军事、副政委刘华荣（星火）主管内部政治思想工作（正政委由王连贵兼任），以及詹雪娇（武英）主管华族群众工作、梁娇芳（青松）随队医生；刘赛凤（兰青）卫生员、高夏远（怀学）担任第一尖兵、方孝章（耀武）第二尖兵。

成立突击队联欢会上，王连贵代表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宣读对「东北突击队」首三年的战略任务。一，依据实际可能，对东北的重要地区进行战略侦察。二，根据实际情况，在恰当地区立下脚根。三，创设条件，以便迎接更多同志参加工作。

中央第二分局的指示，意味著这支八人之队伍，必须，一，在敌情、民情、地形三不熟的东北地区独立战斗三年，二，在三年内不但要保证队伍的安全，还要开拓第四省的阵地，以迎接更多同志的参予。

在我们前头摆著一九七〇年，古春辉同志在美里副县实务地的鲁木坡牺牲，导致第一次武装开展第四省工作的失败；一九七三年，OMT武工队派出十四人武装工作队，在格纳河失利而回的事例。任务是艰难的，前途是难以预测的。需要靠队员们破斧沉舟的决心。因此，相应的向队员们提出：一，不管遇到多大危险与困难，三年内保证不私自离队，二，已婚同志三年内不准生育，（当时刘华荣、詹雪娇、俞诗东、梁娇芳两对夫妇的年龄已接近四十而未生育），三，保证服从党的领导，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既使是这样苛刻的条件，每个队员都签下“军令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在全军指战员热烈的鼓励与期望声中，八位突击队员仅带上数千元现款及每人数十公斤的粮食装备，踏上东北征途。

突击队首三年的具体任务

根据中央第二分局提出的战略任务，突击队分为三个阶段执行，每阶段为期一年。

第一年的计划是：对格闽纳河及布拉甲镇以西地区作战略侦察。并适当开展各族群工作，搞一批战备粮。

有了一九七三年失败和一九八〇年胜利的经验，突击队顺利提前完成预期计划。往返两次格闽纳河与达斗河流域，相当广泛宣传各族群众，搞到一批经济与相当数量的战备粮，开拓第一个华区阵地——实巴荷。并在群众帮助下，越过格闽纳河，到达都包河流域后，又倒回邦丹河某一木山作第一次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同时制定第二阶段的工作计划。

第二年侦察的范围是格闽河以东至峇南河以西的地区，这对突击队来说是全新的地区，也是三年任务中最关键的一年。突击队员们精神焕发，全力以赴，为了工作加速挺进的需要，队伍第一次作了一分为二的佈署。由诗东带领娇芳、瑞金、赛凤四人一组去开展尼亚石山华区阵地，华荣带领雪娇、夏远、孝章一组坚持民族混合区及木山区活动，一方面继续进行经济与战略粮工作，一方面也起著掩护华区一组的工作，为期一个多月。

两支队伍集合后，人员又作了调整，诗东、娇芳、雪娇、孝章一组再次深入尼亚石山，并在群众配合下，第一次到达实务地的加拉毕坡。经过多次的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工作，华区一组开展了尼亚石山的尼亚路，沈庆鸿路，彭边生路，及实务地的加拉毕路、鲁木坡（即古春辉同志牺牲的地区）的华区阵地，并在群众配合下，两次用汽车到美里市及船溪马来奕地区作了初步侦察。而民族区一组同志也开展了渣河、峇功河的大片地区及当地部份华、伊及少数民族群众工作。

八五年十月，两支小队伍集合后，目标指向丁渣河中段的一个烂芭木山，成功动员群众用两部挂尾车，连夜行驶近两小时，直插马鲁帝郊区丹章里蒙。上岸后，沿著群众大路步行约二公里，经过侦察第二天清晨，突击蒲悦坡后山一户群众家。在那户群众热心帮助下，一天一夜连续

拜访多户群众后，又转去上游另一华区。经过几天的连续工作，基本上掌握了马鲁帝区华族、伊班族及市区的情况。

完成对马鲁帝郊区、市区的侦察，队伍又折返都包河某一木山，进行第二次休整，并按原先计划作两年一次的选举。选出俞诗东为党委副书记兼主持工作计划。选出刘荣华为正队长，负责军事工作。其他同志的职位不变。在休整期间，同时制定第三年的工作计划。

总结前两年的工作经验，及对东北广泛地区的民情、地形、敌情的逐步了解，我们对完成第三年的计划充满信心。

休整结束，集中队伍向东南方向挺进，到达马鲁帝副县弄拉玛，联系拜访部份当地群众和木山后，队伍向北倒回马鲁帝华区，在上一次群众的帮助下，又开拓了另一个华区，并让两位同志在群众带领下到马鲁帝市区作初步的侦察。

完成第二轮华区工作，突击队员向自己提出一项特殊任务，出国去汶莱做“亲善访问”。

对汶莱，除了从三邦（沙巴、砂拉越、汶莱）、地图上知道有一条马来奕河靠近马鲁帝外，其他情况可说是一无所知。我们坚持发扬不怕艰险困难，勇创新天地的满腔热情，选择马来奕河尾地图上一红点作目标，对越过国界，往返路程可能发生的意外作充份估计。经过二十天的奋斗，终于写下北加人民军与汶莱伊班群众关系史上第一章。

完成“亲善访问”后，基本上也完成中央第二分局赋予突击队首三年的战略任务。突击队员怀著轻松愉快的心情，满载东北各族同胞对我军的友好情谊，奔向渴望已久与老区战友见面的联络点—Kakus河尾。

回程中，突击队员又安排两次特殊的活动。一是花四天时间，登上仰慕已久的姆律山顶，把红旗插在美丽的砂拉越第二高峰顶上，二是花三天时间，游览砂拉越第一大河—布诺湖。为队员们留下一生中难忘，美好的回忆。这

可能是北加人民军史上仅有的有计划的旅遊吧？

一九八七年三月初，突击队员带著新添的些许白发，激动的泪花，以及东北群众的热情，在Kakus河尾预定地点，与老区派来的联络员，李金焕等三位同志热烈握手，拥抱，为突击队首三年的使命划上完美的句号。

完成任务的策略战术和基本功

有了正确的政策，还需有符合实际的策略、战术和基本功。

以下简介有关的各方面情况。

一，工作策略

根据中央第二分局战略任务的精神，及突击队精干和新区“新”的特点，突击队采取机动灵活，忽南忽北，声东击西，迂迴前进的策略，坚持以「秘密工作为主，公开突击为辅」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伺机出击的方针。

例如，在制定第一站的突击形式时，要考虑到第二站的目的地和目标，充份估计第一站行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在选择下一站突击目标时，要总结，探讨前一站行动可能造成的暴露，并作出适当的防范。在每一阶段的行动结束时，一定要制造假象，模糊我们的前进方向。

欲搞大批粮食，需要上木山总站时，也采取较低调形式，即由少数人穿便装带著随身武器，选择恰当的时间，联络少数木山负责人，了解情况，讲好物价后，再由少数工友用车或船载走。这种形式既能在短时间内搞到大批粮食，又能减低暴露的程度，赢得时间，赢得主动权。

当连续多次活动，可能暴露行踪时，来个九十度，什至或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因此，在首三年的活动中，虽然至少面对当局八次的“军事围剿”，每次动用的兵力都在五百至上千名，可是未曾大影响我们的工作计画。有两次在达斗河进行的“军事围剿”是在我们离开那地区半个月后才开始的。动用最多兵力“围剿”范围最大的一次“围剿”，应属一九八五年初。当局动用一千多兵力，“围

剿”范围东至峇功河，东南至丁渣河，西到达斗河中心指挥部设在“邦当河”的“德”木山。围剿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当时，突击队员正在邦当河“德”木山不远处另一小木山营作第一年的休整。我们一边在学习整训内容，一边数著直升机频频调兵遣将，从头顶经过降落在四面八方，一天竟达二十多次，但却始终没有影响我们的整训计划。

两星期的整训结束了，当局的“围剿”还在继续，可是在广阔森林的群众的护卫下，突击队却按自己的计划展开第二年的工作。

总之，有了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

二，政治思想工作

一支八人小队，远离领导和老区战友，到地形、民情、敌情三不熟的地区去创业，三年时间内除要面对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困难和问题外，还要面对和解决个人的生死、苦、家庭、爱情等的考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大事。

首先，突击队员根据各方面工作需要，从各单位挑选出来，保证其素质的可靠性。

其次，出发前的动员会、告别会、及队员们签下的“军令状”，也起相当大作用。

出发后，规定每个同志都要写日记，每星期至少两篇，每个月召开一次探讨会，开尽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同志还要写一份思想报告；每星期至少各上一次政治课和军事课，除学习理经外，有时也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学习、讨论、探讨，得到较好、及时的解决。

另外，每半年休整一次为期一星期，一年大休整一次，为期半个月。在休整期间，主要根据实际所需，对各有关政治、军事、思想以至日常事务性问题给予探讨总结。在两次大休整时，还出版两期“挺进东北”特辑，特辑的内容全部收集之八位突击队员平时所写的日记、时事、思想报告、报导等等。既回顾一年来，同志们对各种

问题的看法和体会，也总结了一年來各方面工作的經驗，增加新一年工作的信心。

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

新区的群众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地道的新区群众，他们对我军的认识很少，也未曾受到镇压。一般来说，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善、诚恳和热情的。另一种是来自老区的群众，分佈在各木山区、板厂、农村。这些群众对我军的认识较多，有些甚至是久经考验的老保干、老积极分子。不论那种群众，只要我们能充份动员他们，“适当”的使用，他们都可以作出许多动人的、积极的贡献。

比如我们多次用汽车到尼亚石山镇，实务地镇、船溪来奕（一个很靠近美里市的郊区）及美里市区作侦察，都是靠来自老区的群众协助；与不同地区的书信联络，甚至载个别同志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去与那里的同志见面，靠的也是来自老区的群众。

第一次要开展马鲁帝华区，工作前，我们只了解到峇南河的东岸有个“丹章里蒙”有数间小店，沿著小路可到马鲁帝巴刹，途中还会经过一些长屋和一个叫“埔悦”的华区有数十户华族，距离此华区上游数小时路程还有近十分户的华族（即提供情报者住家）而对峇南河西岸的群众十分佈情况却很不明确。考虑到行军路程可能造成的暴露，决定突击丁渣河中段一个木山，尝试动员及协助。经过宣传和了解，成功动员木山配合公司老板。由他亲自带三个工人，用两架挂尾车连夜驾驶近两个小时，到达“丹章里蒙”码头。上岸后，继续行车约二公里，估计已是埔悦坡的华区，时间已是凌晨三点钟，稍作休息。天亮后，先由两位同志拜访一户群众，在这户群众热情帮助下，一天一夜，我们有选择的连续拜访六七户群众，比较全面、具体了解整个马鲁帝市、郊区的地形、民情和敌情。

新区的群众第一要敢于动员和依靠。第二也要预防其不确定性，既是根据当地敌情地形估计万一暴露可能出现敌情的最快时间。而争取在这个时间之前离开，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总而言之，根据不同地区、民情、敌情，来决

定动员和使用，依靠群众的根据，即所谓“适当”的含意。

四，搞粮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军中缺粮，不战自乱」，说明粮食对军事斗争的重要。可是突击队却是「粮草未备，兵马先行」，凭着随身带著平均不到二十公斤的米粮，就敢浪迹天涯，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大地，创业三年。这不是突击队员是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本事，而是具备艰苦奋斗不怕苦的精神和独特的搞粮办法。三年下来，我们不但丰衣足食，既使在当局“围剿”长达一个月的期间，也从未缺粮，还在数十个不同地区屯集大批战备粮。

(A) 向大地要粮

东北地区得天独厚，遍地森林（当时）经过一九八〇年那次的侦察，发现不少地区长满“邦督树”。（一种象硕莪树的棕榈科植物）只要敢吃苦，改变几十年来吃饭的肚子为吃杂粮，带上一支手锯、斧头及一公斤铁钉，广阔森林里就有取之不尽的粮食。

遍地森林和人烟罕至的河流，也养育了数不尽的野兽和鱼鲜，更增添“足食”的保证。

(B) 向木山公司要粮

向木山搞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突击木山总站，召集木山工友作宣传教育后，用木山的车或船，运走粮食、用品。这种形式是在不怕暴露行踪情况下使用。好处是既能一次搞大批战备粮，又能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二是与木山工友（一般是有驾车的工友）约定联络暗号。当他们发现联络记号，就会到约定地点见面，然后，按我们的需要载来粮食用品。这种方式通常是在需要保密和具备群众基础上采用。好处是既能频繁的接触群众，了解各方面所需情况，也可积少成多的搞到所需粮食，物品。

(C) 向华区和长屋群众要粮

这种形式只有在群众区活动时采用，为了减轻群众的

负担，除少数他们主动献捐外，我们都用钱向他们购买路程所需的粮食及用品。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才会根据群众的可能，用钱叫他们采购较大批的战备粮。

以上三条是我们丰衣足食的法宝，总归一句话是“自立更生，依靠群众”。

五、过河

跨越东北近千里路，翻山越河在所难免。过河嘛，有桥过桥，无桥用船，（指不能涉水而过的河）本无什么稀奇。但在突击队越河史中却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趣事。

（A）过格闽纳河

队伍第一次到达实巴荷华区，先联系西岸群众，基本上掌握了两岸群众分佈情况及大部份群众的姓名，决定要过东岸去联系群众，根据已了解情况，选择要先拜访的群众住处，但我们对西岸初次接触的群众还不十分了解，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去向，不敢向他们借船，怎么过河？

（B）“走”水过河

来到峇功河一条不大不小的支流，两岸距离大约近百尺阔。你说它是河，却见不到水流，你说它是草地，可一脚踩下去，水会盖过你的头顶，原来它根本不是“地”。想找一处能过河的地方，上、下流各侦察二公里，都是一个样。想用老办法，即把胶布折成一条船，把装备包的“船”内推过去，却推不动。八条好汉都有十几二十年的军龄，都越过千山万水，就是没有遇过这样的“河”。要搭桥过去，却找不到这么长的木，真是八仙过海，绞尽脑汁，最后砍来大批的浮木，每数条绑成一排木筏，一段接一段的压在水草上，一次只能容一个人顶著背包装备，快速的踏伐而过。（因为速度越慢，木筏下沉就越深）这样一赵又一赵运完了装备，再“运”两个不会游泳的队员。

(C) 游过峇南河

一九八七年初，完成汶莱“亲善访问”，突击队员要倒回峇南河西岸与老区联络，为了避免行程的暴露，保证顺利的联络，决定回程的路线保持高度秘密。过河要保证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过河”。可是峇南河是一条好阔的河，而且是一条交通繁忙的河，载木舢舨，摩多船，挂尾车上上下下，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选择一处无人地带。白天就砍来八条大竹，到了晚上，先把胶绑成两条“船”。放上装备，在“船”的两边，各绑上两条竹，条面上再插上一些草和树枝，每条“船”带一个不会游泳的，由三个推著“船”向对岸“游”去。有船经过灯光照射过来，就停止划动。等船越过后，再划著“船”缓缓前进，足足经历三十分钟，终于“游”过历来渡过的最阔的一条河。

后记

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支队领导机关在王连贵带领下，已到达达斗河尾，突击队员回到领导机关禀报情况，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原第三支队全体队员投入东北突击队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一个多月的休整和计划，突击队分成两部份重新向东北出发。以李瑞金、刘赛凤、俞诗东、梁娇芳、李华健、余碧兴、林政本等组成的先锋部队，到民都鲁河后又一分为二，一组从华区经尼亚石山、实务地、船溪来突后到马鲁帝华区，另一组从民族区经峇功、丁渣河、弄拉马，沿峇南河下到马鲁帝华区集合后，队伍重新回到杜多河中段的本南区开展民族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招收数位本南族年青人参加部队。随后，李华健等一组留在当地工作。俞诗东、李瑞金、梁娇芳、刘赛凤带领两位本南新兵，向林梦河尾出发，并在当地未定居的本南族的带领下，见到了与本南族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瑞士画家布诺曼舍，并和本南族同胞一齐生活了一星期。

领导机关近二十位成员在王连贵带领下，随后出发，经民都鲁河，布拉甲等地区活动，并计划两年后，与先头部队在丁渣河集合。他们在活动中，也招收了两位普南族

新兵。从此，掀起少数民族工作的小热潮。

一九八九年，马来西亚共产党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三方和平谈判成功，对我们起著重大影响，促使我们提前集合，研究新形势的发展、变化。

中央第二分局经反复研究后，认为与砂州政府和谈的条件已经具备。从一九九〇年三月至十月，经双方代表多次反复商讨后，终于十月十六日在古晋签署和平协议，东北突击队全体成员于十一月三日从丁渣河的弄山牙地区走出森林，乘坐当局提供的直升机到达美里。除少数队员留在美里外，大多数队员继程回诗巫这阔别已久的故乡。从而结束了东北突击队的历史使命。



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之真相

—老友

狱中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乃是当年9位狱中战友，为了要求监狱当局取消强施予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处罚，而展开长达8天的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

事缘于1971年10月6日，狱中官员带领了大批狱卒到A座搜查，被战友发现，於是一些战友便在大门口，高喊口号，抗议当局的无理搜查。狱官见状，无可奈何，只得撤离。过了两天，狱方与座内值勤官员先联络好，乘战友们在中午休息时，调来大批警方镇暴队，手持枪械，驻守在座外，然后狱官带来了大批狱卒。手持盾牌、警棍，凶神恶煞地，突然冲入A座搜查，翻箱倒篋乘机破坏一番，并掳去一批书籍。面对狱方的无理捣乱，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情绪激昂，高喊口号，怒斥狱方官员的胡作乱为。

10月9日，营长便点名召见9位战友，即是陈宗明、丘恒山、丘立诚、黄绍隆、林永伦、钟吉祥、许乃泉、苏孙国及朱兰光。在其办公室，营长宣布9位战友从当时开始即刻被处罚个别监禁在石屋的隔离室为期2个月至6个月不等，并取消政治拘留者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包括不准会见家属，不准拥有书籍，不能听广播，与外界完全隔绝。随后，营长便命令狱卒即刻押送我们去石屋隔离室。对于狱方强施予我们身上的无理处罚，我们即刻提出严重的抗议，并要求营长即刻收回一切不合理的处罚，让我们回去原座，但营长则一意孤行，强押我们至石屋隔离室。我们被个别囚禁在一间4' x 8'，没有窗口，墙壁只有一个6" x 1'通风口的囚室里。里面空无一物，只能睡在洋灰地板上。

从办公室至石屋隔离室的路上，个别负责同志认为与其被囚禁在这人间地狱的囚室里，坐以待毙，不如采取坚决的斗争，即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以争取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处罚。於是到达石屋隔离室后，便通过墙脚的通风口，争取大家一起开展无限期的绝食绝水斗争。

按当时 9 位战友的实际情况和对方的情况，牢内外的形势及事件的本质来看，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到底，是有可能达到目标的。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即刻开展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直至胜利为止。

这场斗争是从 1971 年 10 月 9 日开始。斗争的前 4 天是在石屋的隔离室内展开的。大家时而唱歌鼓励，时而喊口号抗议。斗争至第 4 天，在家属和广大社会人士及狱中战友的大力支援下，有关当局有鉴于事态的严重，绝食绝水者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因而可能引起不利的影晌。于是训示狱方把我们移至营医院。在营医院，狱方准备为我们打水针，但遭到我们坚决拒绝。斗争进入了第 8 天，即 1971 年 10 月 16 日，有关当局才不得已与我们谈判。最后，有关当局只得同意取消施于我们身上的处罚，但不准回原座，即 A 座。而在营内厨房，另辟一新座即 A2 座，继续扣留我们。基于我们的斗争目标已达，亦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於是我们同意结束这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虽然面对死亡的威胁。到后期，牙龈肿胀流血，小便时，流出的是滴滴的血水，鼻孔也流出点点浓浓的鼻血，身体枯弱，几处晕迷状态。但是，在正义的感召下，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条件，大家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誓死不屈，坚持到底，终於取得最后的胜利。

注一：本文为亲身参与此场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者所写，乃如实反映当时身历其境之实况。

注二：《墙内岁月》一书中，第120面至121面里曾提到绝水斗争，及友谊丛书之一《往事》一书中，第54面至55面也曾提到绝水斗争。此二篇文章与本文有些出入，诚请知情者翔实核查之。

09-10-2004

附件：参加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历史资料）

1971年10月，我与其他8位A座政治拘留者被调往隔离室处罚，由2个月到6个月不等。结果在大家同意下开展了无限期绝食绝水斗争。要求营房取消处罚，将我们调回A座。从1971年10月9日开始到16日为止，经过8天的绝食绝水后，营房基本上答应取消处罚，并把我们调到A2座。当时参加绝食绝水者有：

丘恒山、陈宗明、林永伦、钟吉祥、朱兰光
丘立诚、苏孙国、黄绍隆、许乃泉



陈宗明



丘恒山



丘立诚



朱兰光



钟吉祥



苏孙国



黄绍隆



林永伦



许乃泉

建立新村-变相的集中营

-江宏

攻打 18 哩警署

1963 年，印尼苏加诺(Sukarno)总统宣布对抗马来西亚，从此便派军队到边界和越界到砂罗越境内，攻打警署和哨站。

1965 年，一支由北加国民军和西瓜哇“山蝎公”特种部队(Sri Tenpur)正规军所组成的队伍，活动到西连县一带，驻在古晋西连路 29 哩。来之前他们上级交待了一项任务一炸飞机场。他们曾多次派人去飞机场侦察，看到机场主要是民航机，军用机只有个别架，而且有一定的戒备，同时，又考虑到飞机场离边界较远，若开展行动后，在撤回边界的过程会面对围追堵截会有较大的危险。但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若没有完成任务回去设法向上交待。於是，他们进一步商量，决定改变计划一准备攻打 18 哩的警察署。

他们的攻打计划不但未呈过砂盟第一省的领导人批准，而且遭到本地区同志的反对，但他们执着顽固，一意孤行，同志们阻止不了，为了减少损失，只好给予协助与配合。在地方干部赖同志等的配合下，对该警署进行了认真周详的调查观察。

经过商讨研究之后，他们做出这样的布置行动计划：行动时间是 6 月 27 日晚上约 9 点多，乘戒备松懈之际，印尼兵就向警署发动进攻；之后就向天空发射一颗讯号弹，紧接着一组地方同志在 24 哩炸巴杀之长桥；另外各组分别在 9 哩等处公路上倒黑油，有的地方还放铁钉板和设下障碍。同时，行动之后，进行除特计划。

18 哩警察署是座落在一个小山岗上，里面有 9 名警员在西门彼得宁甘（首席部长加加隆宁甘的胞弟）警察的负责下值勤。这支攻打的队伍，在一位西加的华人在这一带做工的名叫余等的带路下，在夜幕底垂时，本地同志刘用罗里车载了从晋成路 24 哩出发，悄悄地潜入埋伏在警署的周围。他们静静地潜伏着，观察周围的动静。行动时间快到了，他们开始剪篱笆，摸进警署。事先未有任何征兆，也没有做防备的警员们，被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攻击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警署，打死西门彼德宁甘和另外一名警员。他们占领了警署之后，立即销毁了警署的通讯系统，缴获来福枪、轻机枪、卡兵枪共 6 支，手枪一支，中型机关枪一支，讯号枪一支，几十箱弹药。行动后，这支印尼军队就向西南边界撤退。

为了阻止西连来路的援军，支援印尼军队赢得时间撤退，我方同志成功地炸毁了 24 哩大桥的一部分，使大型车辆无法通过（小型车辆尚可过桥）。

同样的，从古晋开上的多辆装甲车，到了 9 哩和 17 哩而无法通过，其中还有两辆车在向前奔驰遇上黑油而翻复了。

在攻打行动之后，地方同志在 18 哩和 24 哩处各处决了官、尤等几个特务分子。

在配合了印军军事行动之后，地方同志就撤到 24 哩，在此逗留了一个多月。看来实在很难再立足下去了，赖连秀、曾荣光、张玉英等 30 多位同志（仅留下张月娥）连同一位攻打行动中背部遭火箭炮灼伤的印尼兵（名叫西蒙），就一起撤向北印边界，到印尼境内。

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

当晚敌人乱作一团，不断向天空打照明弹。第二天，公路上军车、大炮车、警车隆隆响，宁甘政府调派来各种兵种和警察带警犬进行大搜查、巡逻和驻扎，军用直升机也在上空盘旋和撒下传单，宣布戒严，并逮捕几十名人士。

政府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均为地下共产党分子和当地群众配合所为。於是，7月6日，政府开展“铁锤行动”，加隆宁甘宣布：付诸“铁锤行动”的目的，就是“用铁锤打共产党份子，在共产党人与革命分子棺材上锤下铁钉”。

政府为了恐吓群众，镇压革命，开展什么“邮箱行动”，强迫14岁以上村民提供革命的情报，并进一步逮捕嫌疑分子。

其实这种强行隔离策略，就像德国殖民地时采用的“囚笼”政策，在50年代初也在马来亚实施了。英殖民者在最高专员邓普勒(Gen. Gerald Templer)上任之后，就实施了“布里格计划”(Brigg's Plan)，把将近60万华人迫移入在城镇附近550个新村，以割断马共的人力与物质的供应。这个坚壁清野的新村计划，给马共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削弱革命的发展。

砂罗越的革命发源地是第一省，而晋连路从10哩至5、60哩，尤其是17哩、21哩与24哩一带又有“小延安”之称。这一带华族群众普遍积极支持革命，7、8岁小孩就会为我们同志放哨、送信、送货；妇女家除了放哨、送粮，还为同志们准备干粮。有的老伯每天磨豆，卖豆腐，把收入全交给革命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约有三分之二加入农会或北盟，参军的有上百人。人联党在24哩成立了分部，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为革命组织更进一步大力发动、组织、宣传教育群众

创设了公开有利条件，使党更能以人力、物力、经济等方面支援了革命斗争。显然，敌人对晋连路人民的革命斗争与积极行为恨得要命，他们借题攻打警署事件，伺机进行报复。

攻打警署隔天凌晨五时，晋连路 14 哩至 26 哩的居民得到通知，携带三天的粮食、衣服用品、灶具、软细等，分别到 15 哩、17 哩、19 哩、20 哩半和 24 哩的 5 个站集中。

新村苦难的日子

村民集中到了各指定的地点，被分配到各学校暂时居住，有些栖身于临时用“加央”搭起来的一间间的长寮里，而四周则用铁刺网围成篱笆。

最初是 48 小时的戒严令，后又延长到 10 天，以至最后建成了永久的新村。

到了第四天，村民才获准每家派一人回家园巡看，并喂养家禽。由于离得仓促，家当又太多，许多人只能搬一些轻便的家私和必须用品，等过几天回来时，发现到草木皆非。由于家园无人照料，家中的物品、农作物、家禽等遭人偷窃。眼看辛苦开垦的农园以及住了几十年的老家将荒芜，甚至毁于一旦，怎不教人痛心难过！目睹这被折散的可爱家园，听到挨饿的猪狗嚎叫，想到这一切凄凉悲惨的景况，无不使人痛心流泪！

由于地方狭窄，而人又多，加上不习惯，又适逢旱季，每晚都要挤上一、两百人，真是一片乱糟糟，苦不堪言，在缺乏完善卫生设备的恶劣环境里，无辜的妇孺及老弱者挺不住而病倒了。杨月梅烈士的父亲，不要限制集中，在老家吃除草药剂

自杀。温三德的哥哥在暴日猛晒下中暑昏倒，当时的军警不准农民前去为他抢救，以致不幸去世。

经过一、二个月后，居民通过抽签，每户分到将近 25 点之土地和津贴金 1500 元供建新居。这样，14—20 哩的居民约有整千户搬进 17 哩的新生村(Siburan)，22—26 哩的居民约 300 多户搬进 22 哩的大富村(Tapah)，中间地段的居民约 200 多户搬进 21 哩的来拓村(Beratok)。总共有 1 千 5 百多家，初时受影响居民不过 9000 多人，到 1980 年解除时，约有 24000 居民被逼入这方圆 600 多依甲的范围内。

所谓“新村”，可谓是当时全砂罗越华族农村中最贫苦的地方。初时，住的是空无一物的小茅舍，或有柱无墙的棚子，甚至有的是过去供作养鸡的棚子。屋檐低矮，又没有天花板，炎日骄阳之下热气难挡，实在受不了！“屋”脚踏之地不是木板，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泥土。厨房、床铺、隔房等都得自己动手做，甚至还得自掏腰包。

新村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养些鸡、鸭、猪之类禽畜，也种些菜类。多数粪坑就挖在后门的泥土里，他们就用粪汁来浇菜，臭气随风飘扬。由于自来水站有限，用水、食水要去远处载，非常不便。有不少村民在屋旁挖个水井，作为冲凉、洗衣和浇菜用。可是，一旦下起雨来，溢出粪坑的屎尿，鸡、猪屎和脏物到处泛滥，你要讲有多不卫生就有多不卫生。

当时，突然间要放弃长期辛苦经营的家园，被迫限居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得从零开始。虽然当时政府有津贴一人一天一元（后来只有五角）如果没有储蓄有钱，生活是苦不堪言的。许多家庭是靠养些禽畜、种些菜和出外打些短工来养家糊口。有的妇女跟人家采胡椒或割稻等，晒得头昏脑胀，一天才赚四块钱。男的做粗工，也不过是六、七元而已。初时，不少

穷家庭揭不开锅，孩子无奶吃，有病没钱医。许多人都认为，一生中所经历的生活再苦，也没有像新村的那一段日子那么苦！后来有些家庭有去租地来种稻，种稻虽苦些，生活总算有些好转。

村民们限居在用两重铁丝网围住的限制区里，进出必须通过栅门，接受检查、问话。村内的每户家庭都有户口登记，随时会受到人口检查。亲友到访过夜，来去必须预早报官登记。每天早上六时栅门打开，傍晚六时关锁，1970年后方才逐步放宽从早上五时至傍晚七时，不得超时回到限制区。新村和工作地点的距离远，村民出外工作不如以往方便，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回，给了他们不小的麻烦与精神压力。至于要离开限制区以外的地方，则需要申请特别的通行证，而准证在一、两周内更新一次。

同时，粮食物品也受到统制，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村民走出栅门时，所携带的任何粮食或用品皆受检查，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到村外农田工作，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许带够吃的饭，不可带未煮的米粮。至于药品的控制，更是严格。

除了人身行动失去自由之外，政治权利也被剥夺。村民一段长时间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举行集会及申请国际护照。村民的种种作为公民权益的受到剥夺，完全受到军方管制，新村形同变相的集中营，却美其名曰“新村”。

除外，被逼迁入新村的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特别是第一省以外的地区被押进“新村”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惨况只有当事人才深有感受的。

在拉让江地区当局也是强行建立几处的伊班新村。华人的新村还未建立起来，却有一些革命家属和群众中的积极支持者，1970年前后也被逼迁入第一省的华人新村。诗巫和泗里街

等拉让江地区的华族共有约 30 家被迫迁入新村。1966 年 1 月 5 日，靠近北印边界的打必禄(Tebedu)地区也有 70 家约 400 人被迫进入来拓村与大富村。第四省美里也有一家革命群众被迫去古晋“新村”第二省英吉利里也有 4 家被押进了如同“囚笼”内（注）。

到 1975 年，那些来自泗里街等地的居民才获准先后离开新村，回返他们的家园。新村的正式解禁是在 1980 年 3 月 5 日，那时才解除所有的限制，村民可以重享自由的行动，出外不再需要申请准证，出国也可以申请护照。

“新村”对人民来讲，绝不是什么“新生”好的开端，也不是什么“来拓”新家园，更不是什么“大富”。在历史，给人民的记忆，“新村”不过是变相的集中营！

（注）：

英吉利里被迫迁的 4 家：黄南祥（仁千家人）、蔡祥（三琴父亲）、杨抛和燕寿。

范明华的母亲与三个妹妹是第四省唯一的一家被迫进第一省新村。

拉让江上游广东芭被迫迁了 2 家：江玉芳（先余家人）和李玉霞（黄天水爱人）。

诗巫乌也路被迫迁 2 家：黄福庄（理生父亲）和黄爱祥（仕武家人）。

1971 年诗巫市对面江宋溪米禄一带被迫迁 2 家：江若勤（丽妃家人）和赖国信（子铨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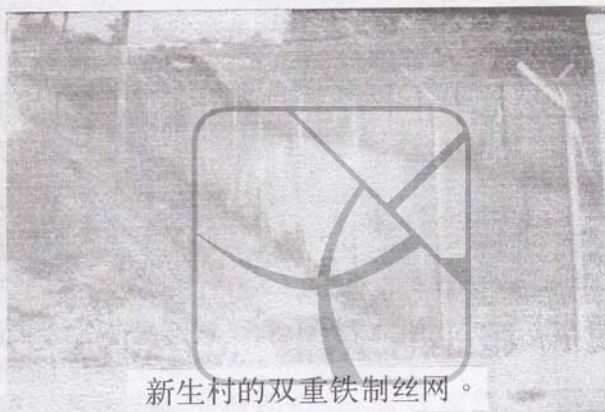
民丹莪被迫3家：曼光坡的线程火（功涛家人）、范细妹（碧玉家人）和诗巫路姓叶一家。

1969年8月至70年泗里街被迫迁的有：朱景水、黄育明、卢家保（美珠家人）、杨尚述、陈德天、王受琛（振基家人）、刘扬魁、王世箴（焕朝家人）、朱兰强爱人、詹碧娇（朱兰光爱人）、王致赠（世强家人）、谢朝宁（美珍父亲）、谢建启一家、李昌盛（清希家人）、徐玉金（卢友爱母亲）、刘忠越（贤庄家人）、林时钿（爱玉家人）。





建在 18 哩岗上的旧警察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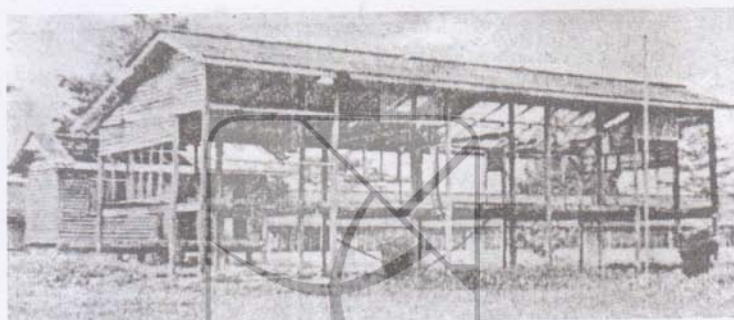
新生村的双重铁制丝网。



21哩来拓村之四周铁丝网



这是60年代中建的木屋，新村居民住处



这座破烂的建筑物是当年的关卡，村民进出都得在此申请准证。



1965年的新村

伊班新村

—江宏

建立新村，这是当年统治集团对付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一种斗争策略。

在砂拉越拉让江地区，面对日趋严峻的武装斗争局面，当局有计划准备在拉让江华区建新村，但还未实行。他们除了没有间断地陆续逮捕革命同志与群众之外，从1969年起，他们就先后把泗、丹、巫和逸各地的有关革命群众迫迁进第一省的新村，既可以起着杀鸡儆猴的作用，又可以断绝军民的鱼水关系。

1972年，在拉让江的OMT和中游两单位，就有74座长屋1154家，有7649人被迫进四个伊班新村。

1972年2月，我军在OMT的乌也河尾处决了Penguru lman(本古鲁伊曼)、打死打伤了几个民防队，接着在乌也路30哩捣毁公务局数百万元的车辆，当局就在乌也路28史瓜奥(Ulu Sekuau)建新村，硬把达斗河尾两座长屋60家和Oya河尾的6座长屋约340家总共有2400人居民迫进史瓜奥新村。

为了实现其建新村的目的，当局对伊班人进行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又吹又哄什么：“到那里建新村，你要什么有什么，有戏院，有水电，有政府办公，有农业部，有商店买东西，有……，应有尽有，不愁生活！”又说：“搬进去会得到安宁，有保安部队保护，还会给予你们计划生产，发展经济……。”看到居民不肯离开经营多年的家园，他们又恐吓：“不去，我们将派兵用直升机把你们拉去。”他们甚至逮捕个别一些有威信，坚决不离开的屋长和居民，使居民害怕，不得不去。

据说，1973年史瓜奥新村委员会主席曾到达斗河尾二座长屋住一段时间，他还向群众把“新村”吹得神乎其神。当人与随身带的东西上了直升机后，剩下未带走的农具、家具等杂物连同长屋、“朗高”一起被烧得精光。鸡、鸭、猪狗等家

禽畜生却被那些人宰杀吃光。

初期的新村问题特别多，群众无不怨声载道。初时在稻还未收成之前，有关当局给群众每人一个月补贴四筒米、一小包盐、一小包糖，孩子多的还补贴得更少。这么少的配给怎么够吃呢？群众只能半饱半饿地熬着。在老家时，虽然“朗高”简陋破旧，生活清苦，但有广阔的土地，要种木薯、青菜等可自由种植，而且有广袤的森林，可以自由的采摘野菜、野果和狩猎，可以逍遥自在的过日子。况且，新村的土地瘦瘠，一户只分给二依甲的山稻地，这对原是刀耕火种，一年换一块新芭的伊班兄弟来讲，怎么会够吃？当局也没有提供更好的职业，可以说，迁入新村后处境是每况愈下。

搬进新村后不见得安宁，也不见得能得到保护。有带来的鸡鸭，一转眼就不见了，根本没法养；谷晒在屋外，还未收进室内，就不翼而飞；妇女被调戏，少女被搞大肚子，争风吃醋、桃色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居民仅获得一丁点的补贴也被一些贪得无婪的人吃掉；有的居民还被迫参加“自卫团”，晚间还得放哨守岗；当地有些群众中的坏分子被唆使去欺压新村中的支持我军的群众……

OMT单位还有一处一加拿逸卡巴（Kabah）河的几座长屋群众也被迫搬进新村，但受到坚决抵制，当局也只得不了了之。

1972年，当局在拉让江中游牛麻（Ngumah）的河口南光（Ngungun）和河尾查苟（Jagau）建立二个徙置区一新村，把几十座牛麻与Poi的几千名伊班群众强行迁进。中游的二个新村，跟OMT的大致一样，也不会好到那里去。

为了缓和人民的情绪，后来有关当局在新村有实施一些发展计划，进行一些基本设施建设，生活也有改善，后来也逐步放宽对新村居民的管制。到了90年代开始，政府也允许他们可以自由回归自己原有的田园。



拉让江中游的查苟新村



“新村”的难忘日子

徐玉金口述

凯锋 整理

1970年3月一天的凌晨3时分，家里的狗突然吠得很凶，我躺在床上感觉到屋子周围有不寻常的动静。我起身悄悄的打开一点窗子望下，发现众多的全副武装人员在下面走动。心想：莫非又要冲著来抓我家人？心未想好就听到“咯，咯…”的敲门声。我闷不出声，也不去开门。瞬间，又是“嘭，…”敲得更急，对方还大声说：“是政府人员叫开门，有事找你们！快开门！”我踌躇了一阵子说：“你们是做什么？家无男人，全是妇女小孩，三更半夜我不敢开门。”对方一再作出保证无事之后，我才打开门，十多个持枪的十八闯了进来。我被通知携带一些简单的衣物下市区。我一家3个就被他们用卡车押送到泗里街的中华商会会所，作为临时的住所。

7家（注）约有几十人拥挤在狭窄的会所里。用餐时拿包来或给苏打饼，大家一涌而上像难民一样抢著吃。我孩子不够吃，我跟 Amat 讨：“我孩子多，希望安排一些吃的。”他看了我这些差龄的孩子怪可怜的，不得不去拿一些牛奶等吃的。

在下面时，有关当局 L 头目找我，给我施加压力。他说，要钱、要电单车可以给我，只要我接受他提的条件。我琢磨他的条件，是苛刻的，有损做人的尊严，我不加以考虑，当面婉言谢绝了。他恫言，看我将你全家押往远处，说孩子这么多，没得好吃，会饿死的！我心想，没有他们的“恩赐”，看我孩子会不会饿死！

大约一星期后，我们得到通知，要迁进第一省的新村。我听了感到愤满填膺，要放弃多年辛苦经营的家园，去那渺茫、生疏的地

方。但在枪口威逼下，我百般无奈。於是，我要求先回去搬些东西带出去。於是，他们押我回家。有个政府工作人员催促我赶快，并说我“很坏”、“很凶”…。我本来就愤懑，又听到这么催骂，真是火上加油，我冒火，用力关门泄愤，怒骂：“我坏？我凶？打死我算啦！我不出去了！”我久久不下楼，下面有两辆兵车在等着，他们在焦急地等我，我赖著不走，执意跟他们扭着。夏只好耐着性子，打圆场，说了好多的“好话”。僵持了好久，我才下楼上车。

两辆军用卡车载着我们七家人，向着第一省方向疾驶而去，直到晋连路 17 哩。

逼迁进了“新生村”

晋连路 17 哩的地方叫 Siburan，华文叫做“新生村”，由村后一座山而命名的。新生村占地 290 依甲，篱笆方围 3 哩。当时有 700 多户住户，人口将近 7000 名，大约是 14 哩至 20 哩的居民集中在此村。

我一家人被安排住进第 7 路 459 号在山顶阴森森的一间小木“屋”。木屋的顶是沙厘盖的，家徒四壁，屋内空荡荡的，地板是泥土，污秽遍地。听说这个屋子过去有死过人，后来拿来养鸡，非常肮脏。原本有四个房间的大屋，却住进了比有的鸡、猪棚还不如的小“屋”。来此地见此景，大家都感到心酸难过，孩子们无不泪水涟涟，有的哭得很伤心，甚至哭到哑音。不少左邻右舍的客家人来围观，一个不怀好意的客家人冲着我又骂又唬道：“活该的坏人，休想离开此地再回去了！”在我们落井时有人不但不伸出救援之手，反而加上石头压下来！我坚定答他：“你用不着幸灾乐祸，上苍会有眼的，他会开路给我们走的！”

刚来到吃什么呢？他们拿来了旧黄的粗糙米，用大珍装着的老爷咸鱼分几条，这就是一餐，叫大家怎样咽得下？当时最小的三个

孩子是莺、清和燕分别只有6岁、4岁和2岁。他们饿得直哭，边讨牛奶吃、我手头没什么钱，只好向新村当局讨2、3罐牛奶给孩子充饥。

天快暗了，有关当局人员拿来了几块湿板，就当作床板铺在泥土上睡，这怎么能睡的？我要求他们拿几块三夹板来铺着睡。后来要求他们隔出一间房间，做一张睡床能挂2个蚊帐，8个人就睡在这个床上。

再说，这个小“屋”，沙厘盖得很低。在艳阳天的日子。“屋”里的干燥闷热，真是受不了，只好花几十元叫人在沙厘下盖一层亚答当作天花板，才凉爽些。除外，下些雨来还要用桶盆来盛水，这那里是人住的地方！

没有灶怎样生火煮饭、煮菜？我只得找个空饼珍，把上面盖全部开掉，正面下向开个洞，把黄粘土放进堆成“灶”，把这个“灶”放在客厅，把干放进生火就可以煮饭了。

到了新村后，我抽空去集中营探望外子。我把全家逼进新村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申请去新村看看，帮助处理一些问题。外子1971年1月2日才获得释放，又限居古晋范围2年。不过，他有申请来新生村，他来后有去工地找一些木板料，帮忙隔出了一间6方尺的小厨房，才不用珍饼来煮饭。

到了人地生疏的环境，两手空空，一切得从零开始。我得感谢附近有7、8户客家人好心送来米菜等，使我感到人间还有一点温暖。

困苦的新村生活

有了挡日避风遮雨的栖身之所，面对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

我感到忧虑彷徨，往后如何生计？虽然最初一年有津贴每人一天 1 元（后期只有 5 角），我家每天有 8 元的津贴，但根本不够开销。须知，每跑一步都要用钱，比如那时来回巴士费每人是二元六角，仅此可见一般。身既无积蓄，且没有收入，生活毫无保障，这是没有明天的日子，形容“无隔宿之粮”也不会过份的。那时，可谓人人心情沉重，在彷徨无助之中！

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想办法，找出路，我首先争取打些短工，增加一些收入。我经常带身边最大的玲儿（17 岁，大女儿在祖母家没来）去割稻、采胡椒等，一天辛劳 10 个小时，一人只换取 3 元左右的收入。

后来，经过努力争取之下，我们泗里街 7 户左右人家共同在 26 哩向当地人租下 26 英亩的地（一英亩租金一年是 100 元）来种稻。我租了 2 英亩种稻、金豆和蔬菜。我跟黄育明的一家人组织互助组，砍芭开沟等重活请他们干，我们就帮他们干轻活，大家互相扶持相助。种稻是很辛苦的，在烈日下暴晒，晒得怪难受，晒得汗流夹背，晒得皮肤脱掉。长时间在烂泥中，脚趾之间被细菌侵蚀得又痒又臭。不仅如此，稻芭还有一种红色的草螨，你不易发现它，它可以咬得你全身发痒，痒得睡不好觉，咬得你抓到皮肤烂，特别是钻进你的耳朵抓不住，咬得你耳出油。住所跟田芭来往要 18 哩，搭巴士来回至少要 2 个小时，上午最早 6 点出去，还有 7 点之前赶回来，一天做不了多少的田芭活。

经过辛劳努力，到了翌年 7 月，总算收成 30 多包（18 包谷约相等 20 担的米），我又在 17 哩的对面叫“马都工”也开辟了一英亩地种稻，收成不错。当地客家人都称赞“福州人厉害”。

有了收成，要把谷运回住处也要熬费心机。田芭茅舍到路边要走一段泥泞的路，特别下雨天更是糟透，玲儿用自行车推一包谷几乎走不动，我在后面帮忙推，才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挪动前进。

我们吃得少，干得多。大概平常人家不大要吃的东西，我们都拿来吃。像周围有木薯叶、番薯叶的几乎都被我们采光，萍儿还把“马弯”果皮煮来吃。

为了多补贴一些家庭生活，我还借钱去买 4、5 头小猪放在后面养，等猪长大卖了还给人家。值得欣慰的，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一家大小都能多少做些事情。圣儿才 10、11 岁，每天中午从学校赶着来回 3 哩之路回家，扒了几口冷饭，忙者喂猪、冲洗猪栏，又赶着去上课，而往往迟到。他的学业成绩不好，被老师看成是劣等生，常挨骂受罚。他只能像哑子吃黄莲，有苦无法诉。连 4、5 岁的清儿也能帮忙割芋茎（给猪食）和卖金豆和菜的。莺儿更乖，弟妹几乎全交给她照顾，她也大胆，有时拿着一篮的金豆到兵营去卖，一条金豆卖 5 分至一角。一通过辛劳努力，和一分一角的积蓄，我们生活才逐渐有稍微改善。

且说“新村”的卫生条件吧。村民喝、煮食的水是到自来水站去载。第 7 号路有几十户住家，自来水站不多（家家户户装有水管是后来之事）往往要排队等取水、冲凉、洗衣等。有的妇女围着沙龙冲凉，根本没有更衣处。真是费时、不便又麻烦！有许多当地的村民在 25 点的地范围内掘个水井，作为洗衣、冲凉和烧菜之用。须知“新村”居民多数各家都有养鸡鸭和猪，而且几乎粪坑都挖在泥土里、建在家后，下些雨来可不得了！溢出粪坑的粪汁加上鸡鸭和猪粪到处泛滥，难免要流进水井里。难怪不少人生皮肤病，有的烂疮久久不能痊愈。有的住户还把粪掏出来浇菜，微风吹来到处飘臭，怪不好受的！

我们住的这个“屋”听说过去有死过人，莺儿晚上还听到有脚步声，睁眼又看不到什么。不仅如此，就在我隔 2 家有设个三元香坛，经常听到乩童用刀敲桌子，还看到他点着的香柱塞进嘴巴，还用刀割下舌头来画符，无不使人油然说不清的恐惧心理。

一段时间，新生村不时有老人辞别人世，也只有在这里我才有看到死人家来了几个披着黄色道服的人，整个晚上一边敲锣打钹，一边喃喃念经，搅得我们心底不宁，总觉得幽灵在周围徘徊和游荡。

再说，我们离咫尺一家有个8岁患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低智能小女孩，双眼角向上吊，舌尖微露出口。这个双层住屋里的大家庭成员都唤她“傻婆”，每个人都打她骂她，她自己不时也不自由主地把头往地上碰撞。一天她患上麻症，家人不管她，结果死了。家人也没立刻去收殮，像死猪一样丢在一边。这样，我们看了都会做恶梦。

自从我们迁入新生村后，世界仿佛变得灰暗了，总觉得见不到晴天阳光，心情总是闷闷不乐，难有开怀大笑，又加上周围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更感此处难留人，总盼期得早日回老家去。病痛与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往往跟贫困多少有些结缘。

在新村里，只有一巴仙的住户才有能力在地上打洋灰。长期住泥土的地上，湿气重对人体有害。同时，在地行走脚会粘上泥土，小孩子又在床铺和地上之间爬上跃下，泥土粉末到处飞扬。后来外子去张鸿明工地拿了些长短不一的板块回来铺在地上，情况才好一点。

在那恶劣的环境里，莺儿体弱多病，经常发烧，三次发烧过头，还昏迷过去。在夜深人静时，我焦急地用脚车把她载到一哩外的诊疗所去。

按照病理学来讲，精神受虐待者、罹疾病者和忧郁症者有时会产生幻觉。莺儿在睡觉发烧过度时曾幻觉出现一个脸和头发都是灰白色的老妇女打开蚊帐，伸手想拉她，并说：“我带你离开这里。”这个恐怖的幻觉投下的阴影在她的心田里久不能泯灭。

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孩子们在床上跳上跳下，燕小女天真

地唱着歌，兄弟们给她鼓掌。蓦地，不知怎么得，燕儿失去平衡，从床上跌下，她的额部正碰撞到地上凹出的板，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大家都惊慌，不知所措，又没有什么药。有个邻居看到用丝烟来敷止不住血。血还在飞溅，有人提议叫池金妹兄来。他果然来了，只见他拿着一片什么叶，口念念有词，在叶子上比比划划，悄悄地从门进来，冷不提防给燕儿贴上。说也奇怪，血流竟然止住了。

苦命的孩子也许较耐命些。一次我偶尔看到清儿走路有些跛脚，於是叫他伸出脚来看，脚有些肿胀，再摸他的脚底，感觉有针刺状，我迅速带他到医疗所。经过检查和动手术，从脚底内拔出一寸多长的针！他竟不知何时插到，还能行走了几天？！还是顽皮的清儿，另一次不小心跌到水管头上，大腿割出一大裂痕，深至见骨！幸好血管没断，赶快带去缝合，很久才痊愈。

正当我们落难之际，留在大家庭寄人篱下的新儿与达儿，并没有得到大家庭的温暖与太多的关心。特别是达儿，有时吃不好，甚至还遭到堂兄弟之围攻殴打。

失去自由的日子

健康的人难以体会到病人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同样的，享受自由的人也难以体会失去自由人的痛苦。

新村的周围是用二层的刺丝网围住，进出必须经过一个栅门，必须接受检查、问话。所携带的任何粮食或用品皆要检查，甚至一段时间内到田园工作，也要受到严格限制。至于药品的限制则更紧。村内的每户都有户口登记，随时会受到人口检查。亲友到访过夜，来去必须予早报官登记。每天只能上午7点出，傍晚7点之前必须赶回来。如果逾期时不回，可能被控上法庭或者行动自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比如在一个时期内，完全不准外出，即使有事，也不发予准证。

那时候，有一些村民生活无着落，虽说要外出可以申请准证，但往往不被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几乎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他们的日子了。

在管制区内出现一种“嫁出多，娶进少”的不寻常现象。原来徒置区内人心惶惶，丧失许多的自由权利。新村少女莫不想外嫁，以期摆脱受管制的不自在。这就有点像日军南侵时期家里有成年的女孩，都千方百计把她遣嫁，以免受苦受害。同样的，新村外的女孩听到新村就怕，这样新村的男子找外的对象难。另一方面收入少，生活困苦，新村男人说，他个人苦也就算了，也不希望人家的女儿陪他吃苦，也不希望把儿女带到这世界来受苦受难。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有的不禁老泪纵横，责问那些人，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做错什么了？竟把他们当犯人看待，限制行动自由，临老还要受这样的苦难，难过还要老死在新村里？那时确有一些老人家受此刺激，突然病倒了，也有些老人家在那紧急时期过世，他们都表示死得不甘心。老年人表示，在管制区里太闷了！闷得令人难以透气，所以那时有不少老人家，一早就拿着拐杖出去外边吸收新鲜空气，到了规定时间才回新村。

所谓“新村”，不过是变相的集中营，扩大了监狱。

离开“伤心地”，从头做起

在70年代特别是“斯里阿曼”行动之后，新村的禁令有逐渐的放宽。居住在新生村的七家泗里街的居民，有委派我带他们一起去找人联党的杨国斯，要求增加生活津贴和允许我们返回泗里街的家园。我们也去实加玛找政治部，提类似的要求。经过多番的努力和争取，我家终于在75年3月25日获准离开这住了五年的“伤心地”，回到自己巫叻的老家。

自 1968 年丈夫被捕，以及举家被逼迁入新村，几百多株胡椒，几经辛苦所结成的劳动成果付出东流，对我们是极大的打击！回到家里，面目全非，屋子部分被拆掉，十多个瓮被敲破，整吨的木料全被偷光，一间集中放家具杂货的房间门被砸破，东西全被偷掉，在大门的楼梯上还撒了一大堆大便。看到此景，真是欲哭无泪，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回来，我们还得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若有人说生活困苦的话，在我看来，生活再困苦，也困苦不过那段“新生村”的苦难岁月。

晋连路 17 哩的新村，对我来讲绝不是什么“新生”，也不是什么“过去种种比如旧的死，今后种种好比新的生”，而是“落难”，是一场浩劫！

但希望，在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起点开始，我们以成倍的努力重建家园，顽强不屈的奋斗，去争取美好的明天！

(注) 70 年 3 月泗里街被迁移去新生村的 7 家是：卢春礼、刘忠越、李昌盛、林时钿、朱景水、谢壮宁及谢建启。



这是迁入新村前几个月（1969年12月）拍的。除了长子长女之外，其他较小的7位子女全被迁移进古晋的新生村。



徐玉金（右一）与黄育明代表新生村与大富村的泗里街居民，向黄顺开申请要迁回自己的家乡。

砸碎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

—回顾当年大力反对色情殖民地文化运动

—泓泉

1971年3月30日，当时第三省委员会提出“大力反对反动色情的殖民地文化运动”为诗巫市的革命中心任务。提出这一项革命中心任务，是基于长期来统治阶级通过奴化教育和灌输色情思想来腐蚀和奴化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身受毒害，甚至堕落为颓废的一群。为了批判与打击色情文化及其毒害下所形成的一股歪风逆流，批判与打击反动当局及殖民文化教育政策；为了唤醒与拯救新一代，让他们能健康、茁壮成长，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大力反对反色情殖民地的文化运动开展起来，并持续有力地贯彻下去，不获得成效，决不休止。

我们全体学运同志坚决响应省委的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决定。首先，我们在内部热烈开展学习讨论，要以期能融会贯通精神实质，并掌握如何贯彻执行之。随后我们开个动员会，让大家表决心、鼓干劲，并层层开下去，让运动有个好的开端。

对外，我们把重点放在诗巫市的中学，争取的对象是中学生。当时诗巫市中学有13间：公教中学、黄乃裳中学、卫理中学、中华中学、圣心中学、伊莉沙白中学、敦化中学、毕理中学、中兴中学、周玉麟中学、诗巫中学、李子明中学和拉让中学。我们决定，1971年5月17日，在诗巫市中学统一打一场反黄标语战，掀起反黄的序幕。当天，13间中学各间分配有至少二位同志带了标语、浆糊和漆刷等在深夜或凌晨潜进学校或潜伏在学校附近等待统一行动的时间到来。不幸的，这一行动已失风露馅，在伊莉沙白学或涂写反黄口号的，手无寸铁的李钟焕与江泽善同志却被军警枪杀

了。在周玉麟学校和公教中学等处执行反黄任务的同志也遭到射击，所幸未射中。“5.17”事件震撼诗巫学校内外。

“5.17”事后，我们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广泛的张贴反黄标语、张贴或散发反黄传单。有时城郊采取统一时间、统一的标语战行动，天一亮市民可以看到路上、墙壁……漆写着显眼夺目的标语；有时横幅布条天空挂，直写标语贴在商店、学校、码头、公共场所……传单、标语散发在路上、住宅、商店等各个角落。我们有时采取统一的行动，有时采取个别零星的行动。初时，我们主要在晚间采取行动，有时在各街道散发传单给商家与住宅区居民。有一次，勤思与黄鸿同志用墨头笔在各商店墙上写标语，从皇宫戏院写到当时的巴士站，从晚上约9点写到10点，没有遇到任何人的反对与阻挠，有些好心的群众还有意用身子挡住掩饰他们涂写，以防给特务坏蛋发现。

标语战是城市斗争的一个特色，它形式多样、及时轰动又能揭露打击敌方，为我宣传教育的一种武器。标语战有时挂横副反黄布条，同时也挂红旗。红旗约有2尺x3尺，上端用一条木棍穿进缝好的空洞。一条约4尺长的绳子，两头分别绑住木棍的各端，再拿一条从电线到地面约一倍长的绳子，梆住木棍和绳子的中间。胆大心细、手脚灵活的城市同志，只要把尼龙绳子梆住石子丢上越过电线，把红旗拉上电线绑住。不到2分钟，红旗就挂上电线的上空。同志们经常把红旗挂在公教学校到和平路这一段，即南兰律路头汇合处，很多人可以看到。我们敢捋老虎的胡须，同志们也敢在警署近距离安装土炮和挂红旗。有时在标语或红旗下面放置罐子，旁边写上“小心！地雷！”让军火专家忙透了整半天才排除“障碍”。

1971年10月后，我们开始由晚间发展到昼间展开统一或零星的突击行动。在规定的大白天统一时间，参加散发传单的同志把脸套上假面罩，各间中学分配二、三位同志，乘上课时突击到学校各班去散发给老师与学生。其中在籍的学生有时也参加，他们去别校散发了传单，脱下面罩，又回到自己学校上课。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丽

珍（又名葵花）是其中一个出色的城市斗争同志。有一次，她乘着未上课前，突到拉让江中学散发了传单才回来上课。另一次，她和另一位女同志到伊丽莎白学校去散发传单，完成任务后，她还高喊口号。师生们都惊奇地望着她，有些女同学还低声窃语：“共产党也有女的？而且还长得苗条皙白的？……”张丽珍是林子明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经常是考第一名，深受师生的尊敬与爱戴。后来她牺牲的噩讯传到学校，大家都深感惋惜难受，老师还公开表扬了她。

我们也曾写信或发传单给报馆、唱片商、书店、电影院等，劝告他们不要散布黄色毒素，荼毒青少年，危害整个社会。这些反黄斗争都取得一定的成效。

为了反对反动色情殖民地文化和推广健康革命的文化，我们曾好常召开大小型的反黄联欢会。有一次，我们召集 20 多位学生在飞机场附近、女皇道后芭和其他市郊范围举行联欢会。为了加强城市的反黄运动，OMT 武工队派了文工团副团长林小兰（林玉兰烈士）来到郊区，她能歌善舞，她的美妙歌唱与精彩演出很受青少年的欢迎。1972 年中，我们在侨南树胶芭召集约有几十位青少年（主要是中学生）的为期约二天二夜的集训与反黄文娱演出。大家用漆布隔开，有的还戴上面罩。林小兰同志也为这次文娱演出扮演了主角作用。

非武装的宣传与演出发展到后来武装的宣传与演出。在诗巫郊区的武装民运组曾突进到侨南小学和东山小学进行反黄宣传与反黄文娱演出。在有关当局看来，共产党真的是吃了老虎胆，竟敢在只离市区 2½ 哩的东山学校进行约二小时的武装宣传与演出。侨南小学离南兰律兵营更近，只隔一条欧文港，踏自行车大约五分钟就会到。

这场由诗巫市带头掀起的大力反对色情殖民地文化运动由内

至外，逐步推广发展到农村，也在农村广泛开展反黄运动。在华区农村普遍开展反黄宣传和反黄文娱演出，也普遍突击上学校（主要是华小）进行宣传与演出；也没收黄色反动书籍和唱片，在公开场所捣毁和烧毁；反对穿迷你裙、喇叭裤、露脐袒背等奇装怪服；反对听、唱黄色歌曲；……。城乡的斗争，互相支援，互相呼应，连成一片，掀起整个拉让江的群众性反黄运动。

将近二年来，在诗巫市总共张贴和寄出 24 种以上的文告、传单、书信、大字报等，数量达数万份以上。通过大力反对反动色情殖民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一场批判与反对色情文化的群众性斗争，打击了敌方及殖民文化教育政策，一定程度肃清反动色情的流毒；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健康文艺，宣扬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唤醒、提高对黄色文化、反动文化的认识与警觉，提高城市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力支援与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

在二年的反黄斗争中，我们也付出了牺牲代价，我们牺牲三位同志，也有一部分同志被捕。牺牲的同志除了李与江同志之外，1973 年 2 月 15 日，黄乃裳学生林荣昌也被化白特务所射杀。据了解，当天林与高两位同志在乌也路一哩一带踏着自行车，在丢弃捣毁的黄色唱片与撕裂的黄色书报之际，被巡逻过的化白特务发现，他们跟追并从小车里向二位同志开枪，林同志不幸中弹，高同志却成功逃脱了特务的追击。

看到成绩与优点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缺点与错误方面：虽然城市同志热情高、干劲足，敢字当头，不怕捕、不怕死、机智灵活的战斗，但不能进行适可而止的斗争，不能见好就收，不能做到一定时后主动停止进攻，或在敌人进攻之际主动后撤，及时转移必须转移的势力，以便更好的保存势力；有些我们会以自己的觉悟水平来看待与要求群众，当群众还未有这个觉悟时，还不能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却走在群众的前头，主观片面、急躁地硬要群众接受我们的要求，硬拉着群众跟着我们前进，采取过左粗造的行动，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



在繁忙的女皇道上漆写革命标语



反黄烈士之一
张丽珍



反黄烈士之一
林荣昌

朋友啊，朋友！我们思念你

忆一位同学、朋友、同志——王天华

李明

记得那时王天华（陈天华）是住在东山路，是公教学生，我们虽是不同班，但却是同一年级。

我记得他很喜欢画画，我要求他给我画一张，于是他送了一副亲手画的铅笔画给我，是一男一女的小孩望着前方和思索着，题名为“当我们长大的时后”。当时我买了镜框把画框了起来，挂在墙上。只可惜往后的日子，响应组织的号召，去了隐藏，去了参军，上了民族区，再也没有与他见过面了。而那副画也保存不住了。

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在66年至67年间，我们有好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泽标家里开了个华人新年团聚会，也算是个自发性的聚合吧。在那时，他唱了一首不知名的中国民歌，只记得一些模糊不清的歌词，大概是“长江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柴达木的油海浪花翻”确实很动听。这首歌记得好像是人联党当时一本歌集印有的。至今我还会哼上一些曲及词，因为我还怀念着这位喜欢音乐，画画，但却已不在人世的朋友。

其实在那年代里，我们几位很要好的朋友，同学，其中小李、小胖、道贤、泽标、泽浩、延居、立方、忠华、伟山等，经常在旧运动场打篮球，在拉让江上游泳（广东街对面江边），锻炼身体，是为了以后准备上民族区，参军的体能锻炼。虽然彼此都不知道身份，但每个人都心里明白，而王天华（陈天华）友，就是其中一个时常到位的朋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多么的刻骨铭心啊！

我和王天华（陈天华）友的认识不是很长的时间，但也时常到他家。那时我们谈理想，谈志向，谈未来，谈故事里的英雄人物，这也致使我们年轻的心如火似的倾向革命，走上解放事业的道路。王天华（陈天华）友已把他短暂的一生献了出来，他已真正的为自己的理想、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缅怀过去的日子时，年青时的种种情景就会涌向脑海，就像还在眼前，在昨天。那逝去的一段岁月和青春甚至生命，是那么的值得我们去怀念，去回忆。那逝去的朋友啊，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还时常思念你们！

是英雄健步挺胸昂首向前，

是英雄挡狂澜鞠躬尽瘁，

是英雄笑看生死，脸不变色心不跳，

为理想、为信念、为革命事业，坚韧不拔。

把英雄名留历史长河，

让后者拥可歌可泣之册，

忘不了啊，英雄！

孺子牛

—寻儿

犹记得，
在那，
幽暗的牛栏里。
初生之犊，
酣睡在母亲的怀抱里。

邻近的龙吟声，
令你从梦中惊醒。
柔和的晨曦，
点点洒落地。

你
生性不怕虎，
不知天高地厚。
你
抖擞精神，
越过围栏，
告别了母亲，
来到了昊天大地。

你在寻找
龙吟的起点，
晨曦的光源。
那里有
翠绿的草地，
肥沃的田园。
同伴们在播种
耕耘，

你兴致勃勃
加入了大伙，
集体的创造，
辛勤的劳作，
你们
开发了一片新土地。

就在此时
顿觉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狂风暴雨，
四面袭来。

你
掉进了幽暗的深渊、
陷阱，
魔鬼在你面前耀武，
幽灵在你身边扬威，
无情的皮鞭，
往你身上猛抽，
锋利的枪尖，
往你身上直刺。
你
呼天不应、
喊地不灵，
你只有
岿然不动，

横眉冷对。

你
还没被奴役、
宰杀，

只因
你
身未丰满、
体弱力薄。

且把你
丢进泥沼，
待来日
任由摆布。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饥寒交迫的日子，
你忍痛负重地熬过。

倏忽
逆风大作，
雷雨交加，
秧苗伏地，
巨树倒下。
烟波浩淼，
泥沼横溢。
你
探头水面，

沿着树干
跌出泥沼
重回旧地。
只见
面目疮痍，
往日情景不再。

你
头角已损，
躯体纤弱，
四肢无力，
寸步难移。

面向
万里长空，
烟雨苍茫，
前途迷漫，
知向何方？

尽管
你脚步蹒跚，
但是
你还要向前走。

这
不为什么，
只缘
你甘为孺子牛。



马罗河的怒涛



1968年第三省首批青年越界参军

方明

1963年组织上派了江先枋（叶子华烈士）带领民族工作干部吴云宜（吴昊烈士）和余清勇（安西）及两位Katibas河尾的左倾伊班群众，从Katibas河向南出发。按地图和指南针，爬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越过砂印边界到达印尼的马罗河支流的Tekalang河尾，再沿河而下，十多天后到达Martinus，最后到达坤甸，并和第一、二省到来的战友取得联系。他们是打通三省到印尼参加武装斗争的先行者，是他们打通这第一条通道，而那两位伊班兄弟也就留在马罗河尾Rumah Ngaung地区，不再回砂。

1965年10月26日东部北加人民军成立后，就派江先枋和宋平、温贤定中队长等，先后带领队伍积极打开一条通路回第三省。道路打通后，在1968年4、5月间，三省就派叶俊杰和何瑞英，由余清勇等当响导带到印尼马罗河的北加人民军总部和所属第三支队驻地。不久，叶俊杰被派回三省向洪楚廷汇报情况。随后，老洪就积极安排三省第一批青年男女过印尼上边区去。

在Sg. Dap河的“乌龙山点”（红旗山）已设有一个民族工作据点。当时是由伍乐（许保祥）负责。为了准备上边区，组织上先派5—6位同志在1968年7月间已到达该处。他们日夜忙碌地准备自制枪支、背包、军服、吊带等军备用品，还需购买食格、水壶、粮食、日常用品等。他们几乎每晚出动到拉让江边背粮食用品等，回到点时天已明亮。这据点里有几架缝纫机，日夜赶制军装。

1968年8月初，先后有四十多位诗巫市郊、民丹莪、泗里街、上游广东笆和农村青年男女到达这“红旗山”。他

们学站岗，操练；男男女女都协助钉钮扣、裤钩、吊带等许多事务工作。餐餐吃粗饭野菜，天天吃伊班茄子。冲凉、提水都得上下好陡的山坡。城市来的青年男女开始尝到有些辛苦的丛林生活，但有着远大理想的鼓舞，大家都把困难当作是锻炼和考验，干劲和斗志都还很高。

新兵全部集中后一星期多，终于有一天（8月17日）接到通知说，边区老战士已经到来，很快就要进入我们住点了。我们三省首批准备参军的同志马上集合，列队欢迎。我们无限激动地亲眼看到18位全副武装、带自动和非自动军用枪支，还有一把中型机关枪的雄壮队伍。我们一面热烈握手，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时来带领我们去印尼的边区老战士有叶子华、杨国强、天善、明友、永发、益利、吴昊、安西、伟雄、光明、南章、景明、少华、苏小明、天来、成华等。

新兵约40多人和老战士总共60多人，分成三个小队，三位小队长是：少华、小明、天来。

边区老战士只逗留两天，他们检查新兵的装备，发觉我们这些新兵的子弹袋，水壶袋等没有挂在吊带上，而是绑成一把用手提。还有让他们感到好笑的是每一把水龙管枪都套上一个帆布袋，这如何能在临场上使用呢？军包也车得四四方方，大大的，背带也太长，还有几乎每位参军者都带个好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手电筒。老战士说，边区难供应电池，到时电池用完无法补充。结果被淘汰好几十架收音机和一大堆物品。

出发前一晚，我们在红旗山举行一个饯别会。至少有十多位当地伊班群众来出席，整个山头，热气腾腾。当晚还杀了猪、吃得较丰盛。我们还为乌榜（Ubong Ak Nuing）和李风（Imbat Ak Akam）以及好几位老战士们别上毛主席像章。伊班

群众除了上台讲话，还唱了好长的“板顿（歌谣）”。当晚伊班群众没有回家，和我们一齐在山头上过夜。第二天，我们出发时，整好队伍，由丹心为叶子华和杨会强戴毛主席像章。伊班群众还为我们送行，陪我们走了老半天，送到Dap河尾。返回时，他们每人砍和背了好一大把的葵扇叶，还背回我们淘汰下的物资，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回长屋去。

这段路程交通员只需行走十天，我们这支大队伍先后却走了二十一天。每个人背上吊带、枪支、军包，至少二十多公斤，还要登山涉水，算是艰苦的考验。再来担心暴露痕迹而没有穿凉鞋，所以每位新兵在军包上再绑上一双塑胶凉鞋。当时赤着脚，脚底走得红肿，起泡破皮，还要面对山蛭来吸血。再加上吃睡都不好，对刚从繁华城市来的同志来说，自然更感辛苦。许多同志过后表示，当时内心还置疑，这么辛苦怎能走到印尼去呢？这一次算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艰辛的长途行军。

记得那晚当我们渡过Katibas河尾开始向边界方向前进时，最初走错路，结果益利（蔡绍祥）去侦察和认路，终于把大队引回正路。据说，益利初中毕业后就来参军，他学习理论和掌握技术都很慢板，但他独具慧眼，就是认山路本领高。益利同志在1970年和工青（余泰古），在交通联络途中，因缺粮而误吃癞蛤蟆内脏，导致中毒身亡，非常惋惜！

走着，走着，我们终于走到砂印边界的一个山垄顶，老战士说，跨越这山头，那边就是印尼的国土了。在这高高的边界山上，回首可以看到辽阔的祖国大地，一时大家思潮起伏，感触良多，有人深情地说，让我们告别祖国的大地吧！我们一定要把边区武装力量带回来。有些同志也有点伤感，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返祖国的怀抱，许多人俯身拾起一土一木，放进背包，以资纪念。

当我们到了印尼境内的边河（Sg. Piyang）后，新兵如同

重获自由般地高兴，在这毫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一边行军，一边引吭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其他革命及北加自创歌曲。我们歌声嘹亮，直上云霄，再加上我们这支60多人大步行军的声势，我想当时森林中的什么大头鸟(Kenyalang)猿猴、山猪、鹿等都吓破胆，飞得飞，跳的跳，跑到几十哩外避难去了。

整个行军途中，我们只在Katibas过河处有向伊班群众借船过河，当时只有个别同志接触群众。我们在二十多天行军过程中，都是在无人烟的热带雨林、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中前进。一路上，我们见了许多被青苔布满树干和树丫的“穿衣树”。森林里气候寒冷又潮湿，阳光只能稀疏地照射下来。有的树干上长满串串美丽的花朵，还有许多奇花异草，有时路过满地的野果和酸果。我们领略了嗖嗖的高山冷风，还有那吸饱了血还赖着不走的山蛭。我们也不会忘记，傍晚扎营在山垄顶的“山猪湖”旁，要小心翼翼地提取只有三几寸深，而且还有许多昆虫在浮动的浅水里，取水煮饭、烧水及抹身体的滋味。

从过了界的边河(Piyang)到最近基地的第五站之间，领导上派打猎好手老光明，南章和伟雄。结果成功地打到一只“山人”（黑猩猩），几星期不知肉味的同志们一到达第六站（即Piyang河与第五站之间），就有肉好吃，太高兴了。等到大家把肉吃进肚后，老光明才笑嘻嘻地提出一个“山人”的手掌出来亮相，它确实像是人类的手掌，一时吓呆了好几位新兵！

我们在Tekalang河中段（即第五站）停留一天，洗涤衣物和休息。第二天越过Tekalang河沿马罗河主流岸边南下，走了一天，再坐船过马罗河浅滩，也算是险滩，最后在人民军总部营地不远的菜园上岸。稍息后，我们整列队伍，沿马罗河岸边步行到大营地大门。仰望大门，还要走好几十级的从河边岩石边修好的阶梯才能到达大营地。大门牌楼悬挂着大红对联，写着热烈欢迎我们国内第三省同志到来的内容。这时锣鼓喧天，又是舞狮，又是鸣枪21响。我们这批新兵受到如此隆重又热烈的

迎接，个个热血沸腾，心情澎湃，受到无限激励和鼓舞。营地的同志们围成大圆圈和我们三省来的同志个个热烈握手，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时营地里北加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和第三省来的新兵40多人，以及第二支队过来整训的也有40—50人（总共有三百多人）。

在营地我发觉用树干和树叶建起来的营房共有十多间，有人民军总部办公室、三支指挥部办公室，总务室、卫生部、二支训练大营房，及另有6—7间大营房。

为了迎接老洪和我们三省的新同志，北加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队同志们提早和我们一起庆祝北加人民军建军三周年的军庆（军庆本来是在10月26日）。

建军三周年庆祝的第一个白天先举行欢迎会，田主任（黄纪作）谈了亲身经历，讲他如何领导和组织北加人民军和第三支队，也有同志上台谈战斗事迹，洪副主任代表第三省同志上台讲了话，也有个别同志上台谈感想和决心。

接着连办三夜的文娱晚会，个个节目都精彩，服装也多样化，尤其是色彩艳丽的古装舞蹈戏服，我们内心除了惊叹也纳闷，在部队物质来源很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搞来这些布料？节目有大合唱、独唱、对唱，尤其是《客家山歌》，老同志听了乐开怀，我们第三省来的新同志就像“母鸭听雷公”，但也同样感染了欢乐的喜悦。记得还有短话剧、口琴演奏等。许多节目都是自编自导，歌曲也有不少是老同志自己创作的，这对我们鼓舞很大，除了调剂我们的精神生活，也体现我们在文娱方面，也是人才济济。

记得在欢迎三省国内同志到来的大会上，田石明主任（

黄纪作)做了重要宣布:黄纪作是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洪楚廷由即日起为副主任,贝坤、蔡瑞庆为副政委,以及为:建立鲁让根据地“战略目标努力”。

北加人民军领导下有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当时第三支部指挥部和人民军总部设在同一驻点,在马罗河畔。

第三支队的正支队长是罗平(沈智威烈士)副支队是叶子华(江先枋烈士),政治指导员:沈新民(沈耀彬烈士)。

第三支队设有四个中队,每中队有36人,再分成3小队;每小队10人,其余6人是正副中队长,并有另委通讯员。

第一中队长	正:杨会强(温贤定)	副:中西(郑春喜)
第二中队长	正:宋平(李天养)	副:蔡建国
第三中队长	正:东华(蔡爱友)	副:吴铁(范国强)
第四中队长	正:邓白鸽(蔡明和)	副:蔡华(蔡国壮)

当时第三支队指挥部成员:除了三支正副支队长、指导员,还有各中队队长。

1968年9、10月间,第三支队炊事班班长:温等待,副班长:求实,班队员有连玉、江流、朱丽金等。

总务 :方旋(刘瑞珍)、砂联、六巡
出版部:新华(温锦南)、苗枝(杨立夫)
卫生部:秀琴(张淑英)、秋华(蔡细妹)、
尼亚(邱惠芳)
田主任的警卫员是:鲁成

我们第三省越界去参军的同志们，在最初每天有二安士的米粮吃，到达边区基地后，还有一星期的优待，过后和老战士一样每日只有二安士米粮，和渗有木薯杂粮，并接受分配日常工作，站岗等。我们也被指示必须呈交上个人的金饰品和私款，我们也毫无犹豫的呈上。

约一个月后，第二批从三省来参军的同志又抵达马罗河畔，但只有个别人先到“老新点”。隔天(1968年10月1日)，我们刚参军的新同志和一批老战士去稻芭，准备种玉蜀黍和木薯，我们正起火烧芭。突然，我们听到飞机声。我们还习以为常地观看飞机，没有敌情观念。这时杨中队长和其他老战士大声指示我们：“同志们，找大树头，隐蔽！”紧接着两架战斗机开始对我们稻芭进行投弹和扫射，我们依据敌机迎面飞来的方向，转到大树头的背后。爆炸声，机关枪声，还有子弹空壳打到树干树枝而掉下来的声音，响成一片。对新参军同志来说真是上了“惊心动魄”的一课。

过后探悉，印尼红帽兵、精锐的地面部队也正沿马罗河搜索而上。北加人民军总部领导人研究讨论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批进国内，把武装烈火早日带进国内各省。所以不久后，田主任转去第二省边界的第二支再到西部，而洪副主任、沈新民等也转进第三省。原来在三支整训的二支的40多位人员，大部分重整回第二省边界和国内，新兵也有十多位被分派去第一支和第二支。而留在原有第三支队，只剩下一中队多的人员，贝副政委也暂留下，由罗平支队长和叶子华副支队长负责。不久，贝副政委也转入三省中游。

我们坚持边区的同志，首先的任务是抢背谷物进秘密谷仓，抢运输物质，接着才接受只一星期的军事训练。敌情不紧时，也抢着开芭种稻。

第二年印军再次进攻我们马罗河时，主要是麻痹轻敌，

造成1969年6月29日，罗平支队长单身在河边冲凉，不幸被印兵袭击牺牲。

第三支队接下来由叶子华支队长领导。敌兵退后，我们又开辟了几块稻芭，并种木薯杂粮。叶支队长于1970年离开去黄纪作总部之后，第三支队就由邓白鸽出任支队长，领导我们直到1970年12月25日，印军再次袭击和空降稻芭。我们在1971年正月全部撤进三省国内。至此完全放弃了边区基地。

在1970年间，邓白鸽支队长还曾派一组人员去开展印尼南边（Ulu Sg. Paling）的民族工作，主要负责人是苗枝（杨立夫）。去活动三几次后，于1970年6月中，在他们思想松弛时被印尼反动土著群众杀害。当时四位牺牲者为：苗枝（杨立夫）、阿莲（范亚钊）、尽忠（陈仲华）、蔡秀明。

三省第二批过边界到马罗河参军者有近30人。由于面对马印双方的大夹击局面，他们在到达马罗河基地后一两星期内，多数被分散再倒回国内。当时第三批参军者30多人也已到达中游地区，由于不能再来边区，组织上决定就在当地接受训练和开始参加民族工作。点燃起来的武装烈火，顺应当时时局发展所需，随后就在拉让江两岸迅速地蔓延开来了。

附录1968年8月第一批参军者名单：

- | | | | |
|-------|-----------|-------|--------------------|
| 1. | 洪楚廷 (学群) | 20. | 曾记铭 (曾忠) |
| 2. * | 邱亚陶 (铁军) | 21. | 杨林娣 (雪兰) |
| 3. | 余清禄 (求实) | 22. * | 林学义 (练红) |
| 4. | 洪惠莉 (丹心) | 23. * | 卓天耀 (敢斗) |
| 5. | 沈泽珠 (方明) | 24. * | 张良钦 (贯长虹) |
| 6. * | 杨如川 (坚持) | 25. | 张公泰 (彤光) |
| 7. * | 詹木禹 (火苗) | 26. | 范德琚 (海星) |
| 8. * | 江先发 (必公) | 27. | 黄永华 (海松) |
| 9. | 莫火仙 (海峰) | 28. * | 余清寿 (东兵) |
| 10. * | 姚银花 (向阳) | 29. | 谢育明 (毛突实) |
| 11. | 江金带 (雪梅) | 30. | 莫荣光 (尚武) |
| 12. | 吴松美 (三民) | 31. | 卢文明 (老大) |
| 13. | 张和鸿 (曙光) | 32. | 陆良贵 (猛冲) |
| 14. | 刘华邦 (志钢) | 33. | 吴良光 (志英) |
| 15. | 邵阿四 (红霞) | 34. | 江水池 (程明) |
| 16. | 江绍东 (东方红) | 35. * | 刘海金 (明思) |
| 17. * | 江先妹 (海燕) | 36. * | 李风 (Imbat Ak Akam) |
| 18. | 梁玉珍 (志战) | 37. | 乌榜 (Ubong) |
| 19. * | 许保祥 (伍乐) | | |

有* 记号者共13人，都先后在那风雨岁月中牺牲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一个女兵的经历

-回忆当年上边区前后

丹心

1968年中，我和阿禄、小雷（李春宝）、小田（这时小李—李嘉恩已先上民族区了），在联合园小文（潘启坚）家后山能苟叔旁的胡椒园山顶隐藏点生活时，收到了小王（王连贵）拿来的一本边区特辑《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中的战鼓声》，厚厚的特辑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不只看了，而且小王（王连贵）还要我抄，我日夜都在与这本书接触。从书上看到边区部队的用水是用竹条从山溪里引到住点的自来水，比我们要在夜晚时，从芦荻丛底下，爬着钻出到椒园，再到山脚下的水井里用塑胶桶装了，背着、拖着到山顶住点要强多了；看到了边区砍大稻芭、种大菜园、大练武，过大集体生活的报导；也看到战斗英雄杨晓冬（杨轩进）等的先进事迹……等等，我们看到了北加人民事业的发展方向，要上边区去，要上边区练好本领再打回老家，解放全北加！终于在六月底领导上决定让我们上边区参军，并叫阿禄先去帮助做准备工作（后来才知道他是先到乌龙山跟伍乐（许保祥）等同志们一起搞运输，从江边背粮、及各种物资进乌龙山。随后，我也在八月头离开联合园住点，踏上了奔赴边区的征程。

上乌龙山

在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不知是由谁用船把我们一批整十个人送到Dap坡一个群众家的后芭。那是个种着胡椒的小山坡。记得是莫海云在那接待我们，和他们见面是晚上，我看不清任何人，只觉得黑暗中人影晃动，人来人往，似乎有点热闹（因之前我们过的是“隐藏”的生活，接触的人极少）只听莫海云喊“毛主席万岁，万岁”的口号，喊得热忱激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在小山坡处，我们还吃了点心。听泽珠说，在来的路上，她前面走的是尚武（莫荣光），他背后绑了个小油珍，珍里装着狗肉，走起路来“咯咯、咯咯”的珍声，怪趣味的，也许我们当晚还吃了狗肉吧。昏暗昏暗的，我谁也不会认识，谁也看不清，想找阿禄，也没看到。由於无知，也因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头脑里的神经不懂得感应、运转。就要开启的征途是什么个样子也无从想象、构思。算了，不会想就别想，静静的感受着在这昏暗中蕴育着的激动、奇特的景象吧。

泽珠说，天一暗我们就走，队伍怎么排，我的前面、后面是谁，我也不知道。说走，我跟上就是。我当时是背着一个“乌药”（伊班人日常背具），我听说有的人包袱是用手提的，那显然是不利于行走山路了。走到某个地方休息时，我似乎认出了东兵（余清寿，阿禄的弟弟）心里一阵子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熟人。但他没什么反应，也没什么好说的。一路上，我又归于孤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阿禄在何处。天不作美，下了雨，山路在大队人马走后很滑溜，增加了走山路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总得打起精神抬起脚，向前移动。忽然间，前面一阵骚动，前面传来说有火蚁，马上警觉神经系统，严阵以待，因很怕火蚁叮，那可是火辣辣的痛。前面的人“辟辟叭叭”的冲过去（那又是个稍微向上的山坡处），也不知火蚁是在何处，我前面的人一冲过去，我也胡乱的冲过去，也许是火蚁已四散爬动，也许是我避的不对处，慌乱间只觉得脚上已被叮上一两口，神经马上传达来火辣，骚痒的痛。咬一咬牙，“唉哟唉哟”了数声，继续紧迈着脚步跟上。跟不上，可就更倒霉了，四周一片黑漆漆，连个方向都没有，得做迷途羔羊呀。行行复行行，疲劳、困倦接着袭来，坚持，坚持，再坚持……。渐渐的天际传来微弱的白光，前面传来“天亮时，会到达目的地”的讯息，心里默默的叨念着“快到吧，快到吧！”。那是走在一条没什么水的小溪的时后，前面传来说“那就是点了”，这时天已经亮了，抬起头向上望，一座大朗高屹立于山坡上。心里嘀咕着，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呢？是不是边区呢？又传来说，那是“乌龙”山（据说此处曾摆了很多“乌龙”所以叫

乌龙山)。后来，由於是我们上边区的会聚点和出发点而又改名为红旗山。心里想着，管他是什么山，到了就好！

在乌龙山的见识和磨炼

我们到时，这里已建有两座大“朗高”，所以说是大“朗高”，因为它和我们非法隐藏的“朗高”比，是大得多了。我们是被安排在一间比较靠里边的大“朗高”，那“朗高”显然是为了安置我们这批刚到的人员，是刚建成的。“朗高”是用藤扎成的。由于地势关系，“朗高”建得老高的，我得好吃力才爬得上，所以上下很不方便。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朗高”的铺面是用小树扎成的，那些小树大大小小，弯弯扭扭，极为不平，对我们背部的骨骼和肌肤带来了威胁。要休息时，东摸摸，西摸摸，没个适当处可铺平身躯。太困了，管不了那么多，挨痛睡觉也得去找周公。

我们这一批到之前，老余他们已在一个月之前先到这乌龙山来运粮了，所以我们有粮食吃。仅仅在这开头的第一站，我们就开始尝到‘吃’的苦头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饭不好吃，粥不像粥，饭不像饭，有时是夹生饭，并没有什么菜，只有黄瓜和酸茄（伊班茄），还是水煮的，没什么油，斋得很。吃了有两星期吧，肚子很快饿，嘴巴又很酸涩。我活了十几二十岁，还未曾面对吃方面的考验，我虽然不愿意，但却必须面对，因要当兵呀！

我们到达后，三民（吴松美）他们又陆陆续续的到了，在乌龙山，我们不会做什么事，就是煮饭也不会，你看那几个“广东妹”像红霞、海燕、志战等有在那帮忙煮饭，但煮的饭却难咽的很。我们则在缝军衣的钮扣，还有缝吊带，那是用钻针钻，牛筋线缝，手指头可吃力了。还有就是站岗，晚上轮流站岗。当时有几个女的在“车”军备，是在另一个点车（那是在乌扎（林其清）的点，相信还有思英和小李都在那）。据他们

说，赶军备是硬活儿，他们赶到手经常被车针插到，听老洪表扬她们，我心里油然敬佩，因我什么也不会呀。又听说思英（蔡美英）还会文娱，会跳《纺棉花》“太阳出来磨盘大……纺呀纺呀……”这个讯息我最专注听，也最有反应了，因我太爱文娱了，只可惜没机会见面，我只把这一情节长长的藏住心里。

我到乌龙山之前，老洪和铁军他们都已先到。不知是到后的第几个晚上，我们就聚集开会，那时才知道，原来老洪是我们拉浪江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而铁军则是民族工作主要干部之一，而某人、某某是什么，什么的。在会上我们也都取了新的别名，很多朋友的名字都很有激励性，你看有学群（洪楚廷）、铁军（邱亚陶）、必公（江先发）、坚持（杨如川）、志钢（刘华邦）、向阳（姚银花）、海峰（莫火仙）……等，我就取了丹心，因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不易心红，故激励之。印象中，那以后晚上就有了开会和学习的活动，我过去的小组学习，组员最多只有3个，少的时后只有2个人，现在这天组的活动，使我大开眼界，而他们一般比我大，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其中还有曙光（张和鸿）、东兵（余清寿）、雪梅（江金带）、求实和我同岁。我沉浸在集体的紧张而有秩序生活里，努力认识新的事物，吸收新的知识，当然也顾虑着，自己的水准跟不上集体的要求。其实，对我来说，我是面对着空前的考验，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面对着新的冲激，不进则退，我兢兢业业，虽然心里有苦恼，身受有磨炼，但新的事物，集体的力量也激励着我，使我使劲的顶着。

我们在“乌龙山”聚集，是要上边区的，因此得等边区的战友来接应我们，带我们上边区。

8月17日，老温等一批边区的战友到来。据老温说，他们是先到乌扎（林其清）的点，然后由乌扎带着来。来的人员是一个加强小队，共18位。指挥人员是叶子华（江先枋）和杨会强（温贤定）中队长。

我是个傻丫头，知道有人会到，但却也不知道兴奋、高兴，只是莫名的好奇，只记得当时有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由杨中队长喊口令“立正”。不知是我太笨还是他喊的快或是喊的威，其实我都没听清楚他在喊什么，只见一排队伍瞬间挺挺直立，要多威武有多威武。我於1963—1965年头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时期在朋友家里参加军训时，焕清队长喊立正，我胸那么一挺，脚那么一拉直，以为那已是多么“飒爽英姿”，现在才知道那算什么，那是上幼儿园班。你看，人家才是英挺威武，才是军人。过去，我在市区店屋楼上房间里，因为怕声音太大，而在有床褥的床铺上军训时，老想，我们这些娃娃兵能行吗？在思想报告里还质疑过，现在这种场面，总算对我的质疑有了初步的解答。老温说，这18个人都是精挑的，多数都是队长级人员。我对这些战友是又敬又羨，再把自己的老余和他们一比，自觉得他的身上太多的儒雅和斯文了，要成为一个兵，那还得经过多少的磨炼呀！

边区来的队伍拿的枪有Tomsen两把，由老叶和老温拿机关枪一把，由敢明扛，那是叫做MK中型机枪；小队长们多是拿sten（手提轻机枪）和来福枪，他们还带来手榴弹。男战友们，眼睛都盯在枪支上转，三民（吴松美）说：我也不知怎么才能形容当时的心情，总之，好象他们（指边区回来的老战士们）是天兵天将似的。他甚至把老战友们身上吊带的东西都当成武器，看见他们吊着的水壶圆圆的，以为那是手榴弹，“手榴弹那么大小？”他心里揣摩着。总之，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历史性的场景，给我们烙下不能磨灭的记忆。

从老温（杨会强中队长）的到来，至到离开，在乌龙山停留有三天左右，他们忙着帮忙我们整理军备，战友们辛辛苦苦装了军备，但并不合格，（据说那还是前一批朋友到边区看后回来指示做的）。老温说，枪怎能是放在一个袋里装着？吊带怎么做到像是一串粽子似的，不能吊，因根本没配上吊袋。泽珠

说，那背包好象一块豆腐似的四四方方的，吊在腰以上，不能背。只得下令改，边区来的小队队长们，发挥了最实际的作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帮忙下，在我们自己齐心动手下，三天内终于基本上使这些家伙们能扛上、吊上、背上。我们国内的朋友也都配上自制的北加莱福枪，也就是后来为纪念铁军于69年1月8日壮烈牺牲，而正式命名的“铁军一八”。我这小妮子，其实也根本不灵光，不会懂得把军用枪和我们的北加莱福来个“威力”和杀伤力的比较，只是觉得，人家军用枪，那模样儿比我们自制的威多了，又想，朋友们能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把北加莱福枪造出来，那也很“神”呀，那确是不简单的，因一切都在摸索中。这期间还有件“糗”事，忘记了是那位国内的战友，因好奇，更因没有军事经验，竟玩起机关枪，岂知枪里有子弹，扣板机那么一扣，砰一声巨响，吓呆了周围的人，还好，子弹射击的方向并没有人，要不，又是恨事一桩呀。

要出发上边区了，留下的朋友，为即将远征的人们开了欢送会。一两星期的斋戒在这一天开了斋，因杀了条猪，煮了比较丰盛的菜色，有很多当地的群众也来和我们聚餐。当地伊班群众们都很热情地唱“班顿”（伊班人的传统歌曲）似是唱不完的。当天，为了对边区战友的敬意，要为他们的指挥人员献上毛主席的像章。领导上指定由我为他们捌上。那时的我，当然也为沾上他们的光而喜孜孜的。

长征上边区

告别了“红旗山”，队伍整装出发，56个人的队伍，排成线形走在森林里，那是前面看不到后面，后面看不到前面。我们国内的战友被编成了三个队，由华联、纪平、少华（刘小雄）分担队长，我那小队好像是由少华担任队长，老洪、泽珠都在我一队，学习由老洪负责。

走时，群众还送我们一段路，泽珠说是送到一个有很多“葵扇叶”的地方，群众们还砍了很多“葵扇叶”回去。同时也把我们背不走的物件背回红旗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国内战友没有行军、负重走山路的经验，对自己负重量不能适当估计，有的因负太重而影响行军速度，所以超重的物件需得留下。记得当时我们印了很多的手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也背了一些去。咱家老余，执着要多背这些书，但太重，后来不知由那个负责人硬是给腾出来。

在“乌龙山”时，队伍里有的人因不适应新的环境而生病。当时生病的有坚强（张孔和）、洁心（郑珠英）、方明（沈泽珠）说，她因去冲凉而“感到”（中暑），上游广东芭的土医（阿强的父亲梁炳炎）还进来为她拔沙等的。病情还未好，后来她勉强跟上，但食不知味，体力空乏，吃了不少苦头，坚强和洁心留下，跟第二批的朋友们稍慢些天一起上边区。

老温说，我们是向Dap河尾前进，那葵扇叶很多的地方，就是Dap河尾。我们离开红旗山后，第二天，第一次搭群众的船过了牛麻河后，上山就沿着牛麻河和Katibas的分水岭一直走，没有再下河，这分水岭是牛麻县和Katibas县的县介，两边的兵和群众的活动地盘都止于县介。所以这条分水岭能让我们避过兵和群众的耳目，隐蔽的向前行进，全线分成七段，三几天的行程设一个站。为了粮食的补给，所以做为指挥员的老温说，他严格的督促我们的行程，一定要在预定的期限内到粮点，否则，我们就得挨饿。有时，他看我们已走得很累，脚又很痛，不想走。但他还是坚持和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到目的地，因不到目的地，就拿不到粮食，就得挨饿。老温说，还好当时我们的思想还红，再加上老洪在思想工作上的有力协助，总算一路顺风。

行程大约10天后，晚上我们来到古召长屋，那儿是

Katibas河支流Chemanon河边。白天河上船多，河边群众活动频繁，因此我们利用晚上时间过Katibas河。我们向群众借了两条船划向对岸。因人多踩踩踏踏，痕迹很大，我们一离开长屋群众马上泼水灭迹。晚上，林里一片漆黑，路又是新开的，竟找不到路去向，还好老战士益利很会认路，在他带领下，找到上山的路，走了一段路，我们就扎营。过了Katibas河，沿着Katibas两支流之间的垄走了四五天的时间，到了砂印边界的Condong山附近，一直下就到了印尼的Piyang河，那天晚上就在Piyang河过夜。这十几天的路可不好走呀！农村的姑娘朋友们，我不知她们困难大否。我和泽珠这样的女性，因生活在城市，又是学生出身，实在不懂得走山路，走森林，泽珠又是生病在身，考验就更大。我是一路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走在这段路程中，也不知在心里喊了多少遍。

行军、扎营、睡觉都是大考验

走山路是要有方法的，我们对森林太无知了，当然要吃尽苦头。我们本来有穿鞋的，但那双透风的树胶鞋，并不适合走山路，很快就得脱掉，背起来。赤脚走路很考人，印象中，我在第一回合就给考倒。那就是我并不会探查地上有否藤刺，总是漫不经心，跌跌撞撞的走。不是给藤绊着脚，就是给藤刺刺到脚，要不就是被树上攀沿下来的，或旁边伸展出来的藤刺缠拉，我们是穿着长袖衣的。但被它一拉，刺钩一样深钩肌肤，一排血渗出，有时还要摆弄了很久才能把那一条钩刺给弄开。脚的刺就更不用说了，最初一天还不怎么样，第二天，第三天贯脓了，就痛起来了，那真是好痛。在沿河走时，贯脓处在河里石上磨蹭到，更是钻心痛。我是觉得很苦，也觉得吃不大消，只是没办法得忍住沿河走呀走的。休息下来，我坐在河中大石上，把脚底翻上来，爱怜的观察着痛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也看不懂，老叶（江先枋）走到我跟前坐下来，小心翼翼的，帮我把刺挑开，把脓挤掉。我一路撇着的泪水，这时流下来了，是感激，也是释放胸口的苦情，这一幕已成我生命中的永恒。另外，我还得一直提个心眼，检查是否被

山蛭给勾搭上了，那吸血鬼，真是可恶的家伙，我们分了很多精神去应付走路背重，腾不出精力来应付它，我们不断从裤脚处（我们的裤脚是用塑胶带绑住）找到像滚球般吸饱了血的山蛭，一见它真是要将之千刀万剐，方消心头恨。

由于我们都是山莖丛林行军，老温说，我们几乎没有冲凉。他说，他们刚到“乌龙山”时，跟我们说，他们几天都没冲凉，我们听了很惊奇。现在，我们却在实践着这种惊奇，行军一套衣，晚上睡觉一套衣，每天早上，换下睡衣要穿上那套行军衣时，都得一阵的犹豫迟疑，那衣是又臭又酸又冰冷，“不管那么多了，硬着头皮，胡乱的把它穿上就是。”年青的我，原本是爱说爱笑爱闹的，可这一路上总是展着个苦瓜脸。每到休息时，老温总是在行军队伍前，站在一处体查我们的行军状况，不时的说说路程的情况，说些故事，但总不忘开开我的玩笑，我呀不得不绽开个苦苦的笑脸。我记得有的地方，我们是在很河尾的小溪边的附近扎营。就在小溪里冲个凉，洗了衣烘干。有次，还把大嫂给我的手表给弄丢了，心痛了好久，好久。

我们扎营时煮饭的水，大都用山猪湖水（山猪群滚扒过的凹处积了的天水），那当然是很脏了，那里，眼睛看到的是泥浆，蝌蚪和孑孓，看不到的就不知有多少的微生物和细菌了。但没水不能生存，有水比没水好，吃不死就好，於是饭照吃，水照喝，走不惯山路的人是很会喝水的，水还得节制地喝。

我们装水是用胶帆布（后来做背包用的）内套塑料袋，有的是把袋口束紧，放在“拉笼”里背，有的老兵厉害，托在肩上扛。如果是山猪湖水还简单，有时要下好远的小溪去拿水，那就吃力了。拿到炊事处，用四条木棍插在地面上，把袋口的帆布倒翻扣在棍上，站立着。当时，我们根本不会煮饭，都是老兵们煮，我们自顾不暇，根本帮不上忙。当时扎营并不像后期是睡在吊床上的，而是铺睡在地面上，先把地面的树枝杂物弄开，再砍了些树叶铺在地面上，一方面会比较清洁平坦，另一方面没那

么潮湿，然后铺上胶布，至於地面上的树根，就得靠各自灵活处理，找个好睡处了。上面是用塑胶布盖着，先在地面（一般是弄长方形）插上两支树棍，在两条棍上绑一条长棍，胶布的中段就顶在横棍上，然后把胶布的四个角上绑着的线绑在树根上或插上的短棍。如果没下雨还好，一下雨就不能睡，因地面积水，胶布很容易被树枝插破，水就从破洞处往上溢，只得坐着，靠着或怎么的就睡了。其实是顶难睡的，可是太困了，肢体眼皮不听使唤，闭上眼睛还是睡了。晚上如果没有睡，白天那能行军呀。怎么样，都得争取休息好，准备隔天的艰苦行军。

越过国界到印尼

边界的高山，有几千尺高，足足一天才上到山顶。铁军（邱亚陶）在砂印分水岭上休息时，用纸袋包起一把亲爱祖国的泥土，有几个朋友（包括阿禄）也装了一把砂拉越的泥土放进背包。啊！亲爱的祖国，我们这一离开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您身边，为了祖国幸福的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您呀，到远方！

到了第7站，已进入印尼边界，我们在Piyang河尾扎营过夜，此后我们的活动就没有那么受限制了。因那都是无人烟地段，我们可以放声讲话，放声唱歌，老温派了三个头等猎手：光明、伟雄、南章，走在我们前头先打猎去了。第二天中午到了第6站，前面传来打到猎物了，我们可以开斋了。我们到时，看到一大锅的肉，那肉带黄色，汤也带黄色。他们并不告知我们那是什么肉，等我们吃后才告知我们说是“山人”肉（人猿）。也许有人会怕吧，但我并不怕，有食物，尤其有肉类，都是美食，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最怕没得好吃。海燕（江先妹）本来不吃肉，因她皮肤会敏感，这时也吃了，不会怕了。

再走了两天，到了第5站Tekalang河，老温要我们休息下来，清洗被单衣服等，洗了就在河滩上晒，河滩也的确好大，而且

阳光会晒得到，我们还痛痛快快的在河上泡水游泳，一洗这一路来的疲劳和肮脏。乌榜 (Ubong Ak Nuing) 和曾忠 (曾记明) 还去打猎，虽是有打到山猪，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大水冲走了，因曾忠说不用背，放在水面上拖，可是一出大河，遇到瀑布却被冲走了，老乌榜悻悻然的很不甘心。李风 (Imbat Ak Akam) 去钓‘白灵’，钓不上，呱呱叫，后来钓到一条‘马王’，晚上用它做钓饵去钓白灵，终于如愿以偿钓到一条大‘白灵’给大家改善伙食。

本来我们在第5站休息是要等营地的船来载的，但因人多，船不够，改为走山路。在路上还过一晚。老同志在扎营后打到山猪，这只山猪很肥。必公因饿了21天，吃了太多肥肉而泻肚，因斋太久了，又吃太油了(他喜欢猪油)，吃多了就会泻肚。从第5站切到营地对面的这段路，因是河边，路途上下上下的怪难走的，我一路在心里嘀咕着，“不是说很快就到了吗？为什么还总是走不到呢？”人又累，脚又痛，真是盼不得马上就到营地。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才到了营地对面，营地派两条船来接我们过河，先到菜园停下休息15分钟，整装、联络后沿菜园到营地。

国内边区战友大会师

“走，我们动身去营地去，营地的朋友们，盛情迎接，已准备就绪”，“听说还有鸣枪呀！”到底有多隆重？大伙都已心情激荡，急着要去揭晓。走呀走，大概是十分钟左右吧，我们终于走到营地的山脚下的马罗河边。“波涛涛滚滚、浪涛涛，马罗河边，武装红旗迎风飘，伟大的革命组织领导队伍，披荆斩棘，顽强奋斗，建立了人民的武装，……”这首歌就是当时的一番景象。“排队、整装！”然后，我们长长的队伍拾级而上，那河边土梯要是从河边算起，也许有两百级吧。突然间传来砰砰的21次枪声鸣响，那是代替着21响礼炮声，向国内新同志与

边区老战士大会师表达的崇高敬礼！激荡的心情，随着拾级而上的脚步转化为肃然起敬，进门处，高高大大的牌楼竖立者，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由营地同志们围成的很大很大的圆圈。啊！是由田主任（黄纪作）、贝副政委（贝文对）、罗支队长（沈志威）等约有两百多位我们日夜思念、想象的边区战友在热情的迎接我们，我们逐一的和他们热烈握手。还有舞狮、打鼓敲锣的，砰砰嘭嘭热闹得很，这段时间来多少的思念、多少的期盼，都在这一握中宣泄了。

国内新同志和边区老同志的会师，是空前的盛事，那说明我们的革命道路，已开启了新的航程。这个会师的大住点，此后被大家叫做“老新点”（老同志、新同志的会师点）。部队的同志们为了我们的到来，半年多来已做了大量的工作。饮食上，几个月来，他们上山打猎，下河捕鱼，囤积了大量的鱼猎；还有许多“Gorong”桶的猪油，而这之前的“110亩稻芭”大丰收，可供部队吃3年，为我们囤积了一定的米粮、木薯、番薯、瓜类、豆类等。这使得我们会师之后一、两年的边区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证。

居住方面，他们为我们兴建了好几间的“pos”，那“pos”就是一间间简单的大“朗高”，一个人一个睡位，我们就并排而睡，背包放在头上位。这“朗高”比“乌龙山”的朗高好睡多了，因为是用树皮铺面，不像小树铺的，睡了背很痛，而且铺面上还再铺上部队同志为我们编织的草席，真是感激老同志们的照顾。

欢迎大会和文娱晚会

9月21日，大约是第一批到达后一个星期左右（是在第二批到达之前），部队同志还为我们召开了一次欢迎大会和连续三个晚上的文娱晚会，为了这两个会他们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单说三个文娱晚会，大家可以想象要有多少的人力、物力、时

间、精力才能搭配而成，绝大部分的节目。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时候的同志们正值英年时期，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男的俊朗虎彪，女的花苞绽放，英姿飒爽，又是在大部队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在大家庭的互相帮助、学习下，并发出来的气氛，就是朝气、英挺，灿烂多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记得，当时演出的有小兰（林玉兰）的韩英；晓阳（房月梅）、林辉（黄赛莺）演的《渔光曲》；有林辉和洪彬的对口词；有德兴（吴华松）唱的“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有一支很美的舞、“万岁万岁毛主席”（何瑞英指导的）；有客家山歌，有顺口溜，有乐器演奏，有……太多了，使得我这个爱好文娱的小青年，体内的演绎细胞大幅度的增长着，整颗心，开放着文娱的花朵。我们部队的文娱战线真是人才济济，何瑞英更是这次演出的主要指导人员之一，也从那时起，她成了我心中几十年的文娱老师和榜样。

在欢迎国内同志到达的大会上，田主任（黄纪作）做了重要讲话，宣布重要决定，要建立鲁让革命根据地。宣布北加人民军的职务，黄纪作是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贝坤是副政委，洪楚廷是副主任，人民军总部和第三支队指挥部里先后有三位女性，一位是一青（何瑞英），她是见习指导员；另一位是林辉（黄赛英），她是总部职员兼研究员；还有一位是黄珍娜（赖福枝）於19/04/69受委为北盟第二特别边区委员会书记处及北加人民军总部职员。成立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三支队的支队长是罗平，副支队长是叶子华，沈新民（沈耀彬）是指导员；成立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武工队长杨会强（温贤定），宣委邱亚陶（铁军）。下午是讲话，黄纪作讲述了人民军成立的经过。

在会上国内去的领导和多位朋友也上台讲了话，总之，这是国内和边区朋友，第一次大集体结合的会，能参与这样的盛会是非常难得的，是很值得庆幸的。楚廷、泽珠、必公、三民……等都讲了话。本来，负责同志也有叫我上台谈感想，可

惜我当时胆小，不敢上台，失去了千载难逢的一次锻炼机会。这样的一次大会，脑子灵光的人，集思广益，会开拓出种种思路来，可是傻丫头的我，还是浑浑噩噩的不知想些什么？总是觉得，太多的人要认，太多的事要懂，太多的工作要学，太多的新鲜事要听要看，整个脑子充满了新鲜事，只能装，不会消化。但无论如何，国内和边区这两股力量的交汇是我军历史上的大盛事，能参与其盛实是幸什、幸什！

欢迎会的当晚是大聚餐，在营地的广场上，搭起了用木板块铺成的长桌，有好几排吧。桌子上的佳肴虽然粗陋，可都是山珍海味，再加上稻芭里和菜园里的瓜果豆类等，洋洋洒洒铺满桌面，各菜色还有名堂，我不记得了，记得有一道菜叫做“海底捞珠”，名堂怪动听的，可我一见就伸舌，因那是大块肥猪肉炖成的，我怕肥猪肉，不敢恭维。在路上饿斋良久，可得饱饱的吃上一餐，记得有一个负责人说道，要吃，就得吃饱饱，才有饱的印象，要不总觉得肚子是饿的。

大营地里有总部、指挥部、总务处、新闻处、卫生处、炊事班。当时第二支队也在大营地整训，他们住了一间很大很大的两层楼的大“朗高”。刚到的人，不熟悉，晚上还会走迷路的，怎么说呢？因我们晚餐拿木薯饭食时，天色已暗，我们得用一块长形树皮，拿块打马土点着放上树皮的前端照明，我的鞋又已坏了，得了部队老同志送给的木屐来穿，用木屐走夜路可不容易。要到厨房拿食物又是有一段距离，那木薯是用木制的桶装，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拿饭食，就得面对诸般的考验，会迷路并不奇怪，我自己就曾经迷路过。

这么多部门，跟我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最密切关系的是卫生处和炊事班，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皮肤一时不好，在路上又吃了些卤的肉和咸鱼之类的东西，脚上割伤处又多，以致脚腿皮肤发霉糜烂。到部队时，益发严重，涂什么药都不好，最后只得到卫

生所去打了三次消炎针才好。同志们刚到部队，环境的改变，伙食的变异，难免有许多病痛和不适，所以光临卫生所是在所难免。炊事班是因为我们三餐要拿饭菜，所以关系密切，至于我还有另一重原因，我的阿禄是被分配在炊事班里当火头军，我有机会就希望去看他一两眼。我很想知道，这个从来只会吃饭，不会煮饭的人，是怎么当火头军的，一看之下，才知道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只见他头上缠着汗巾，赤膊着上身，手上撑摇着一个大“摇摆”（木浆），在大灶上的Gorong桶内里搅粥，满身大汗淋漓的“好不威风！”

参加边区劳动生产

安下身后，我们这一大群人就得干活了，要不岂不坐吃山空，我们女同志在短时间里没什么大事干，就跟着同志们编织草席。编织草席其实也蛮花工的，必须先去砍“拿刀”叶，砍到后必须把两边的利刺和中间的支干用牛筋线削掉，剩下纯软质的叶片，在阳光下暴晒后，要在圆柱上拉软叶片，然后才能编织。我们也学编器具，器具一般用藤，用藤就得学削藤，削藤可考人了，要把一条长藤剖成适用的宽度，然后把不要的部分削掉，如果是蚂蚁藤，还要刮去表面的硬质，看似简单，要削成一条完整的藤不易。初学者要糟蹋掉很多藤才能削点东西出来，而且削成的藤质地不均匀，不光滑，制成的藤器就粗劣了。

到边区不久，我曾有过一次的组织生活。有一天，泽珠通知我到营地的某一僻静处开组会，那是“0”的组织生活，组长是她，组员有我、珍娜（赖福枝）和另一位女同志王利英（东华妻）。但也只有开过一次会，也就不了了之，可见当时由于马印夹击，队伍过早的被迫分散，打乱了我军的组织生活。自此之后，我们在边区的两年生活，一直都处在无“0”组织生活状态，一直都处在枪指挥党的状态。

敌机来轰炸扫射 老新点

第一批同志到达边区的三个星期后，第二批同志才到。就在第二批同志到达的十月一日中午，印尼的飞机来我们边区基地扫射轰炸。为了搞战备粮，在我们国内同志到之前，边区同志又砍了一块稻芭，而那天正是我们国内同志第一次参加稻芭的收拾芭场工作，从营地到稻芭是有一段距离的，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第一次走在去稻芭的道路上不无新鲜感，其间我们还经过菜园，园地里除了菜还看见种有草药、姜之类的。我历来喜欢园地，一路走，一路赏心悦目，虽然又要再光着脚丫走路，却也不是太在意。这其间还要经过些小沟，是用一支大点的木棍横过的，我们国内的很多朋友不敢过，只好走下沟底，再上路。我却是一溜烟的，糊里糊涂的三步两步的跑过去。到了稻芭，我们一边收拾芭，一边种木薯（插木薯棍），要把头的一向插进泥土，不可用尾的一端插向泥土，这是老同志的教诲。因种错了，长的薯吃了可会毒人的。温贤定是带领我们去的负责人，是他教我们怎么做的，有他在，我蛮高兴的，因他会叮咛很多事，又会跟我开玩笑。

大约是午后吧，当我们还在一边种木薯，一边看风景时，有人说：“有飞机，有飞机”。有飞机那并没有什么希奇呀，我们国内听飞机声听惯了！所以很平常。飞机（直升机）先在我们基地上空盘旋后又飞走了，应该说那是先来侦察吧。有人喊（多半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飞机再倒回就会下蛋了，果真，飞机又倒回来了，我们这些新同志，神都还没有回过来，敌机已经俯冲着扫射，两架交叉扫射，“Pa、Pa、Pa、Pa……”的机枪声，“Kin、Kin、Kian、Kian……”的子弹打到树顶，弹壳跌下来的声音交织着。老温即时指挥，“躲树头”，找隐蔽物。满稻芭都是树头，同志们赶紧找树头躲，必须要躲在与敌机相对的方面。老温和老同志们都很镇定，带我们去的多是队长级的，他们并不躲树头，而是抬头观望情势，掌握敌情。敌机扫射一阵后，飞走了。老温叫我们马上撤回营地。同志们急急忙忙的连走带跑的撤

回营地，这时走独木桥时，有的人并不慢了，而是飞过去了，就在我们撤时，敌机又来了，我们就躲在稻芭边的沟里和树头边。

我们撤回营地时，敌机并未停止轰炸和扫射，敌机应该也会知道我们的营地具体点，因此，就在我们营地的上空又扫射起来，在营地的邻近轰炸。听人说，菜园也炸了一个大洞，“呜、呜、呜……”敌机声阵阵，指挥员指挥我们找地方躲，子弹又是一阵哗哗叭叭地扫下来。当时瑞英也在场，她可比我镇定，她说：子弹打到那里，那里的树叶飞起，泥土飞溅。可是，我个傻丫头，什么也看不到，实际上，我也不知子弹是从那一个方向飞过来的。

敌机的来袭，加快了大部队的分散，很快的第一、二支队分散回到他们的岗位去了。我们国内去的同志，有一部分也被分配跟随田主任他们去第三支队。他们当中有炼红（林学义）、曙光（张和鸿）、敢斗（卓天佑）、海燕（江先妹）、贯长虹（张良钦）、彤光（张公泰）、洪明（王福隆）、海星、海松（黄永华）、东兵（余清寿），都是精挑的活蹦蹦的年轻小伙子，不过后来很快都牺牲了，仅留下四位（彤光、曙光、海星、海松）而已，真是令人心痛呀！

接着老洪也带着部分第三省刚来边区的同志重回第三省，有的第二批进边区的同志只是刚到部队一两个星期就得倒回三省，可以说对边区还摸不清是个啥样子的就走了。

秘密点背粮

紧接着我和泽珠、学武（文诗）、郭锋（郭炳河）等十几二十位同志就去秘密点背粮、囤粮。我们分成两组，从河边的一组，把船上的粮背到半路，再由河尾的一组同志运去秘密点，那时是从小河口向河尾运。我们一组是由河口运，所以路途并不远，而河尾那一段地势高，河床也难走。所以我们一组

多是女的或弱的。当时我们为鼓动大家的激情，还展开竞赛，看谁拿到流动红旗，结果是由河尾的那一组拿到红旗。

负责我们这组运粮的是叶子华，卫生员是秋华（蔡四妹），我第一次和老叶生活在一起，我就睡在秋华旁边。当时的老叶和秋华并没有参加我们背粮。秋华只负责卫生工作，她当时比较忙，因为有部分同志由于刚到边区过这种深山老林的生活，不适应。因此，好些同志患上一种毛病，眼睛朦得严重，可见度很差；有的女同志因环境不适应，竟然停止月事。所以秋华每天都得替同志们针灸治病。后来，相信是持续的针灸和生活的逐步适应，因此一段时间后，生病同志们的身体先后都恢复了功能。

这山沟里住人，是又冷又湿，我们的“朗高”就建在小溪边，那真的仅是咫尺之远。我们要刷牙漱口的，只要一下了“朗高”，走几步就可在溪上享用清清澈澈的溪水。但抬头往上望，天空却太小了，因都被高山大树挡住了，衣服只得靠烘干。闲着时，我总喜欢溜到马罗河边，因溪边的住点到马罗河边并不远。在河边有时我看书，有时我钓小鱼，有时我闭上眼休息（因河边有大石平台可供卧躺）。我喜爱大自然，我享受大自然，但是最最恼人的是小小的“不子”（一种很小的蚊子，叮人蛮痛痒的）一群群的，身体的每一处露出的部位它都要侵袭，尤其是眼睑的部位，它更是喜欢骚扰了。往往就因这，弄得我扫兴而回。

我们生活在那很远很远的马罗河上游无人烟地带，这里没有车声，没有船声，也没有人的喧闹声。静，就是静，静得人心平气和，静得人悠悠然、自怡自得。去了人世间的吵闹声，剩下的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了，风声、水声、虫声、鸟声、猴叫声。我看着河边那些并不整齐的大树，把它们的根盘扎在任何能扎住的大石和石缝里的泥土上，歪歪斜斜，枝桠横生，攀满了寄生植，但却是那么顽强的活着，天天俯视着马罗河的河浅河涨，河清河浊，屈数着岁月的流失。

军事训练点

过后，我们这些人员都集中到叶支队长的点（后来叫老叶点）接受军事训练。这时除了我们背粮的同志外，还有执行其他任务的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也都参加。当时队长级或以上的人员，如必公、坚持（杨如川）、求实、学武（陈文诗）、火苗（詹木禹）、一青、方明等都还在，训练我们的人员有华联（蔡安明）、景明（赖锦兴）、新华（温振南）等，他们都是老连队的人员，有他们的军事水准。我记得我们前后是训练了一星期。算是严格吧，我们这些未拿过枪，未受过正规军训的女同志，经此严格训练过后，真是周身的痛楚。只是，军训就是军训，得严格执行，得坚决服从，训练员时时不忘交待，子弹是不认人的，是无情的，要避过子弹，军事技术就得过硬。

训练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军事技术内容，从整队、操步、持枪、射击、伏倒、滚爬、拼刺刀、爬行、过铁丝网、侦察、行军、夜行军、埋伏、摸营、拆枪、装枪、丢手榴弹等等。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接受正式的军训，也是仅有的一次最正规的军训，后来虽也有几次的军训，但却简单得多了。我并不勇敢，也怕苦，但我却喜欢军训，因我寄望着，从军训中把自己锻炼得勇敢点，吃苦点，有军人气质点。所以任何一次的军训，我都要求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参加，尤其是这第一次，我自认为是很认真的参加，常说是艺高胆大，我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当时指挥部也在这个点，所以罗平、老叶以及卫生部的秀琴（张淑瑛）和秋华都在。受训人员分住3个长POS。我们女同志归一个POS，一大队人员住在一起过军事生活蛮有意思的。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唱《东方红》、《国际歌》，接着就以最快速度进行着最早的生活细节，赶着上操场。军训期间，任何时候，枪支和吊带都得管住它，因不论白天、黑夜都会有紧急集合的可能。哨子一响，晚上摸黑都得整装到操场整队，是军人就有别于常人的生活秩序。

在这个点，我们女同志还接受过三天的卫生训练，我们学包扎、学针灸、学最基本的战地急救、草药知识等。我学针灸是从这次开始的，训练我们的理所当然是秀琴和秋华了。

在这个点老同志还要打飞机。那天敌机又来骚扰，老同志边骂边架起中型机枪要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打不成。

军训过后我们举行了联欢会，联欢会聚餐时边区女同志们的巧手做了很多的糕点，老同志也有捕捉到好些鱼猎，这是上边区后，我第一次尝到吃得太饱的难受，那就是站也不适，坐也不适，躺也不适，我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吃得过饱。

联欢会上我们有简单的文娱演出，我的《小放牛》，就是这时由瑞英教的。三十几年后，我又把它教给了她的徒孙俞虹。

我记得出版处和总务处也都在这个点。军训过后，一部分同志还在这个点住，我就在出版处搞抄写。边区的同志，很多会写诗歌，对口词，快板等，我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学写，有几篇还登在《人民军报》上。自这之后，我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写了好一些篇这一类型的文章，现在虽然没有写了，但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寄情，这些都是受边区的文艺风气影响。

边区的农耕和劳作

老叶点住了两三个月吧，我又被转移到老谷仓。在这，我的任务除了抄写就是磨谷。从这开始，我学会了“挨拢”（一对上下方配搭成的大木搏，上方有两个把柄，中间有一洞，下方是个固定的木樽。两把柄由两个人一推一拉的推拉着上方的木搏）磨谷，磨后还要筛过就成糙米，若要吃白米，还需把糙米椿过，胃不好的人不能吃糙米，只能吃白米。贝坤副政委（贝文对）和瑞英也住在这个点。这点住不久，我们一批人就被调去生产点了。

我们这一批人有十几个吧，分住两个POS，老叶和瑞英是负责人，要我们这些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开荒要粮。当然，要生存下去，没粮食是不行的，我们理当要学会开荒要粮，只是人马嫌弱了点，精干的都被派去其他战线或工作队了。我们这批人只能砍“山脚”（大树下的小树），大树则只能等老同志们用斧头来砍。我们一行人从马罗河边（最河边的树是要保留的），沿河拉成一条长线，并排的朝山上的方向用巴冷刀砍着前进，这还不算是个大考验，要说考验还是脚上的刺和山蛭。

由于怕暴露不敢大面积砍，但面积小，晒得不好，烧得不好，因此芭里到处大树横七竖八的躺着，树枝树杈，树藤更是铺盖芭面，无从下种，只得一小堆，一小堆的收拾过后，插些木薯棍下去。但根本不行，种不出食物，首战告败。我们的腰带束得更紧了，每天就看着那2安士的米饭和几粒盐头，连木薯叶都吃不上。后来又再砍了两片芭，收成还是很差，只是其中一片芭的木薯和菜类还有一些，尤其是木薯，有了木薯吃，肚子就安静下来了，眉头也舒展多了。这时的我，除了吃的问题比较有愁苦之外，脑子还相对简单，劳动之外的时间，热衷于看书学习，尤其是学习革命歌曲，部队里的革命歌曲可多了，学都学不完。很多老歌都是那时候，别人教的，或自己学的。部队里革命书籍也很多，除了学运时，我看了很多革命书籍之外，其他的就是在边区看的。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学习，每星期天都有唱歌，也有办大字报，闲下兴起就写写大字报，最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写日记和保留日记的习惯。因此，很多历史篇章都在无知中流失了。

当时学习是由方明负责，教我们唱歌的是毅彬（郑月妹），毅彬还教我跳《采茶扑蝶》和《北风吹》。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把这两支舞教给了青少儿小朋友。

最后种的一片芭是最好的了，芭烧得好，能见一棵棵大树被烧成灰烬，见到那些大树头堆成厚厚的灰烬，喜悦之心油然而

而生。就在那厚厚的灰烬上我们撒下谷种，我们点上瓜种，我们插上木薯棍，期待着丰收的到来。

各种苗儿都冒出来了，长起来了，青青的稻禾，攀沿的瓜藤，可爱的Engsabi，苍劲挺拔的木薯，我多爱它们呀！菜吃了，瓜藤吃了（黄瓜藤能吃）木薯叶吃了，有的瓜（如黄瓜比较快）也吃了，稻谷也即将可采了，稻浪滚滚闪金光，到处吊着躺着的瓜类，同志们个个都充满丰收的喜悦。可是就在这时，印尼敌兵来空降了，我们也只好撤走了，这是多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啊！

在空降前一段时间，背粮过后，我们被转到另一个点，是个好高好高的点，这只是个临时点，我们在这个点拉“拿刀”叶做草席，也去砍“葵扇”叶做亚答。还是老叶负责我们，分配工作给我们的是阿鸿。一到那个点，老叶就叫我去做一间厕所。这对我来说是束手无措的，但既然工作分配下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砍了小树，连好亚答做围墙。可是怎么找个适合的位置，怎么架毛坑呢，对我可是难题了，因那是需要力气的。用“巴冷刀”砍大棵的小树是不易的，要把这两棵小树架起来也不易，结果我是糊里糊涂的，但却是尽了我的力的把它做成了。他们问说：“厕所在那里？”我蛮不好意思的说“在哪！”也顾不得他们能不能用了。

在这个住点我又被老叶分配到记录新闻摘要。这时的我笨得很，并不会摘录的，他给了我一架收音机，我记来记去的，记一点内容出来，但他们说那不是摘要，那是在记叙。我说，不行了，把工作给推了，要不霸着这个收音机，朋友们又听不到新闻摘要，多心急哪！

炊事

另一项工作，那就是炊事煮饭了，这饭和家里煮的不一样，家里有罐量，这里没有；家里煮的是白米，这里煮的是糙米；家里是用土油、是用干柴，这里不是；起火用小木屑，我很快就学会，

但老把饭煮得夹生，本来米粮就少，又煮得不好，真是愧对同志们，好苦恼。后来，总算把饭煮好了。其实，后来多数是吃粥和木薯。

这段时间煮饭并不轻松，轮流到炊事时早上4点就得起来（因不可在白天有火烟，所以需在天亮前完成一切炊事工作），点着打马土，一个人到半山腰去煮。煮好了，还得下河边去挑水，那楼梯可不是拾级而上，是用锄头锄平的，歪歪斜斜的应该有几十级吧，我挑上去都得休息两三趟，要在心里喊了很多很多遍的“下定决心”，才上到煮食的地方。

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本领，做来都不易，但我这样一个城市知识分子青年，也就是在这样的独立学习过程，把许多生活本领逐步学到手。后来十几年的日子里，砍树、炊事、做“朗高”等等，我自认为在女性中，还算是一把好手。

在八十年代头第二次进边区时，我有机会和思英（蔡美英）合作，创作了一首《炊事一席话》，内容是：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杂粮一箩箩 我手快脚快把事做
绝不把那个困难往眼里放呀 眼里放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瓜菜一箩箩 我认认真真把事做
绝不嫌哪个工作太细琐呀 太细琐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一锅又一锅 咱部队生活还艰苦
绝不能那个含糊煮饭菜呀 煮饭菜
人多用具又简陋 煮的又是一锅又一锅 我眼看战友吃得欢
我心满意足心里乐呀 心里乐

农耕生活

在砍好稻芭，种好稻谷和木薯之外的时间里，除了到稻
田拔草，采菜（木薯叶、黄瓜、毛瓜、金瓜芯、‘Engsabi’、

菇类)挖木薯,我们还做木薯干。因米粮在不断的消耗之后,囤量不多,得晒木薯干了,我们几个人到稻芭里挖了木薯背到稻芭边,也是马罗河边,剥皮、清洗、切片,然后就用草席铺在稻芭里晒,天气好,晒得好的木薯干,味道还不赖,参些鱼肉、稻芭菜去煮,顶好吃的。

我们这伙人和马罗河结了深深的缘,每天我们沿着河边到稻芭去工作。午休时,马罗河边就是我们的天然休息场,我们各自找个喜欢的位置,马罗河边有很多的大石头,可做为平台供我们午休。河边的树一般是不砍的,所以呀,河边处,树荫下,平台上,都适合午休,这是我们劳动后的好去处。天气热,身体脏,找个隐蔽处(大石头奇形怪状,有许多隐蔽供冲凉的好地方)浸泡在马罗河里,却除劳动后的疲劳,要不就三三两两的聊天说古。休息过后,就磨刀准备工作了。在边区,在游击生活中,身上吊着的那把刀是很重要的,我很爱惜我的刀,有机会拿到好刀,我总是很珍惜它,砍小树需要它,切木薯需要它,挖木薯需要它,处处都需要它。我到现在还是很爱惜我厨房里的刀,这份感情延续至今,还未释放完,它已经成为我思想里的一种特别的情感。

除了去稻芭工作,我还和取胜(刘福源)去菜园工作。我儿少时,就喜欢种花种菜的,有机会给我去菜园工作,我顶高兴的。经常取胜挑了一担粪便,我背了一个“拉笼”,沿着马罗河边往稻芭的另一向去工作。我不会锄厢,就细心的观摩着取胜怎么锄厢。森林地锄厢可不易,得先把大树头除掉,不能砍、不能挖的,就用烧,烧掉了大树头,平了地面,也得来了草木灰做为肥料。一大块一大块的把寒地翻覆曝晒,过后才锄细、修厢。我喜欢观察劳动的艺术,看取胜他怎么把泥土用锄头钩起、堆砌,把泥弄松,把厢拢紧,看他有时用手有时配合脚,利利落落,把个厢整得四平八稳的。我种菜,就从这时开始,当时的我,由于力气不够,并不能锄出好厢来,但这一切观摩所储藏在我脑子里的讯息,迄今我一生延用。

当初种时，地太寒，没什么收成，顶气馁的，但一段时间后，就种出各种的菜类。有了菜类配木薯，伙食就得到了改善。

还想提到一点是，闲暇时，我还喜欢和三几个同志到马罗河游泳。我体力弱，但又喜欢找刺激，马罗河上有急流水线，不易直冲水线过对岸，就是沿水线下有时还怕割不过被冲走。因此，要等会游泳的同志先游到关键处把关，我才游过去，平静的生活能到马罗河上戏水，抒发少女情怀，也是生活的一大乐趣。

边区的大森林

年青的我，在边区的莽莽郁郁森林里，没什么工作担子，也不大会想什么工作大事，脑子也简单，没事做，闲暇时，脑子就喜欢探寻大自然的奥秘，周围举目四望都是苍苍大树，老同志们会认得好多不同名称的树如什么Langai, Lung, 等等，我就是不会认得，不认得就不认得吧。我就欣赏着它还不可以吗。你看，这棵树那么苍劲挺拔，那棵树的树叶那么大，那么茂密。这棵树的树根板那么高那么宽，那么扎实，到底想活多少千年呢？那一种树能流出汁来凝结成打马土呢？我总认不得，但打马土捡多用多了，就懂得那种打马土好着火，那一种打马土作灯看书是不会爆喷（我身上现在还留下不少被打马土爆喷留下的痕迹，只是老天有眼，没有把我的脸喷花了）。我最会认的树，就是有一种树，我们叫它“火柴皮”树，树皮剥下就能起火的，到现在，一到森林处，我两眼探寻的还是这种树。这种树的树皮也蛮好看的，有点白，有点黄，有点浅浅的青，浅浅的兰，清清秀秀的。稻芭里，大树砍下后，横着的这种树，时时都可看到，我就在那替它剥皮，好带回营地供大伙起火用。

常常清晨天刚亮，耳边就传来“嘎啦，嘎啦”！吵吵喳喳的嘎啦猴的叫声，马罗河边最多这种猴，清静的森林里，它们是最热闹的一群，它们经常攀爬游戏在高高的树尾处，用枪

不易打到它们，老同志偶而有打来吃，猴肉腥得很，并不好吃。森林里还不时会传来“O河！O河！”的悠悠鸟叫声，那是一种野孔雀“O河”鸟的叫声，我们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它叫“O河！O河！”心里叽咕着，“干吗呀？森林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吗“！真也是的，有时就在一棵枯树倒下“砰”的一声之后，你就会听到“O河！O河！”的鸟叫声，也许它是一种报讯鸟，报告着森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静静的森林里，时而听到非常清脆嘹亮，又苍劲有力地“嘎！”的一声划空而过。那是我国的国鸟一犀鸟的叫声。马罗河边这种鸟可多了，有好多种类，我也分不清。森林的地面上，枯木上长着各种各样的菇，我顶喜欢研究的，虽然不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来，但就是喜欢蹲下来细细的端详它们。能吃的菇类我都认上了，白菇、Gula菇、鸡蛋菇、鹿眼菇，还有些叫不出名堂的菇。采菇，我是顶卖劲的。刚长出的鹿眼菇可好看了，带点乳白水晶状，表面是起伏鳞状，这时的鹿眼菇也是最好吃的，泡上糖精，有点像现在我们吃的菜燕。

进山去砍“葵扇”叶、拾“打马土”时，有时会看到鼠鹿、山鸡、有雉鸡和另一种娇小可爱的不知叫什么名堂的鸡，常常公和母的带着一群圆滚滚、黑黑的小鸡。每次看到都会给我带来一阵惊喜。在我们住点附近，如果住点人少，那些山猫、山狗便会大胆的活动在点周围的树上。有时会忽然间看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在你还没看清楚它之前，就一纵、一窜的到树尾去了，老同志告诉我那是山猫、山狗。我吃过这些野味，也是腥得很。山鸡打来吃，可费时煮了，小小的一只鸡，从傍晚煮到第二天天亮肉还是很硬，但汤却甜得很。这些小动物们都是非常的灵活、可爱，由于年轻，又好奇，我对它们都分上心了。

在许多树之中，我最喜欢看的是“达邦”树了。我们常在河边活动，看到的“达邦”树多数在河边，沿河上下都可看到不远处有棵“达帮树”巍然屹立，气势挺拔，孤傲，枝桠和树叶并

不多，但扭扭曲曲中显得苍劲结实，浙白光滑的树身更诏告天下它的洁身自爱，不近污浊。每每看到这种树，我就有一种想唱首歌，写首诗，或找几句适合的词句来赞美它的冲动。

河里的“白令”鱼，钓上来的我们固然看到，也吃到了。在河里成群结队的，或甚至一整片数以千只的也看到了，那真是一种眼福。我的生活能力差，看到白看到，钓不上也抓不上来吃。而老同志们可本领了，早期有网有人力，河阔潭深时就用网，后来条件差了，他们就用钓钩，那钓钩是我们自己用大铁线或大铁钉打成的，又粗又大。后期，我知道老光明最会钓鱼了，如他有在点，又有任务去钓鱼，都会钓来大鱼，为我们的伙食配上佳肴。老光明，他还会钓鳖呢！鳖不好钓，它的牙利，往往把鱼线咬断，把鱼钩吞到肚里。所以老光明说，钓鳖要有技巧，当它上钩时，马上得把线放长，跟着它游走，到它疲乏时，才拉线收钓，有次他为了钓一只鳖从上游到下游，从这岸到那岸的游走了个把个钟头才把那大鳖给钓上来，这只鳖可大了，有30几公斤重，里边还有蛋呢！

我不会钓“白令”更不会钓鳖，但闲来有兴趣钓鱼时，我就跟老同志到河边钓小鱼，老同志可厉害，他们把钓钩在水面上那么一打，“啪”小鱼上钩了。他们钓不久就会有一军用格，可我不行，我只会钓几只，而且每钓一只就惊呼连连，高兴死了。还有当河面浑浊时，老同志就去钓“Kokian”（又叫“马王”），我也跟上，他们钓了一串串，我那么老半天才钓一只，但也总算有吧！

在森林里那么久，有件憾事，就是我从未打到猎物。有的女同志，有打过，到很后期，那是最后的几年里，我们的志方（阮赛兰）还打到两次猎，算是女中的佼佼者。说件趣事，我的阿禄，他也只有一次打到猎，那是他在边区守谷仓时，一只鼠鹿在屋旁瞪眼看火，被他用Sten枪对着脑袋打着的。他也拾到几次不会动的动物。有次是猪群过急流，有一只不幸冲到下游滩

了的；有次是拾到被老鹰叼掉双眼的鼠鹿；还有一次好像是猪打架受伤后被拾的。哈！他那是“拾猎”冠军。

在原始森林里走动，有时会看到整片的“葵扇”叶林。有的是大叶扇，有的是小叶扇，我们喜欢大叶扇，拿来串成亚答，顶好用的。现在城市里有人也兴种这些棕榈科植物。绿叶植物森林最多了，“葵扇”叶林里的“葵扇”叶大的可真大，1片叶展开有六尺阔，一棵棵是那么顽强飘逸，它和竹子有相似处，要我说，那也是“君子”族群的植物；青青苍苍、翠翠绿绿、清清洁洁，不染尘污，超群脱俗，所以我说那是“君子”科植物。它的嫩叶，乳黄乳黄的，好看得很，又可包东西，我们经常采了，放在“拉long（一种背东西的藤制用具）”里带回当扇子用，能摺能张，很适用。

藤刺，经常刺到脚底，钩这钩那的，又气又恶它，但当看见树顶上吊满藤丛时，心里可高兴了。开发了森林，好藤很少，多是野藤。原始森林里，好藤多，挂满树上的藤丛别有一番景致。有好几种好藤我们常拉来做用具，有一种是蚂蚁藤，藤节的叶里藏满蚂蚁，那蚂蚁是黑的，好大只，所以你靠近时，就会听到“析里沙拉”的声音。那是蚂蚁爬动在藤丛里。这藤拉回，刮掉表层后是带棕色的纹面，很好看，藤皮韧硬，做成“拉long（一种背东西的藤制大背篓）”又耐又好看，藤也好削，不易断节。还有种藤是长在河边的，那是我们常见的大“白藤”，这藤又坚硬又大条，只有男同志能拉。藤面如被弯曲会发出“啪啪”的响声，并有粉状物飞出；“白藤”难削，但却是又耐用又好看，它的表皮光光滑滑，黄里带翠，用得越久，越发亮（不过要经常晒或烘，不能潮湿）。

这两年又三个月的生活光景，使我对藤有了一份很别致的感情，如有机会到森林，我两眼总在探寻着，那过去曾相识相处的藤友们。

莽莽的原始大森林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了，也许是少女情怀的当时，有太多的浪漫遐思，有太兴致的寻幽探秘吧。

马罗河和撑船

对马罗河，这条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卡普亚士河的北支发源河，我还有种不时萦绕的情与景，那就是在河尾下大雨山洪爆发前，原本在两岸秀丽山峦中缓缓流着的清澈见底、文静的马罗河，骤然间山河变色，橙色的浑浊的泥浆水从河尾夹着千钧气势，汹涌澎湃，飞泻而流，水未到，轰！轰！声早已袭来。有时，我特地到河边静静的观察着这情景，一个个浪头的冲泻、飞奔真是快极了。我数学不灵光，不能很好的估计这浪头的飞奔有多远。有次找来了阿禄就问他，他说，据他估计，一个浪头的速度每秒钟有六、七丈。面对着这汹涌的山洪河水，我得提高警惕，绝对不可跌进河里，这可是九死一生的不幸事。撑船的同志，面对这种情形，要赶紧把船和船上的货物搬上岸去，不敢与河水对着干。

马罗河在我国人民反抗外来统治的斗争史上曾留下重要的诗篇。在十九世纪反抗英殖民主义斗争时，英勇的伊班群众曾经在这里建立过营地。今天在马罗河左大支流Tekalang一带还留着他们当年生产时种的许多榴连、龙眼、山竹、橄榄、冷杀、尖必腊、红毛丹等果树，留下他们用过的瓮、盘、碗等器皿；在20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斗争时期，她像似延安，她是北加人民军总部及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的地方。马罗河这面红旗，在当年曾有力地鼓舞国内各条战线坚持斗争的信心，马罗河更成为国内第三省同志日夜向往的延安。马罗河啊，马罗河！您那丰富的鱼猎和果实，曾给了我们许多粮食；您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肥沃的土地，更让我们生产了许多稻谷和杂粮；您那川流不息的河水，又是我们运输的好航道；而您那汹涌澎湃的浪花，正锻炼我们成长；您那隆隆的水声更像战鼓声，激励我们向一切困难作斗争！马罗河啊，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在重返社会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往事时，总是忘不了马罗河，忘不了在此发生过的动人事迹。同时又让我深感难过的是，至今曾为了捍卫这面红旗而献身的可敬罗平支队长（原名沈智威）、建国副中队长、刘小雄队长、华联队长（原名蔡安明）、利民队长、丘志雄队长、徐锦木同志等等……还安葬在异国的马罗河岸边的小山岗上，在那参天大树下默默地盼望着那缓缓流去的马罗河水带来祖国春天的讯息。

说到边区生活，如果没有提到撑船，就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的生产点都是沿河而建，愈建愈河尾。这主要是因为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在河边粮食没办法运。所以选来选去，还是在河边，这在战略上是需要探讨的。当时罗平被突击牺牲时，有几个撑船的同志正撑着船下，听到枪声后才没再前进。要不然就不是罗平牺牲，而是这组同志牺牲了。所以不论是沿河设点或利用河来运输，战略战术上都潜在着危机，因为敌兵可从后山绕过我军的左右两岸的前线哨站，直插我方后河边，就可在沿河很多地方突袭我军。

撑船在边区是项重要且吃重的工作，撑船老哥们，个个都必须身强力壮，矫健灵活。因是与马罗河水对着干，那可不是件易事，顺水下时，还算轻松些，但遇到浅滩，还是要拖船。逆水而上时，就吃力了。急流无情，不用心，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一翻船粮食、物件就出问题，尤其是枪支。所以遇到某些地方，要下水控制船之时，马上就得跳，情急之下跳水，往往对撑船的朋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水急时，浅滩处，逆水向上撑，那得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劲，齐心奋力拉。我不会撑船，但不时有坐船，坐在船里看着同志们用力撑，往往是不自在的，他们在那“嗨呵，嗨呵”地吃力地撑，奋不顾身地跳水拉船，我坐在船里总觉得自己也是在使劲出力，在心里帮着他们出力。所以，我们都很尊敬这些撑船的朋友们。

边区会撑船的老战士很多，我还记得有老班长、小明、

国光、光明、联玉、志明队长、保林、志明队长、李山、亚福、天善、亚林、取胜等；女同志则有阿莲和珍娜，这两位女同志是不简单的，多亏他们了。珍娜到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跳水拖船时被河中石头撞到的内伤。用肉体（同志们都是赤足跳下水）对着坚硬锋利的石头，造成伤害的巴仙率是很高的。

我们国内去的同志，第一批暂时没被调回国内的男同志，身体强壮的也都调到运输队工作，他们是必公、志英、曾忠等，必公当时也是运输队的队长之一。

对撑船的种种遗情，我第二次上边区时，有条件和思英（蔡美英）合作，写成一首《撑船歌》。这首歌的歌词是：

山高水深 急流湍哟，老哥我挥起撑杆把船撑
水面平静 我悠闲，急流险滩难不倒
我撑头来 你把舵，险滩过了一个又一个
急流险滩 难不倒呀，运输任务完成了归途心欢唱支歌

XXX

XXX

山高水深 急流湍哟，小弟我拿起桨来把船划
水面平静 我悠闲，急流险滩难不倒
我把舵来 你撑头，险滩过了一个又一个
急流险滩 难不倒呀，运输任务完成了归途心欢唱支歌

至今，每当我自个儿（只有我会唱）唱起这首歌时，那难忘的一幕幕就仿佛又显现在我眼前。

总之，在边区的两年多，虽然有考验，有磨炼，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但也留下了许多不能磨灭的回忆。有的更是成为我生活中惯性的思维，比如一看见森林，我就自然地搜寻我所熟悉的事物；一看见清澈见底的河，我就飞快闪过马罗河的情景；一看见稻芭，一种对劳动的特别情感就涌现……等等。

波涛滚滚，浪涛涛，马罗河边，武装红旗迎风飘……，别了，马罗河，悠悠然的远了，随着生命的流失，印象也淡了。让它飞进时光的隧道里，记进史册的长河中，成为后人的故事吧。

心戚戚，情忧忧

17年的部队生活，我有两次心情沉重时期。第一次就是我们少数人留在边区，又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本来，已是寂寞苦闷，希望从外边听来好消息，可是听到的却往往是揪心撞肺的不幸事，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倒下几十个战友。我自己分析，印军轰炸老新点，我们匆匆的会合，匆匆的分手，在大力为创建鲁让根据地而奋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第二省边界与第三省国内积极开展杀敌夺武、民族工作及边区群众工作。由於太自信、太匆忙，太缺乏经验下造成太多的失误（其中有一点是太相信民族群众），给我军带来严重的损失。交通员捎来的往往并没有多少喜讯传来，反而是死讯连连。第二支队的同志，很快就传来练红、敢斗（这两位是很优秀的兴化同志），贯长虹等先后出事捐躯。还有第二支很多同志，如海洋（郑万灵）、林英（杨玉琴）、小圆、小莲（余素梅）、丹容（李雪蓉）、鲁恩（叶片青）、华新（叶贤畅）、木光（林云辉）、鲁洪（刘德庆）、海涛（刘进想）、方旋（刘瑞珍）……等，还有很多我不记得名字了，也一连串的牺牲，群众也被非常残酷地迫害。我们刚倒回中游的同志也有被敌兵夺去生命。他们是铁军、坚持，必公、耶谷、杨子荣（陈源喜）、施学之（邱少群）、尤金（温尤金）、天来、明思（刘海金）、友如（黄尔兴）、……等。到我两年三个月后倒回国内，这些人都不在人世间，永远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还有就是益利（原名蔡少祥）和工青（余泰古）在执行联络任务途中，因吃癞蛤蟆中毒死；我们边区部同志去南边工作，也一次全军覆没被坏群众砍死四个，他们是亚莲（范亚钊）、尽忠（陈仲华）、秀明、宋苗枝（杨立夫）。每每听到坏消息，我的心里往往不是阵阵的紧缩，就是坠着下沉。不易呀，实在是不易看到光明的前途。

我们自己边区也是困难重重，老弱病号守候边区，不时就会有心戚戚，情忧忧的思想情绪侵袭着我。

第二次是在和谈之后，连贵没出去，我们也没出去，“围剿”重点压向OMT。我们长时间处在各种“围剿”行动中，首先是战荣（何秀荣）牺牲，接着红坚（雷月梅）、学恩（朱宋盘）、坚红（潘启坚）、思恩（余志发）、武群（Ubong太太）、民军（江海佳）、重林（欧官民），小文、坚正、志武、百炼、小锋，还有一些忘记了。太多的牺牲造成我的迷信，那时，我和老余很常在下广东笆、乌驿路和后埔巷后山一带连成一片的低芭森林活动，傍晚时分或下雨扎营时，时常会抓到乌龟。我有一段时间，连连抓到乌龟都有同志牺牲，抓几只，就牺牲几个。最后一次抓到时是三只，刚捉到，我心里有鬼，嘴上马上和老余叨念着，糟糕！不知是不是又出事了。心里当然希望不会有事，但仅过不久，收音机就报来，我们三位同志中埋伏献身了。他们是百炼（江玉英）、坚正（江秀琪）、志武（邵火祥），啊！此情此景我的心怎么不揪，怎能不沉！

三民的“永世难忘”

说到“山人”（人猿Orang Hutan），三民（吴松美）有些补充，他说这件事他印象深刻。当时的新兵上边区大队行军中，他是被分配在尖兵队。他是农村长大的，比较快适应走山路，而他又是身瘦人轻因而很快的就赶上前头打猎的人员。当他和南章他们碰头时，刚好他们是在煮山人肉，见到山人的手脚在旁，他赫然看到似人的手脚也是一阵惊吓，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猎手们要他封嘴，不得透露是“山人”肉，只说是鹿肉。因怕国内来的同志知道了不敢吃。因此，他就伙同猎手们一起看这伙国内同志的“糗”事，直指那是鹿肉。我们随后跟上的队伍到后，听说有肉吃，又是鹿肉，高兴极了，尽管把肉往嘴里送，大口的吞咽。等我们大伙儿都吃好了，抹了嘴，他们才把“山人”

的手脚展示在我们面前，说那是“山人”的肉。有的同志当场“啣哇！啣哇！”的要作呕。我大概是又饿又斋的久了，有东西往嘴里送都是件大好事，故竟然不为所难，看过后，我照吃不误。可以想象，人到饿极时，如果没有道德思想束缚，发生吃人肉的事是有可能的。

说到吃，他还有些深刻难忘的事。当时老新点被轰炸，部队大分散后，他是被分配到前线战斗组。在打埋伏战时，一方面是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安抚嘴和胃肠，他当时其实只有一点点的饭（一天只有2安士）按平常大口点只须两大口就吃完了。但他却要吃上个把钟头，慢慢的嚼，慢慢的磨，慢慢的吞咽，细细的，非常深刻地品尝饭的味道，吞咽的幸福感。惟恐把饭食太快吃完了，就没得享受了。

当时的他呀，竟然能把大小的鱼骨都给磨掉，吃掉。我问他，大鱼骨也能吃？他说慢慢的磨，磨掉它。反正我牙齿好，有的是时间。

他们战斗组的人员，有活动到蔡华（蔡国壮）、小燕他们活动的群众区，蔡华他们是群众工作小组。一到他们工作小组处，有了白糖好吃，他们竟然一个人能吃进一公斤的白糖，还能喝下一瓶（小酱油瓶）的半凝结的猪油。吃进这些食物后，由于肠肚斋久饿久，肯定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结果，肯定是泻肚，那泻是恐怖的泻法，他觉得那是连肠粘膜都被泻出来了。但是，强烈的食欲还是不易抑止。德兴说：我甘愿，我甘愿，我还要吃。

有次聚餐，他们猛吃猛吞的，吃到把肚子撑得像个球似的，肚皮被撑得太紧了。那是扶着肚子，坐也不能，躺也不能，他说觉得自己丑死了，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当然，这丑事不只是他在上演，好多人都在演。

他经过边区的种种吃的考验后，他为自己发了誓言，从

此之后，只要有米饭吃就好，决不怪怨，绝不嫌弃。他也当真了，三、四十年以来，他对吃就照这么做了，只要有得好吃就好，绝不嫌三嫌四，因他已曾经诅咒过了。

关于吃的“糗事”可多了，这只是三民个人的三几桩而已，可见吃是很考人的，尤其是饿久了，斋久了，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嘴里塞的。

他还有件事，是他亲眼看见的，是小兰和丹莉等到华区某个点，由于饿久了，所以食量大，大概也是吃不知饱吧。某些华区女同志不理解，在附近营房引以为笑话，说是“哇，怎么那么大吃，女同志也这么大吃”。刚好被小兰和丹莉听到这段对话，以为华区同志们不能理解她们，而双双留下了泪，应该是认为太委屈了吧。

还有件事是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那不是吃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三民说，这是他在边区曾经亲自目睹过的永不能忘怀的其中一幕，这就是边区战火下的战友生离死别。那是这一刻还活跳跳的人，下一刻已鲜血染红了身躯，离开了火热的集体，永别了苦难和盼望交织的人间。

祝愿

这篇文章的写成很费劲，因时隔太久了，大家都淡忘了，而且和我们一起上边区的朋友，好多都已牺牲或去世了，就是活着的朋友又分得很散，有的能在一起的又没有认真的去回顾，因此，很难收集资料。但是，这是我军史上的其中一个主要篇章，如没人写下来，我特感可惜。因此，我总有个心愿，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在今年三月的学校假期里，特别出古晋找来文诗夫妇、贤定夫妇、珍娜、天善等，一起回顾着当时的种种情景。对于1968年上边区长征途中的种种资料，主要都是来自贤定，因当时他是主要负责人，而他记性又好，对于路线、地点、过程，记忆比较完整。其他拉拉杂杂的，是由其他朋友们

并凑而成，有些情与景是我长时间来，常常捕捉的心情意念，今天实实在在的把它抓住，放进这篇文章里与有兴趣者，共享那曾有过的久远时光。我写文章有个好帮手，因我文思一来，手跟不上脑，文章写得极为潦草，错字、漏字等不少，而我的阿禄就非常耐心的帮忙我修修改改，为它整容、打扮，才让它展现在朋友们面前。同样的，这篇文章也是在他的不断鼓励下，催促下，修改下，补充下，校对下，才完成，我谢谢朋友们的鼎力帮忙，终于完成了这篇长久来的心愿之作。

至於最后的告别边区篇章有《空降和撤退》重回国内的故事，已有泽珠执笔我就不再写了。希望当年曾共同经历过那难忘岁月的老友们，也将各自最刻骨铭心的故事都写出来，共同汇集成册，也算是我们这些曾为理想献身者在这一方面历史上的部分记录吧。祝愿老友们都好好保重，共同渡过美好的晚年。



空降和撤退

- 方明

1970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天气晴朗，如往日一样，我们有六位队员：丹心（洪惠莉）、秀琴（张淑瑛）、方明（沈泽珠）、天善（赖传兴）、勇强（朱来清）和福生（谭尊林烈士），正分工合作，有的拔木薯、有的剥皮、有的洗、有的切片，基本上已把白花花的木薯片排列在草席上晒，暴晒干后的木薯干、方便收藏当军粮。

我们的“朗高”和晒场是建在马罗河边，在宁静的虫鸣鸟叫声中还伴随着马罗河水潺潺声。约10时左右，突然间我们都听到飞机声，凭着平时的警觉，我们都知道敌机又来了，我们大家赶紧拿起各自的枪支吊带，紧急撤下马罗河边的岩石隐蔽，河边都是大岩石。

印尼军方出动两架轰炸机，最初在我们稻芭木薯园和营房上空盘旋侦察后，就一前一后朝稻芭再飞来，飞机一俯冲，就投弹轰炸，接着就一阵扫射，轰炸前后有一分钟。在敌机反复低飞掠过侦察时，我们不断乘空隙时间抢收已晒开的木薯干，可能因此引起敌人的注意，估计我们有人在附近活动。所以对我们藏身不远处的小屋子附近，轰炸得特别猛烈。

大家都把身体贴近岸边岩石下面，战机一俯冲，从我们头顶上空掠过时，巨大的机身，遮天蔽日地面一时阴暗。炸弹投下时，声音和震力，使我们真感受到“地动山摇”。我们有点纳闷，为何此次投弹扫射这么激烈，时间那么久。以往曾有几只是只是一架战斗机，主要是扫射几阵，投几粒炸弹就飞回坤甸（估计）交差去了。

等到轰炸机飞走后好几分钟，四周回覆宁静，我们都从

躲藏处出来，大家都感觉此次印尼空军的袭击行动不寻常，还是赶紧收拾回营地去集中吧。我们大家也都想侦察稻芭上的情况，天善纵身向上望，他哎了一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到距离岸边不远，大概十来米远的一棵高十多尺的树头上，吊挂着一张降落伞，再定睛一看，降落伞还系绑着一个类似发电机之类的物件。秀琴也再次爬上岸边去侦察，再次肯定敌兵已空降。

我们才恍然大悟，后来好多次轰炸机俯冲低空盘旋时，为何没有扫射，原来是伞兵降落。当时距离我们这稻芭三几个山头远的营房内有白鸽支队长（蔡明和烈士）、李山、取胜（刘福源）、学武（陈文诗）、连玉，他们居高临下，清楚看到我们稻芭的上空。当敌机俯冲掠过盘旋，伞兵就乘降落伞一个个的跳下。所以营房里的同志，在派同志来联络我们不成后，也收拾重要东西，背着自己的背包先撤离到下面秘密谷仓去了。那秘密谷仓只有求实，惹莱（亚林太太）和她一岁多的小女儿。

我们分析印军空降后，一定向高处山顶集合，我们还是沿着马罗河边摸回营房较安全。半途又遇见景明（赖锦兴烈士）和一彬。我们撤退的人数增加到8人，4男4女。

回到营房，大家赶紧找自己的背包。秀琴的背包不在，营地先撤退的同志认为她是卫生员，有珍贵的医药、器材在里面，就帮她背走了背包。秀琴赶紧找来个背篓，塞几件工作衣，大家赶紧往背包塞木薯干，在厨房找锅，大家都尽量多拿几包的木薯干，看来我们只能离开这个营地，下到河边，把会漏水的小舟的水勺干，还好这小舟能一次坐进我们8个人，但没浆，只找到两块木板，其他人就用手和其他物件协助划。小舟终于划到对岸，靠岸登陆后，我们又七手八脚把小舟弄沉。

到对岸后，该如何到秘密谷仓与大队结合，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秀琴主张沿大河边往下走，福生已走过，约须二天半的时间可到达；方明则担心半途有一片小稻芭，是否有敌兵空降，

若沿河边走，恐怕再遇到敌情。因此主张另辟新路，即先向距大河较深入的山林走一段，割过半途的那片稻芭后，再走向河边，沿河而下，商量的结果，最后采纳了方明的方案。

林海茫茫，只有两位同志知道秘密谷仓所在地，但此次只能逢山割山，逢水过水，还好有个天善这老马，否则我们不知何去何从。

由于有个同志脚底被割伤，红肿难行，身体又忽冷忽热走不得，结果第二天，被迫在营房对面岸不远处的山头休息一天。第三天才继续撤走。

由于大家缺乏开路的经验，虽有天善带路，但因都是从未走过的原始森林内前进，路途上因担心粮食不足，必须节省着吃。每天只能煮三饭格的木薯干，每餐1格，八人分着吃，那木薯干是用火烘干的，火烟味极浓，除盐外又无其他调味料，更没有菜，又干又涩，吃时实在难于下咽，只好用大量的水配着勉强吞。但难吃还得吃，否则肚饿可就没了气力走路了。运气好时，偶而能采到一点野菜，当晚便算是较丰富的晚餐了。

当走到第六天，天色已暗，便决定在一条小河边过夜，睡至半夜，突然下起大雨，河水很快便涨了，但无法点火，大家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抢救物品，最后大家也一身都湿透了，只好坐着到天亮，再继续赶路。

我们走了7天后，走到大河边一看，大家不禁傻眼了，原来我们走了7天的路程，是呈V字型，还仅仅是走到住点以下不远处的一条小支流的对岸。这时大家都急了，心想，如此走下去，不被敌兵打死，也会饿死在森林。因此决定只能沿大河边走了，当经过小稻芭时，并无发现敌情，因而也就较放心地继续走了。

走了第9天，一条大河边，山洪爆发，不能过河，又休息一天。当晚，景明钓到一只大鳖，大家高兴地吃一餐，第二天做木筏过河。走不太久，福生认出已到达秘密谷仓的小河。大家都很振奋，加速了步伐。半路上，我们还派个尖兵，先游过小河去侦察秘密点，没有可疑后再游回来。我们难抑兴奋情，在接近秘密谷仓时，全部游过河。到达门口时，福生（檀遵林）拍手做暗号（这地点只有福生和天善（赖传兴）两人知道）。喜见白鸽支队长出来迎接。他当时正一边磨米，一边观望路口。其他的同志求实、学武、取胜、联玉、李山，还有凑巧比我们早一天到达的国内交通员：志明（刘天福）和阿胖（李瑞金），他们一大早都先去背粮到一秘密点，以备大队进国内路途所需。惹莱和老邱已先转到半路的秘密点。

当晚背粮的同志们都回来了，我们分散十一天后又重聚一起，真有点劫后余生之感，大家心情都很不平静。我们都挂念着还有一小组负责造船的同志江华（老班长贝贵和烈士）带领着阿林、国光和光明，他们是在我们稻芭再上去的支流河尾造船（阿林牺牲于1971年中游Mujoh河尾，是惹莱的丈夫）。

后来探悉，老班长这4人小组后来要回营地和我们大队联络时，半途就发觉敌兵活动的痕迹，地上还有很多军人鞋印，他们倒回隐藏驻点有三个月时间，他们靠钓鱼、野菜为生，直到国内派人去联络他们后，才撤回国内来，这是后话。

白鸽支队长在分析了当时内外实际情况后，认为我们没有条件组织反击战，也难于再坚持边区，只好全部进国内。由于粮食不足，不能再多停留，所以我们整顿了行装，第二天就出发进国内。当时全部人数19人，包括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

走了四、五天，到达边河（Sg. Piyang）的一条小支流，估计那里已没有什么敌情，就把交通员带来的白药（毒药）拿来毒鱼。两位同志跑到更上游地方去洗白药，我们在下游河边等。河

道非常浅，深的只有一两尺，河水非常清澈，可看到河底石头。不久后，喜见到许多七、八寸长的鱼儿浮上水面，拼命挣扎冲上岸边，我们随手擒来，欢呼声连连。至天黑时至少捉到整百公斤，可是都没有大鱼，因大鱼都飞快冲下游游走了，但我们也很满意了。杀鱼的，生火的，搭架子准备用火来薰，当晚大家没有节制地单吃鱼饱。当晚下半夜开始，大家都轮流泻肚子。第二天，我们一边泻肚子一边再吃。结果我们被迫停留休息了两、三天，才继续上路。

我们过Katibas尾时，有同志说当天就是农历新年（1971年春节）。当天清早还下着滂沱大雨，大家冷得直颤抖，秀琴就把仅有的一点姜粉泡水给每个人喝几口，大家才感到体内有一点点热。

记得我们在途中还曾迷路两天多，兜了个大圈，竟倒回我们大前天扎营的旧址。大队只得停下休息，而带队的志明（刘天福）则不辞劳苦地独自跑了好几个钟头去侦察、搜索，终找回正道。

接着口粮完全没有了，每天我们都得寻找“阿扁”（Aping，棕榈科）芯，或“柠檬”（Nipong棕榈科）芯，煮来吃。那时，正值雨季，行军天天淋雨；扎营时，又缺乏雨布，一张雨布要挤七、八人，地面只好铺上树叶。许多夜晚都在又困又饥又冷之中捱到天明，但大家还是互相扶持鼓励，大家都以不平静的心情，重投祖国的怀抱。我们这一批可算是最后一批离开印尼马罗河边区武装基地倒回国内的了。剩下老班长带领的3人组最后也倒回国内。

从1971年头开始至1978年2月间，东部印尼境内有7年多时间没有我们的武装据点。至到斯里阿曼行动后4年多，第三省的北加人民军部队才再倒回印境马罗河上游重建边区基地，最后在1984年再全部撤回国内。

我们这一批到达中游后，就开始走向各自的岗位，有的就地停留在广东芭，有的到拉让江下游。我们当时的那一别，有的竟是永别。有的是在SriAman行动中再会面，有的在1985年后或1990年才再重逢。

我们这一批进国内的同志已牺牲的有：白鸽（蔡明和）支队长、江华老班长、福生（檀遵林）、老邱、景明（赖锦兴）、阿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对当年从马罗河撤离时间的原因、当时情形，希望有更了解当时情况的朋友们能对以下四个方面给予探讨和补充：

- （一） 回顾第三支队和人民军总部驻印尼马罗河基地的经过、搬迁、地理位置、人民军队员数目。
- （二） 1968年底，人民军总部和三支总部为何撤离。留下一个中队坚持马罗河基地的军事战略意义和其他。
- （三） 分析当时印军空袭和空降，迫使我们撤离的因素。印军兵力多少？当时撤离进国内的作法对吗？
- （四） 回忆留在马罗河的这一个中队，如何生活。稻芭有多大，种植情况，战备情况，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以及最后送走某队员可能向印军提供我们的情况，导致空降。

麻雀战斗组逞英豪

郑存喜

北加人民军在马罗河成立了第三支队，不久之后，第三连队的同志，在杨会强、郑宗西等人负责下，于1966年8月17日夜晚起义，二十多人安全顺利回归第三支，因此也加强了部队的武器和战斗力。自此，仅存与印军连队的统战就完全停止。

接着下来，印军就不时派兵遣将，企图消灭我们，第一次战斗，由于临场实战经验不足，蔡建国副中队长和杨利民不幸牺牲，长眠于“10.26”营寨山岗上。

为了坚持长期革命斗争，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部队总部和支队指挥部罗平支队长（注一）等策划下，决定搞生产，种杂粮，更在1967年决定种稻田计划。于是，在麻罗河上流，建立了“5.15”点新营地，在营地附近，物色了几块半原始而又相当肥沃的森林地。经过全体同志们数个月的开山斩芭，一垌又一垌，一山又一山，一望无际。

约在八月初，选在烈日晴天，派选二十多位对烧芭有经验的同志，分成几组，执行烧芭任务。时辰已到，一时浓烟四起，满山大火，火过干薪，火舌高达数丈，映红半边晴空，噼啪之声，数里可闻。

成功而又顺利烧芭之后，二十多位同志便在预定的小溪边集合，或许老天爷见我们辛苦，“稿尝奖励”，一头一百多斤，又大又肥的山猪出现在我们眼前，身手敏捷的神猎手伟雄一枪就把猎物打倒，大家笑嘻嘻，好运好预兆，稻产一定好。

刀耕火种，在同志们勤奋下，青葱翠绿，连“乌鸦都飞唔过”的辽阔稻芭，悠悠茁壮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由於开芭种稻，更引起印尼当局的注意，也暴露了我军营寨的地点。

我军情报兼工作组，探悉印军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终于在1967年12月间第二次开始进攻，敌军沿麻罗河而上。阻止敌军来犯，北加人民军派出多组战斗组，在稻芭附近或前方伏击。大摇大摆的印军，正跨过一条小溪时，以宋平中队长为首的伏击组，立即开枪射击，打死一人，伤了数个，伏击组也即时撤退转移，凶狠的印军，“不见黄河不死心”，不顾伤亡，还是前进，最终抵达靠近河边一块小稻芭。眼见只有二尺多高的青苗，毁又不能，烧又不成，森林地势复杂虚实不明，又不时遭到了打了又跑的战斗小组突击，且有伤亡，同时天色将晚，因此扶了伤兵，扛了死者，惶恐依原路撤军。

估计印军一定会卷土重来，趁我们稻谷成熟时，烧我们的稻芭，毁我们的粮产。为了能保护稻谷顺利的收割，为了保护割稻同志们安全，一定要重创敌军，挫败其目的。因此，罗平支队长召见宗西副中队长，任命组织一小组，能以非常灵活，能独立自主的麻雀战斗组，深入前方。宗西、吴德兴、李山和蔡锡文负起这项任务，带备所需的火器，“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依计出发。麻雀战斗组离营之后，一路前行，深入前线，即时查察周围地势，敌军可能进军路线，搜寻数处有利的伏击地点，开辟捷径。最后，终于决定在麻罗河上最后一座伊班长屋，约有半小时多的距离行程，有处非常有利的地形，两旁高坡，中间狭长必经的山沟路径，而且又是石头路，直延伸到一条小支流，此干沟道约有800米长。麻雀组就在此设下埋伏，按装三粒手榴弹（手榴弹是经过田主任（注二）改装的）在路旁斜坡，在树胶树上，依距离吊上了五号和八号的迫击炮（也是经过田主任改装的）。为免被发现，采用了大号的钓鱼线，离地约有五丈多高，高高吊挂。组员们便在斜坡隐避处，风雨不改，日伏夜宿在“守株待兔”，组员们也非常担心大风暴雨，树干摇曳，幸好没有扯断钓索，不然全功尽弃；又怕控制三粒手榴弹的地上绳子，可能会被伊班猎

人或猎狗踢到，误伤无辜，所以先撤除引炸管，为了能事先得知敌军将至，开辟一条新捷径，由吴德兴，李山在前方驻守，一发现敌军，急速回报。

要来的终于来了，1968年3月10日，吴德兴、李山同志在前方发现敌情，以最快的速度从捷径回报，埋伏点的宗西、锡文心情又兴奋，又紧张，连忙按装手榴弹引爆管，再吩咐德兴、李山再到前方预定好的小河岸上伏击，若敌军仍不顾伤亡，再前进时，再次给予突击，杀伤敌人。

“的哒”“的哒”，皮鞋踏在石头路上的声音，由远而近，果然沿路而来，长期的守候，终见成果。二位麻雀组员，“打蛇不打头，重击腰段瘫全身”，放过了二个侦察尖兵，从一数到四十余，看见中型机关枪有6、7把经过，估计是敌军连队（注三）的指挥中心，同时刚好进入设弹范围。宗西同志立即拉响三粒手榴弹，只听“哎唷”之声，接着锡文同志割断绳子，轰下夺命的五号及八号的迫击炮。之后，一片寂静，只听前头尖兵和镇后士兵零星枪声。

麻雀战斗组人员立即撤离现场，操预备好的捷径，赶在前头，越上铜金山（注四）敌人必经之路，再组织埋伏，尽量以麻雀组的灵活性，发挥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特性，尽量阻击敌军，打击敌人的士气。麻雀战斗组一直埋伏至第二天中午都不见有任何风吹草动，相信敌军一定受到严重的伤亡。

轰炸后的第二天，我军的民族工作和情报组从对面河面上看到以及群众的消息。这次的轰击，当场炸死六人，炸伤十多人，连长也受伤，敌军溃不成军，胆怕心惊的收拾残局，连夜撤兵，印军连长也回坤甸养伤去了。

经过这次的伏击，印军都诚惶诚恐，他们都说明枪实战我不怕，最怕PARAKU忽然从大树背后，溪流岸上，草丛斜坡，

发出防不胜防的暗袭，同时更须注意天空树上，不知何时会掉下催魂弹！

印军这次的进攻，毁PARUKU粮产的计划，受到严重的挫折，要重组进攻，也须要数月之久。印军的进犯，暂时是解除。支部营地的同志们，放心收割，采的采，晒的晒，运的运，汗流面红，高高兴兴收成忙。

注一：罗平，原名沈智威是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支队长，在麻罗河上流，被印军伏击而牺牲。

注二：田主任，即是黄纪作，是北加人民军的主任兼政委，在1026营地试炸改装手榴弹时，右手掌和嘴唇被炸伤，险些牺牲。

注三：连队，依据印军组织单位，一连约有150人左右，包括连长和副连长，一连内又有三排队或四排队，每排队中有三小队，设有排长副排长，小队有小队长副小队长。行军时，通常是指挥部设在第一排后，方便指挥。

注四：铜金山，是一个山头，是伊班人著名首领死后在墓葬地点附近的山头，放置大铜锣。因此我们便称呼它为铜金山。

怒涛的马罗河

—学武

1969年6月间，白鸽支队长带领一中队战士往马罗河上游砍大树搞生产。在物质条件极差，吃不饱又要干砍大树的粗重工作情况下，同志们思想斗争是很尖锐的。而我们的一位队员(KS)，其思想情绪很低落，斗不过来，他表示没有信心留在部队，要求回到印尼群众区去。既然干革命是自愿的，他今天不能坚持，不能勉强，就此送他去吧。

几个月后，稻芭顺利收割好了。但送走KS友，他会落入印军手中吗？倘若敌人掌握我们队伍(战斗力)的情况，他们将采取什么军事行动？现在我们是处于明的状态，敌方是属于暗的。研究的结果是派一组巡逻营地的下游，一组侦察营地的上游，另一组是去南边ulu Sg. Paling河尾(卡江的另一条支流白玲河尾)开展民族工作。

69年杪，白鸽支队长委派天善为组长，他带领求实和我共三位，去执行巡逻任务，沿着马罗河下一路侦察到Tekalang河口。这段路途中，不知前程有否敌情，我们得小心翼翼摸着前进，不许暴露痕迹，不许走河边石滩，只有走岸上崎岖难走的半山腰过；遇到较大的溪流要比较深入游水或是做木筏渡过。路经过罗平牺牲点，我们在那里作了凭吊，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地再上路，继续前进。第七天我们到达目的地Tekalang河口。河的两岸有已被遗弃了一段时日的敌军营地和一个直升机场。敌兵驻扎河口是想卡住我们进国内的要道。但他们失败了，我们还有其他的路线可突破其封锁线，如Piyang河等。回程中遇上干旱，我们不走山路，改水路走岸边石滩，那里较平坦的浅滩就切过那里，总之忽走左岸忽走右岸。结果七天的路程缩短三天就到达营地，向同志们报告顺利完成任务。

另一组是老班长（江华）带领亚林、国光和福生四人，撑船往上游去侦察。经过秘密谷仓再上，那是以往从未有人活动过的，也是我们的部队未到过，是个真正的处女地。它是非常河尾，船不能撑，就用两条腿沿着小溪走去。走啊走，走到砂拉越加帛的边界，隐隐约约可听到加帛方向ulu mengiong那里伐木倒树的声音，边界有几处像是有马来西亚兵巡逻的痕迹。而印尼这向却没有任何动静，一切归於原始的大自然境界。假若以后下面（营地）有敌情，还可考虑撤到这河尾活动，这也可能会是另一个大有作为的好地方呢！

还有，就是苗枝带领阿莲、尽忠和永明四人一组向南边进军。南边是白玲（Paling）河尾，与我们的马罗河（营地）相距比较近的河流。那里的布都诗包（Pitusibau）镇也是印尼一个重兵的据点，拥有一个军事飞机场。假若敌军要进攻我们的营地，那是比其他地方都来得近。基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开展那里的民族工作，和掌握当地的敌情就显得是非常迫切的任务，所以白鸽支队长就派苗枝等同志去执行这项任务。

一个月后，苗枝等倒回营地报告其工作情况：一、印尼兵未曾到那里活动。二、联络和发展了今后的二个联系人，他们是最河尾屋长和他的儿子。他们认屋长为义父，称他为Apai，他的儿子拜为义兄弟。三、据Apai透露过去第二长屋，曾有发现几位类似像你们这样的武装人员，躲藏在树芭里，其中有一对夫妇有婴孩，但不知他们是谁？是你们的朋友吗？四、有一个小插曲，尽忠为了节省子弹表演一场人蛇大搏斗，非常惊险，结果大蟒蛇死在他的巴兰刀下。

关于有武装人员在那里活动，是我们二省二支队的可能性是非常微小，会不会是印尼共产党？应设法了解和接触之。

第二次去南边，队伍还是原班人马，只是永明改为秀明。约定回营地的日期已到，为何他们都没有任何音讯。一星期，二星期已过，仍然没有讯息。

第三次永明、天善和我去南边调查了解“失踪”的情况。联络上Apai，得知苗枝等人有一次上长屋医治群众病痛时，遇上第二座长屋某个居民，在他的要求下就跟随他过第二座长屋去。致於去后的情况，Apai表示不知道，我们要求Apai帮忙去探听了解之。Apai表示第二座长屋比较复杂，不能冒冒然就去，并叫我们先回去。于是我们回去报告有关的情况。

第四次派天善、求实和我去南边进一步了解情况。会见了Apai，Apai以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告诉一个坏消息。说苗枝等人过去第二座长屋是为那里的居民医治病痛、广受那里群众热烈欢迎。有一天，几个坏人假装热情邀请他们到其“朗高”吃饭。苗枝、尽忠、秀明在设有防备吃饭时被几个坏蛋砍死。而阿莲在沟边洗刷看到突发的惨剧就转身跑，边高喊叫Apai！Apai！后来还是被他们追赶杀死。据说他们为了一些钱财（我们的同志都佩戴有手表）而阿莲镶有一颗金牙，最后那颗金牙也不放过被取了下来。这是他们民族性的落后、野蛮，抑或是受反动派煽动、收买，来杀害为他们医治病痛的恩人呢？

血债要血来还，我们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派一小队去干掉那几个坏蛋，以报牺牲战友的血仇。但不久以后，我们的营地被印尼军兵占领，我们无奈地撤回国内，此仇已无法再报，我们深深感到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和无限的遗憾。据说后来那几个武装的印共人员和一小孩也被那几个坏蛋杀掉。你说他们连一小孩都不放过，是不是太野蛮和残暴呢？又听说后来印尼兵对河尾进行大扫荡，Apai和他的儿子也被逮捕，在严刑拷打下，表现了其民族性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深为感动，祝福他俩能早日平安归来。

在此，让我们深深悼念在南边牺牲的：苗枝、阿莲、尽忠和秀明。也让我们深深怀念最后一批，1970年12月撤回国内先后牺牲的：白鸽支队长、老班长（江华）、阿林、福生和景明。安息吧！战友们。

血染的土地



追溯九·三〇运动

。苏珊。

1965年9月30日事件，是印尼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苏哈托总统专制统治30多年间，只准民众依照官方版本探讨、议论九·三〇运动（G30S），发表异见者，被扣上红帽子，或遭抄家入狱，或发配荒岛服苦役，甚至遭秘密处决。“安全与秩序恢复行动指挥部”於78年出版的白皮书《印共九·三〇运动》，85年拍摄，直至98年为止。每逢9月30日在全国电视播映的电影《印共九·三〇叛乱》。94年由国务秘书处泡制的白皮书《印共九·三〇叛乱：背景、行动及其灭亡》。卸用文人苏基亚索89年出版的《印共九·三〇运动及苏加诺的作用》，其他官准著述，都一口咬定是印共在中共支持下发动九·三〇运动。

自苏哈托於98年5月21日在民众反独裁、要民主、要公正的抗议狂飙中垮台后，民众政治意识提高，言论有了自由，要求伸张人权、理清历史事实的呼声高唱入云。九·三〇运动受害者或家属纷纷挺身揭发真相。前印尼妇女运动（Gerwani）副秘书长苏拉美、著名作家普拉穆迪亚等出狱后，於98年4月7日成立“65—66年大屠杀受害者调查基金会”，在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出狱的苏加诺政府时代的官员、军官、九·三〇运动参与者、国内外学者、观察家或著文或发表谈话，一群含冤的退休空军将领撰写回忆录，对九·三〇运动提出与官方完全不同的事实与观点。美国国务院及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CIA）有关九·三〇运动的机密电报、文件、记录，经过20多年密封保存，根据美国法例现已解密。印尼已顺利向民主政制过渡，这种政治生态有助弄清九·三〇运动来龙去脉，使真凶受到谴责，使受害者洗脱冤屈。

“九·三〇运动背景”

印尼陆军内历来存在著支持与反对苏加诺总统政治路线的二派势力，在5、60年代冷战时期，二派矛盾愈演愈烈。苏加诺坚持反帝反殖立场，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眼中钉。美国曾多次支持、策划陆军内反苏加诺分子进行兵变、暗杀、叛乱，企图推翻苏加诺政权。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上威胁，苏加诺在国际上疏远西方亲近中苏，在国内依靠印共，吸收印共精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印共党员与支持者达到二千万人，在军内也有不少同情者。印共成了美国及右派军人推翻苏加诺政权的最大阻力。

65年8月间，苏加诺患肾结石，曾多次呕吐、昏迷，病情严重，国内经济陷入危机，国家外汇储备只剩七百万美元，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六百。以国防部长纳苏第安上将、陆军部长耶尼中将、苏普拉普托少将、巴尔曼少将、哈约诺少将、苏多约准将、班柴丹准将为主的陆军将领委员会，认为机不可失，计划趁10月5日庆祝建军节发动政变夺权，大批军队以作战装备奉命开往椰加达。

拥护苏加诺的一群中下层军官觉察将领委员会的阴谋，决定先发制人，保卫苏加诺政权。总统警卫团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京几守备区第一旅旅长拉迪夫上校、哈林空军基地守备部队司令苏约诺少校，集合了约一个师兵力，於9月30日晚集合，10月1日凌晨4时分兵七路上门拘捕七将领，原订计划是交给苏加诺发落。是谁下令处决他们呢？普遍的说法是印共特别局主席萨姆。他又是军方情报员，与CIA也有关系，背景十分复杂。

印共策动之说难成立

苏加诺政府的国务部长、印尼党(Partindo)主席黄自达在出狱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九·三〇运动是帝国主义国家推

翻苏加诺政权的阴谋，有人精心设下圈套，蓄意引诱印共上当。印共第二副主席约多在10月6日苏加诺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确有个别印共成员参与，但也有CIA分子介入。

许多独立思考的观察家相信，印共从组织上没有介入九·三〇运动。自1955年以来，印共是第四大党，苏加诺推行纳沙共（Nasakom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共产主义合作）政策，印共已参加执政，印共中央已制订以议会路线上台掌握政权的方针，它策划政变之说站不住脚。

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格林於1965年10月5日致华盛顿密电云：政变分子可能有空军人员，但没有证据表明印共和苏加诺的作用。

印共中央认为九·三〇运动是陆军内部问题。在翁东於10月1日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印共表示这是爱国的行动。

在苏哈托军人集团疯狂屠杀印共成员、民主人士时，印共没有或极少抵抗，也足以说明印共不是九·三〇运动的策划者。

九·三〇运动演变成封杀印共，血洗民主人士，疯狂反华，与美国跟苏哈托之间勾结分不开。

接尸煽动反共狂热

从65年10月至66年2月5个月内，格林大使发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及其助手的大量电报，CIA大量机密文件，可以充分看出，对印共、其他民主人士及华人的大屠杀，不是自发的，而是在美国外交官及CIA官员指使下，苏哈托右派军人集团精心蓄意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0月4日正午，丢入鳄鱼洞一口枯井的七军官尸体被发现和挖掘出来后，美国大使馆、CIA便与陆军高层、回教政党头头密商，如何利用七尸渲染印共“野蛮”，以挑起反共狂热。苏哈托抢先扯起反共旗号。他说，“我亲眼看到九·三〇运动分子残暴野蛮的行动。他们的行动与空军某些分子是有联系的。空军利用这个(哈利)机场训练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与妇运(Gerwani)的志愿人员”。他并发动电子、印刷媒介，大量地、连续地渲染九·三〇运动分子虐待七军官，剝肉挖眼，斩肢割颈，切下生殖器塞入各人嘴巴，妇运成员把七军官当作性意儿，举行性狂欢。美国为苏哈托提供武器、先进通讯器材，方便他联络和指挥各地同党。美国还支持苏哈托集团雇佣回教和基督教青年杀手团，疯狂追杀印共、民青、妇运成员、民主人士、华人，烧毁华人社团，整个印尼变成鬼域。英国大百科全书说至少屠杀了80万至一百万。前陆军突击队团长沙尔禾估计是三百万人。国际大赦组织说，苏哈托在九·三〇运动后首12个月内拘捕了60万至75万名政治犯。

格林10月15日向华盛顿报告：陆卓、回教头面人物与美国使馆官员商议对策，认为陆军宜逐步展开行动，不要只对付印共，而且要对付整个印共—苏加诺集团。但基於战术上原因，陆军首先要打击和消灭印共，暂勿碰其他集团。格林建议陆军加紧反共宣传，并把九·三〇运动与中国联系起来，散布中国支持印共政变的无稽言论。美国国务院10月29日急电指示格林，要求军方成立一个军人政府。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军方消灭印共，乃是他们的胜利。

据可靠消息，在九·三〇运动爆发前，曾於58年在苏拉威西暴乱的“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共同斗争约章”(PPRI-Permesta)数位老牌叛乱分子，在瓦兰杜率领下去华盛顿，要求美国扶植苏哈托取代苏加诺当总统。

苏哈托才是导演

一场戏，只有主角，没有导演，是唱不出来的。九·三〇运动主角是翁东、拉迪夫、苏佐诺、萨姆。导演是谁呢？神甫威曼查耶在《大罪》一书中直指是苏哈托。荷兰的印尼问题专家维田教授说，不要以为苏哈托是九·三〇运动无意中得益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印尼问题专家安德森认为，苏哈托与九·三〇运动有重大的、密切的关系。

翁东、拉迪夫是苏哈托的旧部下、老朋友，在独立初期，在日惹一齐加入印共领袖阿利明创办的“巴杜克(Pathuk)小组”（左派青年小组）。拉迪夫在48年在苏哈托师长的第波尼哥罗师当连长，二人情同手足，苏哈托曾参加拉迪夫儿子的割礼仪式。翁东在中爪哇雄牛突击队时是苏哈托部下，在收复西伊里安战役中获英雄奖状，是苏哈托的爱将，翁东结婚时，苏哈托是参加婚礼的唯一高属将军。

苏哈托与萨姆熟络。58年，苏哈托在三宝瓏串通二位华人巨商走私，差点被革除军职，经卡托将军斡旋，纳苏第安调他去“陆军参谋与指挥学校”学习。校长是美国军校毕业的苏瓦多上校，而萨姆是苏瓦多的情报员。苏瓦多很赏识苏哈托，吸收他参与制订区域作战与专业行动计划。美国全力资助的这项计划，表面是进行开渠、改田、修路、筑桥的民间项目，实际上是跟陆军内及地方上反共势力建立联系的一种隐蔽的活动。据“三料”（印尼、CIA、苏联KGB）特务安东对椰加达一家周刊透露，CIA是在此段时期接近苏哈托。CIA曾将一份5千名印共重要人员的名单通过某人交给苏哈托，足见CIA与苏哈托关系密切。

据拉迪夫说，九·三〇运动爆发前两天，即9月28日，他曾上门拜访苏哈托，提到将领委员会的问题。苏哈托回答有所听闻，他会调查。9月30日晚上10时左右拉迪夫受翁东指示，

上陆军总医院见正在医院照顾遭热汤灼伤的幼子的苏哈多，传达拘捕七将的计划，苏哈多听了愣了一阵。当时医院里人多，他俩没机会多谈。拉迪夫待了一个小时才离开。

当时，苏哈托是少将，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获悉这项十分重大消息为什么不向其上级耶尼或纳苏第安报告？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加以阻止？评论认为，苏哈托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机会主义者，与将领委员会七将向来貌合神离，他与纳苏第安、耶尼、班柴丹矛盾最大，有人要清除那些将领，正中下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他可坐山观虎斗，见风驶舵。九·三〇运动主角一直把苏哈托当作苏加诺的忠实支持者，运动主力之苏哈托旧部第波尼哥罗师。

许多迹象表明，苏哈托秉承美国旨意，蓄意借九·三〇运动铲除印共及苏加诺反帝反殖政府。根据印共章程，只有艾地、陆曼、约多三位主席才可在法律上对印共一切行动负责。苏哈托既然一口咬定印共是九·三〇运动策动者，为什么在拘捕他们后，未经公开审讯便杀掉？10月4日找到七军官尸体后，由苏哈托指派的二名军医、三名民间法医专家组成的检尸组，由当天下午4时半工作至翌日中午12时半，检验结果是七具体尸体并无受折磨痕迹，器官完整无损，某些肢体损伤是尸体丢入深达36尺枯井所造成。苏哈多军人集团罔顾事实，发动媒介造谣中伤，目的是挑起宗教狂热和反共狂热，挑动回教青年屠杀印共分子、民主人士，为篡位夺权做准备。

美国记者大卫在68年发表的《印尼暴动》一书中肯定鳄鱼洞性狂欢是虚构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威廉加经过多年调查，访问了许多妇运成员，於95年发表论文指出，妇运成员在性方面是极保守，说什么九·三〇运动分子天天打催情针，在鳄鱼洞举行性狂欢，显然是为了挑起宗教人士对印共的仇恨心理。

苏加诺在枪口下交权

在由苏哈托口述，由拉马丹执笔的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一书中，苏哈托把自己说成是谦谦君子，当上总统是勉为其难，因为“人们催我、逼我，一个劲地把我往那个方向推，形势的确逼人，但是我对自己吃几碗饭心中有数。我没有能力执行那么繁重的任务。我说明，我从来没有准备去当总统……连这种梦想都未曾有过。最后，他们对我的信任打动了我的心，使我终于答应。”

这种表述令人觉得有趣。如果苏哈托没有权力欲，为什么要抗拒苏加诺任命普拉诺多将军接替被杀害的耶尼担任陆军部长，并自封为陆军总指挥。

苏哈托是凭苏加诺签署的《66年3月11日命令》(Supersemar)篡位夺权的。当天在茂物总统政府当值、现年71岁的侍卫苏卡多说，当天凌晨1时至2时左右，巴苏基、马拉发，马哈茂德3位少将和尤素夫少校到茂物总统府晋见苏加诺，其中二人拔出手枪，威逼苏加诺的哈蒂妮(苏加诺第四位夫人)及苏加诺政府巡回大使苏佩妮夫人都证实，那并非交权书，而是命令状，责成苏哈托恢复治安，并向总统汇报进展情况。当时，美国航空母舰已在马六甲海峡待命，准备支持苏哈托夺权，苏加诺签署“3·11”文件，目的是避免生灵涂炭。四名逼宫将校，只有尤素夫尚在人间。“3·11”文件正本下落不明，苏哈托只出示副本上半节。公众一直都不怀疑苏哈托是以非宪法手段逼苏加诺下台。美国康奈大学印尼问题专家安德森说，苏哈托政权乃建立在堆山积海的尸骨上。

中国介入是无稽之谈

中国与印尼自50年4月13日建交以来，双方依照万隆会

议五项原则精神，关系十分密切、友好，在反帝反殖的共同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苏加诺在国内坚持反对反华排华，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共与印共是兄弟党，互相支持，是十分正常的。当年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国力不逮，未有支持其他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行动。印共主席艾地受毛泽东影响大，认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但这不等於中共大力支持印共发动九·三〇运动，去推翻中共大力支持的苏加诺政府，更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围堵、孤立中国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重要战略。美国一直利用它所培训的印尼陆军军官，破坏苏加诺政府与中国之间合作友好关系。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在65年10月5日致华盛顿的电报上强调，必须继续加强发动反印共的宣传，并把九·三〇运动与中国及其共产主义招牌联系起来。苏哈托直至垮台时也拿不出中国介入九·三〇运动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九·三〇运动的来龙去脉，现已可公开探讨、议论，各抒己见，只要不蓄意歪曲，显然对弄清这个印尼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有好处的。陆军内部的冲突，为什么竟演变成轰动全球的全国性大屠杀，使成千成万无辜者家破人亡，使印共支持者至今仍受到排斥、歧视？苏哈托显然难辞其咎。东帝汶、亚齐、伊里安查耶等大屠杀，正是苏哈托军人集团九·三〇运动大屠杀的延续，是苏哈托迷信武力，镇压异见的恶劣、野蛮品性的必然结果。苏哈托在九·三〇运动的罪恶，不应该不明不白放过，只抨击他滥权敛财，不遣责他屠杀平民，不利於实现全国各族和谐，不利印尼迈向民主、公正、繁荣的社会。响应《印尼与东协》第100期呼吁……“平反9.30历史”社论，特撰本文，敬希指正。

(稿於椰加达)

西婆罗洲华侨血史一页

—许行

东万律郊外骷髅累累，惨不忍言，
榴连港机场骸骨无数，尚待发掘，
被捕华巫人等，全无生还希望，
日军惨无人道，酷刑斩杀活埋，
宣言投降之后，仍然继续行凶，
人证物证俱在，惨案真相大白，
请求惩凶呈文，现已抵达东京，
遭难家属请愿，必获报仇目的。

自从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婆罗洲北部邦戛地方登陆以后，我们就开始着人间地狱的悲苦生活！虽然有极少数侨胞起初还认为“日本和我们同种同文，无论如何他们来了，对待我们总不至很坏！”但具这样见解、提这种论调之人、却也因日军兽性爆发，奸淫良家妇女、毆辱自己同胞，强买强卖，作威作福，而不得不改变其原来的错误见解和态度。

8年1月之祖国坚苦抗战，这一笔血账，现在曾经有人和“它”清算，1941年12月19日将近中午，敌机九架在坤甸市肆虐，惨杀我无辜侨胞将近2千人，这一条血案，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去谈它，甚至是忘记了！但这也莫怪其然，因为几年来，大家的心里，都被日军所施行的毒辣政策的一种恐怖情绪所占据着。

日军在这里登陆的先头部队，有许多是从祖国的沦陷区里抽调而来的我们同胞。这一点，可以由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情态看得出来，日军登陆当初，对待我们中国人还不很坏，就是因为这个，致於所谓“正种”的日本军之对我们好的，实在

很少，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登陆的同年8月敌陆军全部撤去，海军来此接防，此后我们的生活，即无日不在惊涛骇浪里，且命为具有“教育程度这敌海军”其统治住民毒辣手段之程度实较陆军时代高几万倍，他们实施严格的经济统制、贸易统制、思想统制、教育统制、生产统制、言动统制、吃饭统制……几乎无所不用其统制，这种无限度的统制结果，竟把整个的西婆罗洲变成一间地狱！

1943年10月23日日上午约3点钟的时候，日海军当局，以极从容之姿态，开始逮捕华、巫首领，及部分据说暗中偷收外国讯息这嫌疑分子，为了要实施其一网打尽之毒计，日军这次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方策，一部分随捕随放在一般侨胞的心目中，认为日军之逮捕华人、巫人，不过是一种（绑票）的行为，“钱出人平安”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一直等到翌年1944年1月24日晨，日寇军另以极度严重之姿态，逮捕其铁蹄下被迫组织的华侨统制会和巫人统制会全体职员，以及各地土侯侨领侨贤商人时，大家方才觉得问题的严重性。那一天，恰巧是旧历12月29日，是中国的（大年夜），在旧中国的习俗里面，算是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大家一听见了这种不幸消息，各市各镇、家家户户，顿时都变成为死寂的状态。每一个住民的消化器官，都因恐怖过度，毒液分泌得太多，脑神经受刺激太甚，不想食、不想睡，被捕的家属，不准哭、也不准和外面人们接触，有的丈夫明明已经被捕，人的妻子一点都不敢声张，还说有事到别个地方去。因为这是日兽军的命令，同时被难家属这周围，时时刻刻都有暗牌密探，布满着两次被捕人数，不在千人以下，但问题虽属严重，外面却自问无辜，认为被捕的不久总可以出狱。

1944年7月1日下午差不多4点钟的时候，记者刚在椰林里面煮“扫文”有一位少年朋友，很慌张的跑去告诉我说，业纯先生和农溪先生等都完了，这是报纸发表的消息！这种消息

我是不会立刻相信的，不过等到看了报之后，又不能不相信。那时我并没有流下泪，但心里实在很苦，我淡淡地对着几个坐在我周围面色呈现着苍白的青年朋友说，日本人的用心太苦了，捏造了这篇反日的故事！但报纸上所发表的仅是几个人的名字，我想其他数百被捕的侨胞也都没有希望了！那时我再说不下去了。周围的人听了这一席话，面色更加苍白，他们终于哭了出来，我最后说：“这样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报复！”

报纸虽然那样发表，但仍有不少的人始终不相信。他们说被捕的人并没有什么罪过，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毒手，这不过是敌人的一种烟幕。这种见解，非常有力，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最近。

1944年1月24日以后，所谓“大检举”的事情，继续举行。直到1944年8、9月间，陈昌兴也告入狱，今年3月1日报纸发表陈昌兴的罪状止，事情才告一段落。但如果劳子不变“中谷”不死，联军飞机慢一点来，一千五百余人的新名单计划实现起来，料连我也都逃不了啊！

作者有一个时期也和一般人的见解一样，以为日军虽恶毒，总不至於把无辜的住民尽加杀害，但经长时间的探问、采访有所信，可是真相终未明了，苦於人证物证俱缺。前月某晚，才得到一个意外的机会，和一位唯一死里逃生山口洋侨胞会面，谈话结果，惨案真相，才有几分明白。这位侨胞姓廖，平时是一位安分守己的瓷器工厂主人，他自己说：我是去年旧历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的，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被捕。13日押到坤甸来，当在山坤途上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跳车逃命，因为我於被捕后一刹那间，便意识到此去必无生望。如果不是同伴多方劝止，早就在那时逃走了。虽然逃得脱，逃不脱还有问题，但总比束于待毙较有一线希望。使我最感觉奇怪的就是全车数十个被捕侨胞，竟没有一个赞成我逃的主张。他们一方面因为缺少勇气，一方面却是见事不精，以为自己并没有

什么死罪，不至无故丧命。当我禁在监狱里面三天当中，竭力鼓励同房的人叛监，因为那时手足还得自由。如果要叛监，机会是很多的，可是大家始终不听。14、15天两天有许多“订炼子”整队经过我们之门口到外面工作，当他们低着头走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不时向我们偷看着，我立刻断定他们是为我们掘坟墓，我对同房说：我们之死期到了，他们仍半信半疑。15日正是“中秋佳节”特警拿了一张白纸，叫我签号，我立刻签了。晚上，天色朦胧，风雨凄凄约10点钟左右，突然各处起了一阵很大之骚动，我心里明白，死神降临了，那时灯光明亮，数百个黑越（黑旁）的人头在攒动着，每个人只准穿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反缚着，各有号数，我进监之号数是15号，载上死车之号数是“101”排队点名清楚，已是午夜的时候。

“开始行动了，约略有十多辆，声音轰轰有如雷鸣，我乘的那一部车，恰巧溜在最后，车里数十人，静悄悄地，并没有一点声息。车差不多行了一点钟，我觉得并没有过港，无疑地是向榴连港飞机场前进，我开始挣脱了绳索活动了，但头上被帆布紧紧压住，上面三个（特警）坐着，动弹不得，车突为停止了，大概是因为前面的车坏了，前进不得。我轻轻地用手向上撑，帆布松了可是我仍不敢冒昧，我用多方面试探，觉得“特警”并没有坐在上面，我立刻抹开帆布，从车旁溜了下来，神不知鬼不觉的刚下车时，只看见一个“特警”站在车前，背向着我，我从月色朦胧中，决定我应走的路向。等我跑到一位老妇人的“亚答”屋时，天已发亮了，以后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曾在许多同时被捕的华胞面前郑重宣誓过，如果我廖某能够逃出，一定要设法为大家报仇，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被捕的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记者和廖君谈话约一点多钟，被他那种慷慨激昂之情感，感动得几乎流泪，他说：“那数百副骨，无疑的是埋在榴连飞机场附近，我们要把他们发掘出来，暴露日本强盗之罪恶，

近来市面上许多谣言，说某也在古晋，某也在海岛，某也在山顶，这都是日本人放的空气，我们切不要上当。”笔者听到了最后几句话深叹廖君确有见地，有许多受难者的家属，还以为我们不久就会回来。很像古诗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那种凄凉之情况了。

8月15日，日本皇帝宣言向联盟国无条件投降，强暴解体，正义伸张，世界重现和平曙光，我们成为强大国民，大家之欢欣奋发，是不用说的，但一想起来我西婆罗洲无辜受害之侨胞，不觉发指毗裂，五内俱崩！

今年9月26日，正是联军长官澳洲第九师团长，厄斯狄将军莅坤之第二天，有青年侨胞贺南信和李清华二君由东万律（坤甸北约85公里地方）侨众持派来坤报告，发现东万律荷兰建筑未成飞机场之丛莽内面，有骷髅骸骨无数。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先生持派记者和黄锦安先生一行5人驱车前往报告地点视察。途中因车轮及车件损害，直至下午4时许方抵达该处，得当地侨领罗富昌先生及数十人之协助，瞬时间，於一望无际的“矮青”内面捡得骷髅47个，骸骨无数，全是由野猪发掘出来的，我们当即把那些骸骨叠成一堆，我们举行了一个极庄肃隆重的纪念仪式，记者在大雨倾盆下面，和到场数位侨胞说了足足一个钟头慷慨激昂的话。我说：“这是日本强盗毒杀我们亲爱侨胞的最明显证据，事情再无可疑的了，这不过是一个地方，相信还有很多地方未被发现，这不过是由山猪嘴挖出来的，是极小部分，相信每个窟窿里面，这埋藏着无数侨胞的骨殖……被捕侨胞全无生还希望，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在我们面前的情景，实在太悲惨了！明明都已变成野外枯骨，然而敌军当局，还是一味的造作空气，一味的欺骗，说多几天大家都会安然回家！诸位亲爱的侨界领袖，侨界领袖之權於表示者，为数我们应该不会再上日人的当了！现在日本虽已屈膝投降，但这样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洗雪，日军这样惨无人道

的暴行，我们一定要向世界人公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

雨那么大，可是大家始终屹立不动，雨声与哭泣声混合着，雨水和眼泪交流着，当我们回东万律埠时，已是六时半了。

翌晨雨止，我们仍到山场视察一番，东万律的侨胞，几乎全体出动，到该处帮忙工作，那种热烈情绪，委实可敬，摄影后，作者对东万律侨众说几句感谢的话，同时请他们要好好保护所有的窟窿和骨殖，我便於28日下午3时许返抵坤甸。

XXX

XXX

为呈请事……自矮寇登陆坤甸，於兹3年有余，其实施奴化教育，统制华侨经济，剥削华侨金钱，残害华侨生命，积极不遗余力者，厥推海军警备队人物。

敌海军代敌陆军接防坤甸后，前后举行三次检举，大捕我西婆罗洲各属侨界领袖，侨界领袖之罹於毒手者为数奚止一千，这种损失，诚空前绝后者也。查西婆罗洲各属侨胞，向受荷政府苛严之统辖，早已驯若羔羊。

查西婆罗洲各属侨胞，向受荷政府苛严之统辖，早已驯若羔羊。此次敌海军检举时，各侨领被捕入狱后，历遭毒刑，中间因受刑不得而遽尔牺牲者，为数不少，其能忍受毒刑者，其生命亦难保存，亦云惨矣。

值兹我联军长莅坤之际，我侨胞得以瞻仰钧容，如亲父母，庆幸奚似，只念我侨胞之深仇未雪，大恨未除，满腔悲怨，又何能已，伏乞衿怜下情，即日将该罪敌海军警备全数人员，予以逮捕，究问惨案真相，拜副法官，予以裁判，务使杀一抵一，为民伸雪，俾得冤死者目瞑，未死者心快，理属至当，情出迫切，伏维。

钧照实叨公使，谨呈西婆罗洲联军长官。

西婆罗洲全体华侨同敬叩

1945年9月25日，为呈请下令拘捕日海军驻西婆罗警备队全体人员，暨一部分商社，新闻社重要职员正法以为民等洗雪沉冤事，自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婆罗洲登陆以后，无恶不作，奸淫掠夺，草菅人命，无所不用其极！泊乎同年8月，日本联军全部撤去，海军来此按防，竟变本加厉，大施其毒辣手段，箝制言论，断绝外间消息，统制一切贸易生产，实施奴化教育，诱制华、巫青年，广放鹰犬暗探，任意惹事生非，设下天罗地网，任民动辄得咎，吾人自由尽被剥夺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生活痛苦，达於极点，敌海军当局，犹以为未足，竟藉住民反日名义，实行其大屠杀之恐怖政策，吞没住民财产，其目的在使全西婆罗洲，仅存老弱愚幼，俾使易於统治其阴谋狠毒，惨无人道，确属空前绝后，十载以后，恐尚难以洗刷人类历史上此页污点！

日敌海军在西婆罗洲施下毒手，系自1943年10月23日开始此次逮捕华巫首领，不下数百人，自是而后，西婆罗洲即陷於生人地狱之悲苦状态。翌年1月24日，又举行第二次大检举，其卸用华侨统制会全体职员，几无一幸免者！1944年8月，又复举行第三次大逮捕，计前后被捕华、巫人数，不在20以下华侨之稍有社会地位，平时安分守者，十已去其八九，改被捕人等，一部分受不住酷刑毒打，终死於鞭笞之下。其能残存者，亦难免於刀斧加身，惨杀活埋，酷毒备至！人证物证俱在，昭然可考者也，主是谋者，为日敌军驻坤警备队全体人员及一部分日商社及新闻社重要职员，该警备队等，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穷苦之父母，株连人之兄弟吞没人之财产，终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民等无辜，竟受此恶遇，其深仇大恨，若不洗雪，民等其何能堪，伏乞钧座，迅予下令拘回前日本驻坤全数特别警察，及一部日本商社，新闻社职员，加以严厉讯究，

务使案真相，彻底明了，然后明正典刑，为民等铲除凶顽，
伸雪沉冤，理属至当，情出迫切，诸维

钧照，谨呈

西婆罗洲联军最高长官

西婆罗洲被难华侨家属同敬叩

1945年10月14日



西加的访感

访罗芳伯第二家乡

丹心·罗丁

匆匆西加两天行

我和阿禄等5人去西加走一趟，那真是去也匆匆，回也匆匆的西加两天行。星期五下午由诗巫启程，至星期日晚上午夜1点回到诗巫会所，在两天半时间内我们去了坤甸、山口洋、三发等几个重要目标，一路上也停下来看了很多沿途小镇。这样坐在车里一路走，一路看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因那就是我们的邻国，土地和植物生态和砂拉越大同小异。有所感受的就是他们的土地不像我们这边的那样多的白沙质瘦地，这路两边没有看到烂芭地，那里的平地面积辽阔，土质不易流失或冲刷，地质也比我们好，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在砂拉越，若是沿着泛婆大道行驶，我们会看见路边不时展现的长屋。但，我们行驶的西加之路，却见不到长屋，一间也没有。我一时感悟到，也许是他们的社会比较快走进个体经济社会吧。但为什么会比较快走向个体经济社会呢？我无从求证，只是在行驶一段路后，听司机说，这路两边，甚至路上遇到的河的上游，都曾有许多华人居住，尤其是路边，过去都是华人，途中相隔不远就曾有华校，后来因为“9.30”事件和华莪事件的发生，苏哈多政府把华人杀的杀，赶的赶，一个华人都不留。

司机痛心地说，当年他一家13口，在苏哈多搞的种族清洗屠杀行动中，被杀害了8个，只剩5个侥幸在外的存活至今。他的农村二百多个人，当场被杀到只剩十多人，这十多人是被暴徒（多是士兵化装的）看上要收为妾的少女或要收为养子的小孩。丧心病狂的暴徒（他们头裹红巾，所以当年的暴行，也被简称为“红头”事件）在烧光、杀光、抢光的同时，还加上一个砍光（把见到的所有农作物，包括果树砍掉）这“四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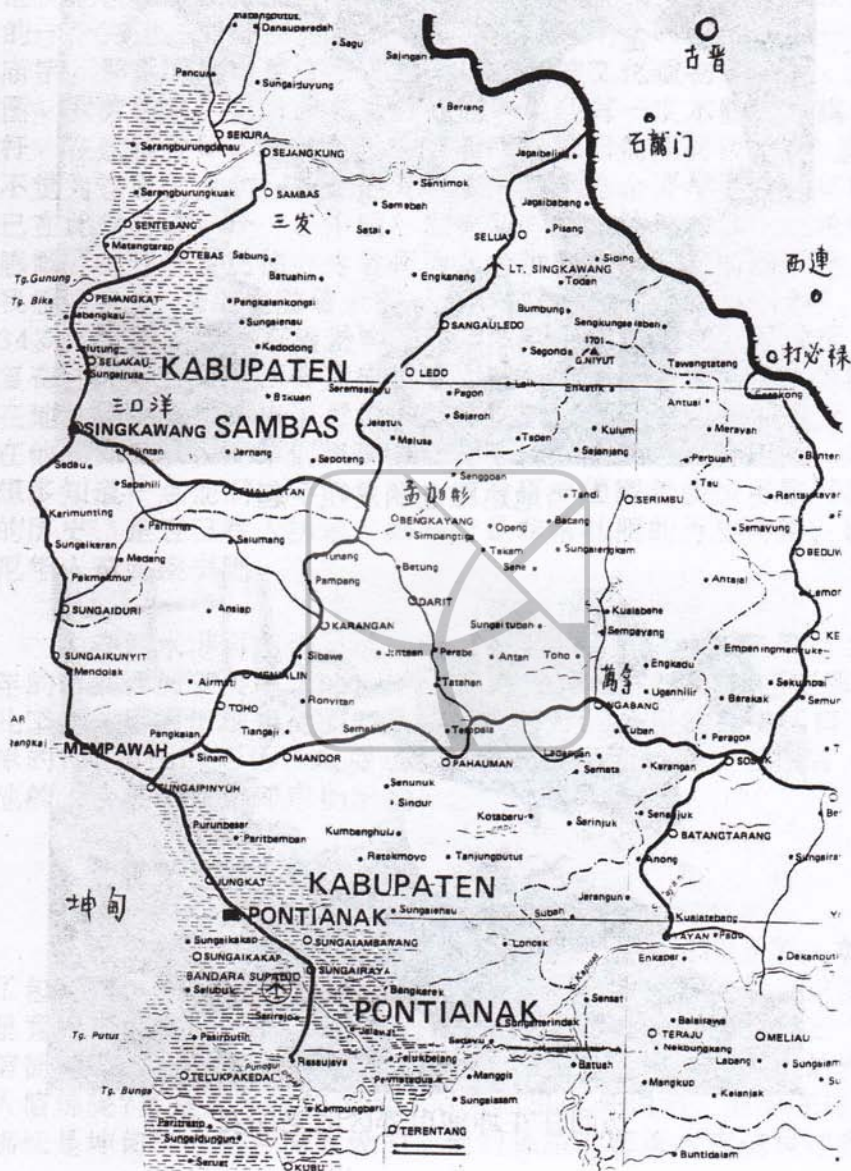
”暴行使当年的华人无法再於原地生存，因而华人在这一路上消声匿迹了。苏哈多政权倒台后，华人慢慢的有回来一些，但还是很少。

据2004年2月的官方统计，西加全省400万人，华人9.2%约37万人。而1955年的统计，西加人口一百多万，达雅30%，马来族30%，华族30%（三十多万），其他外来族10%。从1955年到50年后的今天，人口总数就已增加三倍，而华人依旧和50年前一样，仅有三十多万，其原因耐人深思。

行进在罗芳伯的第二家乡

在途中，我们得知Ngabang（万那）和Mandor（东万律）地带，就是在印尼史上华人罗芳伯的兰芳统制共和国地区。罗芳伯这个浸染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广东梅州客家人书生，自1777年建立兰芳公司起到第十三任首领1884年止的108年历史中，建立了南北一百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共约40,000平方公里的“小中国”。1999年前首相马哈迪在第十五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的致欢迎词中，也高度评价了罗芳伯对其所居地和南洋社会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现在我们去到了他们当年的旧址，我才明白过来，难怪达雅的原始社会那么快进化到个体经济社会，是因久远之前已深受华人的影响。一个西加报界人物说，在西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可见达雅人被华人影响之深远。然而，倍受华人社会影响的达雅族群，为什么不会有更多发展呢？今天我们从表面上看，这些达雅族群的经济并不好，看样子是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不因为什么，只因为所有的华人在苏哈多统治的长久岁月中，被赶光、杀光。於是华人和达雅人，水乳交融的经济文化也停顿了。答案有了，心情也沉重了，华人呀，无辜的华人，祖籍国的积弱，造成了全球多少千万海外华人的苦难。我不觉要问，华人难道就是上帝特别造来被人欺侮的吗？华人应该怎么自重、自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西加行地图





与当地达雅老朋友在一起



访问住在坤甸市郊区的老朋友

车在路上继续前进，司机一路上为我们介绍沿途的事迹，他也带我们去参观罗芳伯创立的兰芳统制共和国时代仅存的一个古迹，那是在淡水港（将近坤甸约半小时车程）的一个庙宇。那里面摆设着许多古王朝象征性的文化遗物，有鼓、地图、罗芳伯像，也有许多后人的题词，还有一支木制的大旗杆。在这很少华人居住的地方，庙宇已陈旧简陋得很，内心里不觉为这历史上的，曾比同是客家人的洪秀全要早上整百年就已在建立了一个“小中国”的先辈，既是钦佩敬仰，也希嘘感慨。呜呼昔者已往，今者何为？老洪很尊敬的上前鞠了躬，我感同身受，马上也随着上前，尊尊敬敬地鞠了躬。1772年，34岁的广东嘉应州石扇堡客家青年罗芳伯来到坤甸。经过反复奋斗，他终于在西婆建成了华人在海外的第二家乡，也为所在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逝世时57岁。我们今天在他和许许多多先辈们流血流汗奋斗过的土地上进行访问，总想多知道一点他们当年的事迹。这段历史埋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是否已有人执笔？那一定是非常壮丽的历史诗篇，印尼华人奋起疾书吧。

在淡水港再前进不远的Sg. Penlidih河尾木山地带，当年的印共西加省委书记Sufian（苏菲安）曾在1971年还在那儿坚持，后因出现叛徒而转到坤甸东南方60公里的大卡江南岸的Terantang后山，最后还是被叛徒出卖而被害，牺牲后，他的人头被悬在坤甸市场示众。

达雅兄弟学华语

来途之中到了Senakin的一个土著村落，司机下车，拿了包礼物，说是要去找个老朋友。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这屋里竟传来佛堂颂经声，走进看，果然是供摆设着佛像，两三个信徒在那颂经。看清他们的样貌时，明明是达雅人，怎么达雅人信佛呢？真是从未有的见闻，后来司机过来说明，原来在这佛坛是坤甸华人和台湾人设的。他们每星期都派人来这里边教

华文边传佛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来宣传中华文化，教达雅兄弟学华语。司机指着屋里靠旁的一个黑板架上写着印语、英语和华语三种语言。这时，我们方始明白过来，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当我们走向佛堂时，司机却拿着礼物往靠近佛堂的一间简陋小屋走去，里面走出一老者和他的家人，司机就跟我们说起他的故事。原来这位老者在那印尼的非常时期里，曾是司机的保护人。那时，司机就躲在他的后芭里由他来保护。司机被捕后，他也被捕。这位达雅老者以华语和我们对话。我们和他及达雅村民们一起照了相后道别。

又驶了一段路，我们到了一大片椰园，只见司机前后左右的探向着，原来司机在找他的老保干。在多次询问下，终于找到他的老保干家。他又从车里找来一大罐的“Melo”做礼物，阿禄也连忙叫安西拿了一盒我们自己带去的礼物上老朋友家。真是‘老’朋友了，大家都上了年纪，又是一位‘老’者。当他们和老朋友聊着，我自个人到屋外椰园溜达观看。这椰园真好，平平坦坦的连成一大片，这里已是海边了。这里海边虽然平，但并不像拉让江海口区那般的低洼沼泽。这里的泥土似是带沙的黄泥，比较结实。这里的椰园都是老椰树了。安西叫我看，说：你看他们是这样采椰的。原来椰树上相对的方向从下向上砍了缺口供采椰的人向上爬采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是这样采椰的，因为这椰树长得很高，竹竿是不能采了，直往上爬，那又似乎太难太累了，难道他们训练了猴子？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地寻思，终于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椰园边，挖掘了一条又长又直，大约有整十英尺阔的沟，有这条沟来灌溉和排水，对椰园来说多好啊！我非常敬佩劳动人民的这种精神。

那不远处有棵番石榴，我执意的要走过去探个究竟，是否是“鸡屎能”（广东话）见到树上的番石榴，果真又是一棵‘鸡屎能’，怎么就没有大粒的好吃的番石榴呢？

应该说，这一路来，我们从西连早上五点启程，中午到达坤甸，傍晚到达山口洋。这一路都没有见到种番石榴的，见到有果树的，也都是红毛丹和榴连、芒果之类的，其他果树很少见到。我心里想，这民族大约是很喜欢吃甜吧，因红毛丹甜。在路上添油时，有人来兜售红毛丹，一大串，一大串的，也不知多少钱，因都是由司机朋友先掏他的印尼盾。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甜呢？一路上，下车休息，去店里喝茶时，店主人都是放了很多糖和牛奶。我不是很喜欢甜，所以都不敢动汤匙搅和，没动匙就已甜了。到山口洋时，有位朋友跟我们说，他去古晋回来就和西加的朋友说，“人家那向的人并不像我们吃这么甜的。他们样样都讲究清淡，他们比较重视保健，可我们这里的人，却太嗜甜了，所以得糖尿病例的很多。”这就证明印尼民族是嗜甜的。这家的主人也是司机和他的同志过去的保干，司机和他的同志过去就住在这片椰园里进行他们的活动。随后这主人又很热情的把我们带去罗芳伯的庙宇参观。

劳动生产和大自然融汇的美景

到Sungai Pinyuh沿海走时，我们就看到椰园，看到稻田。有的稻田是很大片的，他们的地质很好，平坦又不泥泞，一眼望去，稻叶婆娑起伏。当我们进入山口洋时，看见大片大片的桔子园，他们种的应该是蜜柑吧。当我看见一片又一片的桔子园时，念着要去买他们的果来尝时，朋友们说有，我们有一大包是山口洋朋友送的，他们马上拿出来分了吃，果子质地很不错，如我所料的，这么好的土地，一定会种出好的果子来。本来，我想找机会去买一大包回砂罗越大吃一场，但实在太匆忙了，不敢耽误时间，只好安慰自己，回去吃我们自己乡土的柑吧。

西加的桔子园和他们的稻芭一样好看，一整片平平坦坦的泥土上，一棵棵的果树直立在土堆上，诱惑着我的视线，贪婪的巡视着。那天从山口洋向三发出发时，正值一轮红日（深

红的艳阳) 冉冉挂在地平线上, 挂在桔子园面上, 这景致激发我哼了几首和太阳有关的歌, “红彤彤的太阳往上爬呀, 往上爬……” 什么是美景? 这就是美景, 这是劳动生产和大自然融汇、交织成最祥和最清新的晨景, 我急着叫绍琪把它摄下。

在路的两旁, 有时会看到比较大的树胶芭, 是接种的, 种植还算整齐。但是却被割得很丑, 为什么呢? 那可是接种的好胶树呀? 可惜了, 依阿禄的见解说, 因现在胶工难请到, 年青人都不安于农村的活, 如果挑剔, 就连工人都请不到, 只好做如是解。

路两旁的农作物景观,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油棕。从西连进入西加不久就可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的油棕园, 可是这些都已老油棕树, 很少果, 是到废龄期了, 没人打理, 为什么呢? 不得而知。有时偶而会看到新种的油棕树, 那可是青青苍苍的, 直觉告诉你, 这土地是多么的肥沃。有这么好的土地, 为什么西加农村人民会穷?

赞赏西加三大基本建设

依一路上的观察, 西加有三种基本建设是值得赞赏的。第一, 是它的路。也许是因为土地平坦, 通路处又不被民间强占吧, 它们的路虽然狭了些, 但不少地方又直又平, 过了一段又一段。我总在嚷着, 西加的路不会难做, 根据阿禄从地图上看, 西加的道路建设也是纵横交错, 深入农村, 深入到卡江(Kapuas河) 河尾, 这是好的治国措施之一。

第二, 西加的桥梁多。我们沿路就过了好多的大桥小桥, 它们的桥, 依我们表面上看来还扎实坚固, 看见西加人有这么好的一条一条的桥梁真为他们庆幸。再看看我们砂罗越的桥吧, 什么联邦拨款, 什么私营化, 喧嚷嚷嚷, 拖拖拉拉, 可有几条大桥为民生造福? 刚造了一两条桥就不得了, 那就是政府

为百姓带来的天大的恩泽，可是百姓没福份受，还得掏腰包留下过桥费。西加并没有见到过路过桥收费的。

第三，西加的海岸线保护得很好，建了很明显的防浪堤。我们从坤甸向山口洋前进的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大约145公里，都是沿着西加的沿海大道前进的。一路看去，又引起我们的注目和议论，这防护堤是花了重本严格打造的吧，它是用大石头堆砌，又用洋灰结实的凝结，堤是用工整的立体大石立体的排列堆砌，不远处，不远处就留个尖角形的缺口，一时明白不过来，只理解到这构造是针对抵消海潮的冲撞力。正议论中，司机慢条斯理的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有好处，当涨潮时，海水从缺口处流进堤内，退潮时，海水所携带的泥土就留在堤内，长年累月，陆地就向大海伸展、延长。他还说罗芳伯目前供奉处的庙宇，过去是没有陆地的，那是海水冲积地。司机说过后，我们这些浅见者，同声共呼，太好了。

反观，我们民都鲁有着世界最大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工业，说是每年能为国家赚取数目惊人的外汇，数以百亿计的钱，说是发展的多快，可是看看咱们砂拉越的海岸线吧，那是令人担心的，99%的海岸线都是暴露在海潮里，就是某一些地方有大石拦着，那也多数是粗陋的。那能经受长期的海潮冲撞？很多已做了的“防浪堤”的，都已遭受海浪的冲损。看到这些，我们再也不敢轻视西加政府，他们有他们的优点长处

坤甸

坤甸(Pontianak)是个大地方，据1999年官方统计，坤甸有46.7万人口，华人32%，约15万人。坤甸各民族混居，市面上的商店，大多还是华人开办的，这市是相当大，但因早期缺乏计划发展，现在的新建筑只能依着旧道路两旁发展起来。因此，它的街市是长长的纵横排列，热闹是热闹，人口多，

商店密集，大挤小，小依大，大大小小互相挤压，像罐头里挤沙丁鱼，热闹中呈现着杂乱。我们没时间逛，只是坐在车内，由司机驶着，看了市面，再到南北地球的中线0度赤道标志塔参观、留影后就离开了。

山口洋

一路向山口洋(Singkawang)进发，才逐渐找回华人聚居地的感觉。华人毕竟有华人的文化，两旁的农作物多起来了，屋子也较像样了，一直到山口洋市，才感觉到一个市镇在多数为华人聚居下的规模。山口洋是华人的市，有60%以上是华人，这是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市镇。这个城市比坤甸有计划的，一排排的商店，整整齐齐，起初一到，乍看之下，我以为，可能只是这个角落是这样的。但第二天，司机载着我们去市区转一圈时，才看清全貌，那是真的西加的一个既整齐又清洁的城市，山口洋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

三发，三大民族开辟了三发

最后一站是三发(Sambas)。司机怕时间不够，建议不去。但朋友们认为三发闻名已久，并且有其历史意义，一定要去。因此，决定早点启程去，紧凑点，会够时间当天回国的。隔天清早因为时差的误解，又误了一小时，但还是按照原订计划出发。到了久闻其名的三发市，却并没有大市的感觉，只觉得建设上不如山口洋。司机第一时间内把我们带到印尼《国际时报》在三发代理处的负责人的家，这主人很能理解到我们的心思，寒暄后就开释说，三发只是名气大，其实城市的建设发展是很差的，不过三发却是出文人（印尼文人）的好乡土，好多印尼文人和现在西加政府高级官员是这里出生的。这主人的家是建在三发市的河上，因而一到那，我和绍其并不急着进屋，而是沿着长桥，到桥头去看水上人家。当然这里的水上人家是很原始、简陋的。我们看到有小舟的人家在卖亚答叶和红毛

丹，也看见一个土著人家大咧咧的蹲在桥下大解，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会多出文人呢？还没探究到。

这家的主人是媒体人物，也是个文人学者，精通西加历史，为人中肯好客，能与之结交是好运，谢谢司机的盛情介绍。从这主人处，我们听了好多的故事。他说，如今的三发苏丹认可西加的华人是西加的三大土著之一，那就是华族、马来族和达雅族，其他的都是外来民族（问题是土著华人能有什么权利）。主人说三发的马来人和苏丹他们编了开辟三发的历史故事。在他们的历史故事中，说是马来人、华人和达雅人在几百年前，一起抗争，流血战斗，驱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而三发的名称内Sam，就是客话中的“三”，Bas是Bangsa（民族）的意思，即是三大民族共同开辟、保卫了三发(Sambas)，这个可爱家乡的意思。

热情的西加朋友们，再见了

我们这次的两天西加小长征，除了路上难得地结识了司机的多位老朋友外，在坤甸和山口洋也会见了我们当年西部的老朋友。到了坤甸，司机通了电话，我们找到了当年西部老友的住处。那是一间扩大了了的店屋（他还没住进去，因这店虽然经营多时，但却是刚从原店主手中购买来，还未完成装修，他目前还住在邻近的单层排屋。他俩夫妇，看得出是兴冲冲地迎接我们。在他夫妇俩的热情招呼下，我们到邻近店吃了午餐，然后到他住家休息聊天。很快，他们又召来另一位当年西部老友。老友还带来他的读大学的儿子，闲聊了一阵，我们就要走了，因晚上是要到山口洋过夜的。西部老友夫妇总说我们太匆忙了，他们没能招待我们，要我们等华人新年到他们那里，他们就能全天候陪我们玩。从他们处，我们了解到西加的朋友和民众，平时并没有什么太多娱乐活动，不过他们常常在酒楼办卡拉OK娱乐活动，大家在酒楼里纵情的唱老歌卡拉OK。他说，坤甸这种组织有80多个，人员不定，少的有十几个，多

的有几十个。在繁忙的生活中，能偷得浮生半日闲，不失为一种舒解生活压力的活动，是件好事。

从那个朋友带来的大学生儿子看，从我们看见到的西加华人子弟和其他民族青年看，我直觉得西加民族还是纯朴的。因为从来到砂拉越的部分印尼工人不断发生的不好事件中，我印象中以为西加青年，较多是负面的，而这次的见闻，已改变了我的看法。

女主人的盛情款待，使我自觉得自己的过於冷漠，只是打从内心里告诉自己，他们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俩还送了我们礼物，盛情难却。只是希望他们有机会再到砂拉越来旅游，以便我们回敬招待他们。

在坤甸时，主人就用电话通知山口洋的当年老朋友。只是傍晚时分到老朋友住家周边时，因不熟，因此，找了好一阵子，花了司机的好大脚力，才给找着。这家朋友是教书的，教华文，据说他们教华文是利用课外的时间在庙堂教。学生们早上上了政府办的正课，下午才上民间办的华文课，整百个学生在一起分班级学。从过去的华文被灭，到现在的有机会教华文应是华族的不幸之中的幸事吧。这位老朋友，有知识，有文化，能说会道，是个很好的“资料库”。隔天清早，他和另一个当年老战友陪我们去三发，一路上跟老洪谈了很多当年的故事。他们的盛情和坤甸老朋友一样，要请我们吃饭，要留我们过夜等。但是我们这些匆匆来客，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朋友，只好一一推掉了。吃晚餐时，女主人争着要为我们付钱，在争执中给司机挡掉了，他懂得我们的心意，他先付，过后算我们的。第二天，他们让我们带上一大包柑和红毛丹，我们一路吃着回，在这里再三感谢老朋友了。

我们的司机是我们在这次路程中结识的好朋友，他是个好向导，他善解我们的心意，他一路介绍他的好朋友给我们，也一路讲故事给我们听，他包办一切，甚至我们沿途的休息、

点心、饭食、住宿等，都由他安排。最后，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午饭，然后他才换人换车的送我们回程，并祝大家一路顺风。我们对他致谢连连，并邀请他来砂罗越玩，他说，他一定来，等着他来吧，到那时，我们一定要盛情回报。

朋友们想要去的地方，只剩一处没去了，那是18世纪罗芳伯的兰芳统制共和国的故址Mandor（东万律）。因路远时间不够，只好割舍了。从三发回来，我们本想加足马力回程，如此时间才能从容些。那知却遇到麻烦了。因印尼国庆（17/08/04）将近，三发市的学生都在绕街操步，这交通一堵塞，就什么劲也使不上了，只能干焦急，司机尽可能绕道走。司机已在路途上通知家人和另一司机，准备好简便午餐和随时待命赴程。我们争分夺秒的上了车，司机也丝毫不敢怠慢的尽速前进。路上不敢再多呆留，只管前进。路上无数次的看地图，算时间，探问司机路程状况，到马印边界关卡时，刚好是傍晚5:30pm（马来西亚时间）两边的关卡都已准备关门了。司机训练有素，办事有门，很顺利的办好手续，车辆行驶在西连的路上时，大家才大大的松了口气，当晚赶回到诗巫时已午夜一点过了。

西加与北加人民的友谊要世代代传下去

土地面积146,807平方公里的西加，和约124,000平方公里的砂拉越，在过去几百年间就已相互来往，交流不断，他们也曾面对相类似的命运，进行过相类似的长期抗争，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从现有历史文献中知道几百年前的汶莱王朝的兄弟，曾在三发建立过三发苏丹王国。到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西加人民和北加人民又分别在自己的土地上抗荷、抗英。1777年—1884年，砂拉越南边的西婆兰芳统制共和国。对荷兰殖民者进行了上百年的抗争。1839年8月15日白色布律克踏足西加北

部的砂拉越后，各族人民，尤其是达雅同胞英勇抗争不断。英国人詹姆士·布律克1841宣称拉者后，从1843年开始到1934年7月，前后共94年内出兵攻打、烧毁、隔离、屠杀、镇压敢于抗争的达雅同胞数百次。1857年2月18日石隆门华人矿工起义，反抗白色拉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铁蹄也蹂躏到我们可爱的家乡婆罗洲岛时，北婆的神山游击队，砂拉越的各种筹赈团体及伍禅校长领导的抗日同盟会，和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的持续三年多的抗争和武装斗争互相呼应。

直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敬的西加各族人民又为了同情、支持北加人民当年的反帝反殖斗争，而送粮、送子女或给予各种接应，甚至有者全家卷入那年代的风暴中去，付出了许许多多血泪的代价。

我们一行人在那60小时内行进於西加的许多地方，还似乎感受到了这赤道热土地和人民在当年所给予北加儿女们的热忱招待、帮助、付出，也感受到了在那风雷激荡岁月中，西加人民和北加热血儿女们的水乳交融，欢乐相处，和在受镇压后的痛苦、无助和牺牲。想着，想着，我在内心里无限地感激善良的西加人民。

再见了，亲爱的西加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会永远记住您们！西加人民与北加人民的友谊要世代代传下去！

编后话

大凡亲身经历过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和风雨斗争岁月的人们都不能否认，当年风华正茂的十几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是怎样地满腔热情、亢奋不已，是怎样的理直气壮、豪气满怀，是怎样的坚持不懈、不遗余力的斗争。为什么会这样？不为别的，正是因为大家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这主要来源于我们有远大崇高的目标理想，先锋队组织曾描绘一幅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图景，无以数计的仁人志士都为这个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所吸引，也有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都为人类设有阶级压迫、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而奋斗不顾身、艰苦奋斗。无疑的，这些都是我们有所追求、有所进取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斗争、坚持，以至牺牲的力量源泉。

本辑《丛书》有多篇是以往难忘的回忆，正因我们这些可敬可爱的战友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才会使在凡人眼中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却能以非凡斗争与力量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新村”，在当年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书中有3篇文章珍贵地清晰地留下当年的历史的痕迹。希望往后有朋友能把伊班新村与打必禄居民迁移至古晋新村的历史事实也来写一写。

2005年4月

刘淑廉

刘淑廉，女，汉族，1943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2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友谊丛书

1. 往事
2. 林中猎奇
3. 悠悠岁月话当年
4. 风雨年代
5. 砂印边界风云
6. 回忆—一九九〇年和平谈判
7.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友谊丛书》之七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They had a great world in the heart》

出版者：余清禄 YU CHIN LIK
736B, Taman Ecorich,
Jalan T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作者：卢友爱

印刷：诗巫联成印务公司

初版：2005年11月15日

定价：RM16.00

国际书号：ISBN983-40483-8-6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983-40483-8-6



9 789834 048389